知识不是力量

方柏林（南桥）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最近常写专栏的人中，徐贲和南桥的文章我比较愿意仔细读，前者是成名学者不论，后者很年轻，观点也不尽成熟，但那种闲适、自信但不压迫人的风格看起来比较舒服。

安替（哈佛大学尼曼学者）

南桥真正理解中美教育的本质和异同。他的随笔触及了东西方文化的精华，在诙谐幽默中蕴含了真知灼见和一颗赤诚之心。

雷静（雪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著有《亚洲教育手册》《电子铅笔》等）

如果说作为译者的方柏林是一个好演员，以精确的字句传达原作美；那么，作为作者的南桥则像是一个好导演，以亲切的画面，传达他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观察和反思。本书讲的虽然是严肃的教育话题，却如同一部好看的纪录片。

张文武（东西网总编）

在中国，教育问题是关注人数最多的话题；在中国，教育问题也是最令人绝望的话题。南桥有理性，有见识，也很有耐心，掰开了，揉碎了，讲的都是共识和常识。因为他是父亲，不是中国的教育官员，一心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人，而不是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成才。

徐晓（作家、财新传媒首席文化编辑）

上架建议：畅销书/大众读物/教师教育



定价：25.00元
www.ecnupress.com.cn

知识不是力量

方柏林（南桥）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不是力量/方柏林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617-9001-4

Ⅰ.①知... Ⅱ.①方... Ⅲ.①教育工作—文集 Ⅳ.①G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1625 号

知识不是力量

著　　者　方柏林
策划编辑　顾晓清
装帧设计　刘艺婷
责任印制　殷艳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邮购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6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一次
印　　数　6 000
书　　号　ISBN 978-7-5617-9001-4/I·821
定　　价　2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未经反省的教育（自序）

南 桥

有时候，孩子提出的问题我回答不上来，他们就开玩笑说："这都不知道，应该把你的学位取消，从托儿所重新开始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还真是在重新来过。这些年来，我跟着小孩一起，从托儿所、幼儿园到小学，一年又一年重新"学"过，不是换个语言去学同样的知识，而是看美国的教育机构如何开展日常的教学。我的工作是在美国高校中从事教育设计，其间接触到形形色色的老师、学生和课程。无论是作为美国基础教育里的家长还是高等教育中的员工，我都是一个学习者——唯一的优势是不用做作业、不用考试，于是便用这个赚来的时间，写了很多文章，有了现在这个集子。

集子中的大部分文章，关注中美教育之间的异同，同时也考虑这些异同和为人处世的关联。毕竟人的成长，几乎每一步都和学习有关。不管是行为主义、认知主义还是建构主义，都强调学习本质上是对人进行深层次，甚至可以说是永久性的改变。这种改变的力量是强大的。一个人悟出的道理、产生的新的思维方式，是任何外在力量都无法替代的。

这样的改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三字经》里说，"人之初"，"性相近"。我的孩子恰巧在美国接受教育，故而其言谈举止各方面都越来越"美国化"。如果他们在国内受教育，又会是另外

的景象。除了人自己的选择和努力之外，教育的环境也时刻在塑造人、改变人。这里所说的环境不是死板一块，只能抱怨的“大环境”，而是一种由很多可变因素组成的环境。如果我们去接触、去探究这些可变因素，对其干预，进行优化组合，就可以对学习的过程和结果施加影响，从而改良那个素常被我们谴责的教育“大环境”。我们常以“花朵”来比喻儿童，以“园丁”来比喻教育者。花朵的成长，离不开阳光、土壤和空气。出色的园丁知道如何对这些要素进行配置，而没经验的园丁则将眼界局限于某一个方面，比如一味施肥，最终烧坏了土壤，也无成效。

诚然，教育环境里诸多因素相互作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梳理起来并不简单，所以，我通常希望遇到一件事说一件事，而不是试图“煮沸大海”。但复杂归复杂，却不能不去琢磨，而且这个琢磨的过程将是长期的。我这里口口声声说学习，就是希望自己也能活到老学到老，将来仍能继续和读者分享、交流我的观察与思考。

另一方面，我也发觉，“卧底”美国教育，试图借鉴的人似乎并不少。但不管是在宏观还是微观的层面，一些教育者（包括家长）对美国教育的借鉴仅停留在方案和技巧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引进，结果自然淮桔化枳，不伦不类。学其方案而不解其因，就好比买个水龙头带到沙漠，别的什么也不做，却指望一拧就能出水。在和外部世界交往的时候，我们常听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这种思维有时候让我们忙于追逐方法上的奇技淫巧，忽略背后的思路和道理，故而往往停留在交往的表层，无法深入。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当然，我们也不应自卑，希望全盘照搬另外一个外来体系。教育事关人的思想和内心的很多东西，和人性一样复

杂。没有一个体系，可以打包得齐齐整整，去完全替换另外一个体系。而比较与对照、反省与改进非但必要，甚至应该常规化、制度化。

比较是为了借助外来冲击，打破思维惯性，以便创造性地思考对策，解决我们在教育中面临的问题。经过跨文化的比较，我们发现了他人的优势，见贤思齐方属健康心态，扬长避短才是上上之策。在美国，“虎妈”式的另类教育方法之所以能引发社会争议，是因为社会各界也不介意用这类“异质”的思维来冲击自己。辩就辩个热火朝天，还能翻天不成？有位鲍勃·康普顿先生特意跑到亚洲，蹲点拍摄中国人和印度人在高中阶段如何学习，回去挑战美国人的思考：如此下去，美国的竞争力在哪里？姑且不论他的结论是否可靠，但他给我们的启发是要有一定的危机意识，不可在怠惰中维持现状。

此书名为“知识不是力量”，目的不是要宣扬知识无用论，而是希望借此名重新思考学习的本质。网络时代，知识容易得到，见识却未必容易产生。学历教育将越来越普及，但一个人能否成为一个终身的学习者呢？希望拙作能借助他人的例子，抛砖引玉，激发大家思考我们自己的教育。苏格拉底曾言：“未有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未经反省的教育，恐怕也站不住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顾晓清老师策划了这本文集，收集了我过去几年来所写的教育杂文。顾老师在书的篇目安排、内容分类、营销策划等多方面费了很多心血，在此深表感谢。这些文章有的发布于我的博客，有的发表于传统媒体，也借此机会感谢各位编辑和读者多年来给予的反馈和支持。最后感谢推荐此书的各位师长和朋友：雪城大学雷静博士、专栏作家安替、东西网张文武，财新传媒

徐晓 、谭娟、任重远等。一些美国朋友，如特殊禀赋教育专家埃达维娜·彭达维斯、作家理查德·查瑞特、作家科伦·麦凯恩虽未看过这些中文的文章，但是根据平时的工作和交往，以及我所写的一些英文文章，也愿意给我的文集背书，分别给出了十分热情的推荐，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目　录

上　篇　让教育校正教育

中 篇 卧底美国教育

128 **将学习放入学生的口袋**

“ME”一代学生向我们过来了，这不是说他们自私，而是说他们熟悉移动的工具“M”（mobile），也熟悉各种各样电子交流的手段“E”（electronic）。

136 **手机可以被禁止吗**

在学校，教育技术的应用，并不取决于一个产品看上去是否适合教学，而是取决于一个产品真正的普及程度。

138 **万变不离其宗：反思教育技术学科**

评价科学工作者，是从学术角度，不管他们的研究是否投入使用，是否和社会有关，能否见容于社会。而技术工作者水平的高下，则取决于其解决方案的效率、效果、成本，以及诸如“美感”、“能接受”、“可持续”、“符合社会正义”之类的衡量标准。

161 **无所不在的技术与学习**

“教育技术的应用需精心选择，谨慎行动。远程学习未必适合所有课程、所有教学内容。所以我们不会要求所有老师都去参与。”

上篇

让教育校正教育

世界上先有问题，而后有学科。过去，学习是为了积累各种知识“以防万一”(just-in-case)，现在是按需定制的“及时学习”(just-in-time)。

知识不是力量

当我们谈论知识的时候，我们谈些什么呢？

知识的英文为 knowledge。它的第一个音节是“know”，“知道”。但是 knowledge 这个词的末尾是“edge”，是“边缘、领先”。我们可以“知道”回字的四种写法，可是它并不能让我们处在“领先地位”（leading edge）。中文也是一样，“知识”中，只有“知”与“识”结合时，它才能产生“edge”，成为力量。狭义的 knowledge 本身是没有力量的。

当我们说知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说的是“知道”，比如，鸦片战争哪一年爆发；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是“常识”，比如，一年有四季；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是“见识”，比如，认识到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的金融危机（当然这是见仁见智的）。一个知道很多事实而不知如何处理的人，现在我们已经不叫他“知识分子”，而称之为“知道分子”。知道而无见识，徒增谈资，于世无益，又有什么意思呢？

钱钟书的《管锥编》，是好书，但余英时说它是“一地散钱”。李浔阳就问了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钱钟书到底提出什么创见了没有？没有印象。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现实，做这样的学问更安

全一些。你可以旁征博引，天花乱坠，可是那又怎样？如今，天下文章一大搜，掉书袋没价值。久了，人们会发觉，很多文章写出来，隔三四里都能闻出Google和维基的气息来。过去学人引用文献冷僻，人以为奇，可是如今我发现，古腾堡项目把所有古代稀奇古怪的文献都在往网上搬，以至于过去的海量文献离我们只有一个鼠标那么远。在这样的背景下，整理诸如《四部文明》这样齐、大、全、备的纸质文献库价值就值得推敲，因为稀缺的不再是信息资源，而是运用信息的能力。

1956年，教育心理学家本杰明·布鲁姆（Benjamin Bloom）发现，美国学校的测试题95%以上是在考学生的记忆。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学问分类法，即影响了两代美国人的“布鲁姆学问分类法”（Bloom's Taxonomy of Learning）。该分类法说学问分为知识、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估几个类别。这个分类法在美国教育界，尤其是在中小学，可谓众所周知。很多学校的课程设置，就是以布老的分类法为依据，用两代人的时间，使美国教育成功走出以“记忆”为主导的测试困境。即便在小学阶段，如我们家女儿这个年龄段，这些分类技能的培养也是齐头并进的。比如“应用”类别，一年级的孩子就有“访谈”作业，让他们问家里人喜欢香草冰淇淋还是巧克力冰淇淋，然后制成图表。我看这就是讲究多项认知技能的组合。

现在我们常讲“分布式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也就是大脑一部分（如记忆部分）被解放出来，被电脑、手机等外部智能辅助设施取代。那么大脑干什么呢？得侧重于分析、应用、综合、评估这些“高层次思维”。当然，思维的类别不能简单用“低层次”、“高层次”来区分，因为有些“低层次”技能也具有高价值，例如，“知道”吃毒药的危害或许会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同样，一

些“高层次”的思维能力可能是低价值的，比如对明星八卦的分析。但总的说来，“低层次”知识和技能容易复制和传播，而“高层次”思维和技能，尤其是批判性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普遍意义上的学习能力相比，培养起来比较困难一些，且宜早不宜迟。

人们常说新经济是“知识经济”，其实再往下走，应该叫“学习经济”。我最近看到一个有趣的说法，说过去的大学学历是“四年制”，现在是“四十年制”。过去，学习是为了积累各种知识“以防万一”（just-in-case），现在是按需定制的“及时学习”（just-in-time）。过去，一个人掌握一门技能、一门知识，可以管一辈子。现在的好多职业注定要终身学习。比如 IT，简直就学得没完没了，一有松懈就要落伍。IT 的老师常常拿英文系老师开玩笑，说还是他们好，学会一样管用一生，反正莎士比亚死了就死了，不会冒出一个莎士比亚 3.0，莎士比亚 XP 出来。但即便是在英文系，据我所知，学习方法和重心也在更迭不息。或者，老师的知识更新换代确实会慢一些，但是学生如果也是抱着一定的知识一辈子，那就只有自己慢慢落伍去了。

本文开头，我们说知识的第一步是“知道”（know），最终的目标是产生“领先”（edge）。那么“know”和“edge”中间这个“l”是什么呢？它就是“热爱”（love），它就是“学习”（learn），它就是“生活”（live）。

| 名校公开课 |

似乎是突然之间，国内各大门户网站纷纷开设国外名校公开课视频栏目。不少年轻人呼啸而去，将其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如若有人不了解，那简直不仅是落伍，更有点不像话了。要我说，这其实并不新鲜，高等教育早就经历过一次“开放课件运动”。

2001 年，麻省理工学院将所有课程的相关资料上网，称为“开放式课程网页”（MIT Open Course Ware），向全世界各地的机构、学生和自学者免费开放，供其使用。在遥远的互联网的过去，大家对这个模式的持久性将信将疑。然而，这股风一旦吹起就没有停下，甚至愈刮愈烈。后来，Youtube（国外著名的视频分享网站）专门推出了教学频道，放置各个学校的教学视频。苹果公司也通过 iTunes U（U 代表“University”）学习频道，鼓励各高校分享自己的课件。还有诸如“美国地域”、“美国高校”这样的网站，将各高校免费开放的课程（包括声频、视频）一网打尽。

按过去的认识，似乎只有那些社区大学、野鸡大学，才热衷于这些远程的玩意儿，但是现在上网看看，参与开放计划的都是什么麻省理工、斯坦福、耶鲁、纽约大学、加大伯克利分校、诺丁汉、塔夫脱……一句话，都是名校。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正想求知，坐

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可以听遍名校课程，加之有很多直接就是全程录像，和课堂上效果差不多，更可以来回听上多遍。所以说，这个时代什么都缺（判断、思辨、创造……），就是不缺信息资源。在这个信息丰盛到了过剩的时代，居然还有人东摘一句西摘一句倒卖知识（例如一些英语培训），我为学生感到可悲。学生离知识的仓库多远？一根网线而已。可惜教育商人蒙住了学生的眼睛，不叫他们看见身后的大江大河，而是高价一杯一杯卖水给他们喝。

大学为何变成活雷锋，纷纷要将过去看家的本领与公众共享？没有任何人逼他们，也没有法律这么去要求，这完全是自愿。这些大学已经意识到，这个年代的学生，信息来源广泛，渠道多元，你自以为你的教育多好，但是学生出去一比，就知道好歹了，所以关起门来搞教育已经不行了。中世纪人们认为知识是神圣的，是少数人的特权。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请系好安全带，欢迎来到21世纪。

一个好的老师，一个好的学校，将课程共享出去，会提高教师、学校的知名度，对学校、对个人只是好事不是坏事。一个学校老师再好，他能影响到的也只是本校的一些学生，他将课程放到网络上，或许可以影响到校外无数学子。而一个人可以影响到多少人，也是衡量人生得失的一个重要标准。基于以上以及其他诸多原因，我相信教育的开放运动只会越来越深入，而不会走回头路。不用多久，国内一流大学的老师，大概也会把自己的课程拿出来，和全国的学生分享。敢于分享，这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自信。

开放之风愈刮愈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也在变。最近《纽约时报》上登出了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教授马可·泰勒（Mark Taylor）的一则评论《终结我们所熟悉的大学》。他指出，美国的大学是工业化生产的模式，一批学生进来，老师灌

输一些自认为必需的知识，然后学生学完，成了教育的成品，送出去投放市场。不幸的是，这个批量生产的模式引起了条块分割和过度专业化的毛病，不能解决日趋复杂，需要多种文化、多个专业相互协作才能解决的具体社会问题。泰勒教授指出的问题在中国也一样突出，甚至更为严重。中国的教育改革，近年来基本上是跟着美国在走。和“我们好不容易吃肉了，城里却喊着吃粗粮了”的现象一样，我们开始呼吁学科专业化的时候，美国人发现专业化的弊病了。泰勒教授抨击高校学问越做越窄，博士越读越专的现象，呼吁以后要逐渐打破学科的壁垒，按照社会问题重组高校的课程。比如，水利，真正要解决问题，或是实施开发，水利项目得将“人文、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人都叫过来，得有医学、法学、商业、工程、社工、神学、建筑等学科的专家的参与”。

说到底，课程是为解决学科知识的具体建构而存在。课堂是课程实施的地方，一旦开放了课堂，开放了课程，学生在知识预备上的差距或许会缩小一些。但是仅有这些还不够。如同我在早先《知识不是力量》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这只是最起码的一种准备。学生面临的问题不是简化了，而是更为复杂了。

斯蒂芬·茨威格在自己的自传里，非常缅怀“一战”前的那个“有序”的世界，对新世界的不确定性充满不解。如果他活在今日，一定会加倍感叹今日变化之迅速与无常。活在这个无常的世界里，知识也从北京烤鸭变成了活蹦乱跳的活鸭子。同学，为什么你还坐在那里，等着人来一口口喂，甚至咀嚼过了一口口喂呢？要打活动靶了。

| 学而无术 |

同门几个在老师家做客，谈到一篇陈丹青论《狂人日记》的文章，确实写得好，深刻，一句废话没有。我看过很多学术论文，觉得一个很要命的毛病，是空话、套话、黑话连篇，作者自己恐怕都不知道在说什么。要都能像陈丹青这么言之有物，不拘一格，有真知灼见，研究就有生气了。

说到这个现象，在座的一个师妹举了个例子。以前，她在河南学拳。她的师兄年轻时第一次参加比赛，连初赛都没过。因为所谓的比赛套路是体委一伙人拼凑的，几家太极的大杂烩，许多动作根本没有道理。这位师兄根据实战的经验，把它们变得略有道理，于是裁判们认为动作不规范。后来，这位师兄憋着一口气去参加推手比赛，以全胜的纪录一路闯过初赛、复赛、决赛，把那些套路动作“规范”的选手打得落花流水。

这个师妹也是一太极高手 —— 但愿这辈子我不要因为任何原因跟她交手！她从学术说到武术，就跟我从厨艺扯到武艺一样，其实，行行的道理都是通的。我们中国好多东西，关键是隐性的知识居多，你要学会，学好，很不容易。这个得靠悟性。所以一般情况下，就只能用“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来打马虎眼。尤

其使问题更加严重的是，有些规则——和实战关系不大，本身不合理，往往是一小伙人在那里闭门造车弄出来的。见识少的时候试图制定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则，往往是自己在那里瞎琢磨，坐井观天。

网上有篇《中国武术竞技力真相》，写得非常有趣，我摘几段：

> “有一位练习八卦掌的，比赛开始了，他还在那儿转圈子，被我们的队员追上去，踢了两脚，就不打了。”梅惠志说。那一次，最后冠军都被体校队员拿下。
>
> 1987 年，梅惠志带队参加武当山全国武术擂台赛，这一次的场面比北京的散手试点更加热闹，赛场上有扮成武松模样的，还有和尚、老道（南桥评：这是找不到合理的学习渠道，纯粹是在跟电视剧学。“在他们的想象中，仍然还是那种你一招白鹤亮翅，我一招黑虎掏心。”）。比赛前表演，架势挺吓人。有人一掌把木板中的铁钉子拍了出来，可一上台打擂，那人只挨了一脚，自己就跳下擂台了。
>
> 还有一位神秘人物，自己爬上擂台要求比赛。当地组织者要求他先报名，但遭到拒绝，理由是“不敢留名，打完了再说”，并自称已经“毫无欲念，不吃荤腥”。看到这种情形，梅惠志专门交代队员不要踢第二脚。因为第一脚把人踢倒，第二脚必然会踢头，这样会导致这些没有任何对抗训练的对手直接休克。

规则这档子事在写论文时也经常跳出来。别看各刊物都有自己的规矩，但是也有很多潜规则在作祟。而这些“潜规则”大家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就以讹传讹，抄来抄

去，以为就该这么去写，而不是说我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在什么情况下行，什么情况下不行。我倒希望大家眼睛一黑，啥规则也别去看，你就按照你看到的现象和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思路去写，大概这样还好一些。回过头再来整理格式和规范。

以我从事的课程设计这一行来说，它是在美国军营里成长起来的。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都已经现代化、规模化，美国急需大规模地将一些技能高效地传播出去，所以就请教育家帮助来设计这种训练——做任务分析、内容分析、步骤分析，将平时囫囵吞枣的一些动作拆分开，清晰简易地传出去。因此，不管是学术也好武术也好，如果也有人对这些规则的本身进行拆解，分出合理不合理，将规范明确化、合理化，使大家不至感觉是在云里雾里，说些黑话、套话、胡话，或是打的都是花拳绣腿，真正做到言之有物，招招管用，那该多好。

文学给我们的生活雪中送炭

古希腊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一生沉迷戏剧，晚年对家业撒手不管。几个儿子把他告上法庭，说他年迈昏聩，无力管理，要求移交财产管理权。索福克勒斯对于有人说他昏聩很不感冒，当场给陪审团背诵了他刚写的《俄狄浦斯王》，问陪审团成员一个昏聩的人能写出这种诗剧吗？陪审团成员被震撼了，二话不说让他走了。

那是在古希腊。那时候，人们的精神生活比现在重要多了。换作今天，当一个人的生计和这种对于艺术的爱好有所冲突时，他会怎样做？我们都活在容量有限的皮囊里，精力和时间都不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今日的人们，也未必会将能写出一部好作品等同于一个人的聪明。

前些天，学校的一位戏剧系教授在讲述现代英国戏剧时，邀我过去做了一次关于品特（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当代英国剧作家，他的剧中人物常常身份不明或言行举止缺乏明显动机）和荒诞剧的对话。那是一次很有意思的经历，我们坐在教室中间两张椅子上，如置身品特剧作之中：一个房间，两个人坐着说话，一群人围观。

后来突然有学生问我："你是学文学的，怎么改行了？"面对一

群美国人，我只能说这个转弯需要用一本回忆录来回答，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我只要说十个字大家就明白了——定向，户口，档案，人事，下海。命运几番转折，让我走上了以前未曾想到的路。而今，平时做着一份“正式工作”，和电脑打交道，到了周末和晚上，有时会搞点翻译。为了维持这双面人的生活，保持这来之不易的平衡，我甚至放弃过升职的机会，让上司继续去忙预算、采购这些杂事，自己则留些精力继续做喜欢做的一些事。当然，我羡慕那些专业从事文学或翻译教学的人，不会有人说他们不务正业，他们还可以从事学术交流，甚至在学生课堂的讨论里教学相长。但话说回来，目前的做法也非一无是处：如果天天教英美文学，就会像陪人看《天鹅湖》的俄罗斯外事官员一样审美疲劳，或是为了评职称写论文写得发疯。

做这一行也好，不做这一行也好，有一点是一样的——文学已经成了点缀。大家都很忙，时间都被各种各样的通讯工具切得粉碎。看书似乎成了生活的一种点缀、茶余饭后的消遣。它们有什么用呢？非要这么问的话，我想说的是，好作品能让人聪明起来。它们好比雨夜的一道闪电，一刹那间将一个屋子照亮，让你知道你身处何方，无论前进还是后退，都有了一个更好的参照。文学用悲剧把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你看，让你知道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你若是不知道，就是人生所有的财富都堆在你面前，你也会视而不见。文学用喜剧把那些比你更渺小的人物摆在你面前，让你知道你活在世上底线是什么。文学有办法打开我们的天眼，让我们看到一个以作家想象力为上限的新天新地。文学让你洞悉人生的复杂性，让你知道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当一个道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当一个道理正说反说都颇有道理的时候，当你在逻辑里转着圈子出不来的时候，看看小说吧。它会让你逼视真实，面对人生活在

一团乱麻中的事实。人生中的关系不是那么容易理清的，所以我们有《长夜漫漫路迢迢》。假如生活的抉择都那么一清二楚，谁还需要《王子复仇记》?

文学，说的是我们用道理讲不出来的道理。

非但如此，文学的讲述方式还是高效的，能打破行业的、民族的、地域的各种差异。我的一个上海朋友尹太五对文艺的作用有一番描述。他让属下花时间去欣赏文艺作品。小朋友们不信，说这个时间还不如看一些实用的书。尹先生举了个例子说，艺术的缘起正是出于表达的效率。比如，史前的几个人去打猎，那个场面，大家这么说说不清楚，那么说也说不清楚，后来就有人用棍子在地上画了起来，一画出来，看的人就明白了。因此，起初艺术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高效地表达。

文学有时候是用最为简约的方式，让你一下子明白很多道理，而且这些道理是整合的、有机的。故事还往往具有一种特别的真实，这样的真实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超过史书。几百年之后，还有人在咀嚼《红楼梦》，因为它蕴涵了太多东西，多年以后，你还可以接连不断地打开。请问几百年后，还有谁去咀嚼《战略管理》?早当废纸扔了。对了，还有谁记得几年前红极一时的《谁动了我的奶酪》吗?

文学增加了我们生活的维度，给我们平常的经历增添了意义。小时候，有次我带着一本《小说月报》上山，读罢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十分震撼。那时候我和小说中的破老汉一样，在山上放牛。史铁生能把他插队看人放牛的经历，化作一个活生生的虚构世界，恰巧和我读书时的现实世界产生了共振。对那时从没出过门的我来说，这意味着山外还有另外一个天地。文学给单调的生活，如放牛，增添了无穷色彩，让人不再感到苦闷和孤单。其他

文艺作品，也一样，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细腻，甚至让我们更为和善。前些日子，有机会去听一堂圣诞大型室内乐。去之前的路上，想到最近陷入一连串黏糊又甩不掉的琐事，我的心情是愤懑且烦躁的。可是，当合唱团用拉丁文唱出雄浑的赞美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被另一种力量拉了上去。艺术能激发出人内心良善的东西，《警察和赞美诗》的记载并非空谈。列宁听贝多芬的《热情》时曾经感慨，如果他一直听这首曲子，他甚至无法将他的革命完成。

文学是一种装备，它给我们提供了解人生的望远镜、放大镜，甚至显微镜。它让人看到你周围的人所看不到的东西，那些人生的质地、生活的色泽。处在同样一种境遇之下，为什么两个人看见的东西就是那么完全不一样呢？因为两个人的脑子里摆着不同的思维框架，有的人知道如何让看到的一切归巢就范，有的人对看到的一切视而不见。比如，看过品特之后，我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去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了。他让你看到寻常话语中的陷阱，看到话语之外的台词。他把生活剥离到了一个极其简约的层面，一个可大可小的场景。小到厨房里“点炉子”还是“点水壶”这种无声的语言较量，大到两岸之间对于“一个中国”的阐释、中美撞机事件后对于“sorry”一词词义的各自认识，语言的较量无孔不入，品特无处不在。由于他构建的对话和场景很简单，所以能像万花筒一样组合出各样形态来。你观察这些交流，又能跳出来，不为所羁。当我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戏剧老师补充说，据说财富500强的CEO多半有文科背景，因为他们更易“脱框思维”。

在我们这个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大部分人都已经摆脱了温饱问题。而那些被物欲蒙蔽了眼睛的人，仍照旧在过着灰暗的、时时无聊的生活。在那漫长的绝望里头，文学给我们的生活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教学改革从作业抓起

2007年11/12月号的《教育乌托邦》（*Edutopia*），刊出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对话。对话一方是《情商》一书的作者、心理学家丹尼·科尔曼，另一方是好莱坞著名导演乔治·卢卡斯。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人在教室里找到了交集。不过，想从这段对话中找到革命性的、颠覆性的言论不大可能，我觉得值得看看的是有关作业设计的讨论。记得以前常说，美国小孩用“projects”来指我们常说的“家庭作业”，而我们所说的家庭作业，多译为“homework”，仅仅是在家做的“功课”（work）而已，至于这样的“work”将来是否能够“翻译”成现实的技能，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这样的“work”，多半是给考试准备的，类似物理学上说的做功。你挑担子走平路，虽然很累，但由于并不是在用力的方向上移动，从做功的角度（好比与现实对接的角度）来看等于零，是无用功。

我想到这些年社会上一直嚷嚷中美教育存在差距，可是从讲课上来看，我们的老师有的也颇出色；从反馈上来看，我们的学生素质也不差。若说真有什么关键差异，个人觉得还是在作业设计这一块。我们的作业通常是“基于知识”（knowledge-based），而不是“基于问题”（problem-based），或者“基于现实项目”（project-

based)。美国也曾走过这个弯路，事实上今日还在走，尤其是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政策重新指挥美国教育回归到应试传统的时候，以至于卢卡斯这一代人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愤愤不平。卢卡斯和科尔曼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读书上学。那时的学校十分传统，也很乏味，死记硬背的东西不少。学生对学习兴趣不大。卢卡斯承认自己直到进入大学，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后，才发现了投入学习的激动。这么看来，也许只有从沉闷而机械的教育中走出来的人，对学习的构成才有着深刻的“偏见”。卢卡斯认为，学习一定应该是“项目型的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要带着解决问题的目标去学习，而且这个目标必须是某个现实的目标，而不是一种教科书上的编造。因为任何教科书上的编造，都会局限于学科的利益，而在现实当中，我们对技能的实际使用，并非条块分割，更可能是各个学科的知识串在一起用。

而以作业为突破口，就是一种把纯粹的“在家操劳”(homework)变成一个个“真实项目”(authentic projects)的尝试。卢卡斯用建房子做例子，说明了改变学生作业的必要性。

“基于项目的作业能促进多元学习，让学生同时融会贯通很多门学科的知识，而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零散学习。因此，在我们说建一所房子是他们的任务之后，学生们就必须以一种有别于课堂学习的特殊方式开始劳作。比如，他们需要为它估算一个合适的价格。他们需要考虑，这个房子需要能抵挡龙卷风，或者当室外温度达到摄氏41度的时候屋子里还能保持凉快，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为了应付这一系列问题而学习热力学和数学方面的知识。这样，老师们就能看到学生到底学到了什么，理解了什么。”

事实上，在亨廷顿市，有些学校还真是让学生去改建市内一些被人废弃的房屋。大家想想，把一幢房子给重新拾掇好，装修起来，一定需要调用大量的数学、经济等各学科知识。关键是与此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心志，让他们在繁杂的劳动中培养耐心和协作精神，发掘他们的创造力。这些，是什么样的考试可以取代的呢？

或许我们会说，长久以来，学生在试题的牢房里待久了，你把他们放出来，让他们看到阳光，他们会觉得刺眼。他们或许还希望回去。你把他们领到海上，他们不知道朝哪边航行，他们会迷失。不过，卢卡斯对此持乐观态度。他说，你得让学生激动，让他们受激励。他说，学生最大的长处是好奇，这是个发掘不尽的宝库。他们一旦知道了游戏的玩法，就会带着十足的热情扎进任务里头，不是去寻找具体考题的答案，而是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传统的课程说，我们4点钟上课，学习以下内容，达成以下教学目标。而基于项目的学习则有可能这样告诉学生，这个项目你们四个人去做，评分是给每个人分别打分，小组之间也互相打分。我们不仅给你们做的这一项目的学术含量打分，也要根据你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打分。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何愁会有进入社会困难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学习的过程是收集信息，学习事实，学习规则。而真实的学习则是给学生一个目标，余下的让他们自己去动脑筋思考。通常情况下，这种以目标为指引的学习还会让学生产生批判性思考，他们会审视从各个渠道得到的信息是否可靠，这些信息来自什么地方，可否验证。这种时候，他们就不再是在学习事实和定律，而是在思考了。“年轻人的最大驱动力是好奇。他们自然而然会去探究事物的来龙去脉。”你又何必事必躬亲，替他们选择呢？

南瓜与教改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大地的诱惑》（*The Pull of the Earth: Participatory Ethnography in the School Garden*）。书中讲述的算是一种极端的教改。为了帮助一个问题小学改变其教学，教育研究人员劳丽·托尔（Lorie Thorp）带着她的研究助理，别出心裁，和该校师生员工开展起种植活动，把学校变成了一个花园。

她让学生从事园艺，种花种菜。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发现，很多学科，尤其是在小学阶段，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学生在种植的过程中，将各个学科的知识融在一起，将心灵、头脑、手全都运用起来。而园艺活动也把不同学科的老师带到了一起，比如，他们种出大南瓜后，英文老师让学生给南瓜编个故事；数学老师让孩子猜南瓜的重量，数南瓜子；社会课老师让孩子分装南瓜子，去农贸市场卖；科学课老师让孩子学习植物生命周期、光合作用、天气，等等。其实，实践中学和课堂学习的不同之处也正在这个地方。作为学徒，不管是木匠还是玄乎的什么知识领域的“认知学徒制”（Cognitive Apprenticeship），其实都是要打通多个学科。而课堂有时会脱离自然状态下的情境，搞得不好就会变得十分枯燥。现在，国内学科越来越专业化，各个教研组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大家只是在一起交流本学科的考题，

并以此为指挥棒，指导自己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结果教出来的是一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学生。我们经常把老师比作“辛勤的园丁”，把学生比作“祖国的花朵”。可惜现在园丁没了，出现了专门管理阳光的人、专门管理浇水的人、专门管理施肥的人…… 在祖国的花园门口，人们只按花朵的个头大小对产品进行验收。《平衡记分卡》（*The Balanced Scorecard: Translating Strayegy into Action*）的作者开普兰和诺顿曾有一句名言：“你衡量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

而《大地的诱惑》中，类似于种植南瓜这样一个小小的教学设计，就把所有学科融合了起来。斯蒂芬·托尔敏（Stephen Toulmin）（注：语言分析伦理学代表人物，也是一位教育家）曾经说过，学科的界限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就如同殖民宗主国给非洲划出的国界一样，人为的国界有时候割裂了自然的民族分布，造成了今日很多的问题。比如，卢旺达糊里糊涂地将胡图族和图西族绑在一起，埋下恶果。在学科设置上，我们知道文史哲是一家，数理化是一家。但从另一个层面说，文史哲和数理化也会互有涉及。比如，我女儿在中国出生，一段时间后才去美国念书，现在明明学的是数学，可真正要学的却是语言。

当我们强调跨学科学习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在理论上已经能够理解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的重要性，然而在实践上，却缺乏相应的活动安排。比如种植南瓜（小学），比如荒岛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等学科），比如商业交易会上的翻译（外语）。我想，为了打开思路，不同学科老师应该多多交往，只有这样才会减少近亲繁殖造成的思维僵化。

顺便说一句，我学的是英语、教育，若老谈教育或英语，这文章该何等枯燥，看来十分需要和其他学科的朋友多多交往。在座的有没有研究恐龙蛋的、造火箭的，或者研究地震的？

学生也可能是教改的阻力

学校一位老师要上一大课，这课程原来在是小班上，突然一下子变成了一百多人，他不知道该有何种变化，于是请我和一位从事游戏设计的老师去给他做参谋。

我们从事游戏设计的老师建议他去拍摄一些视频，预先放在Blackboard（一种课程管理软件）上，以增加课程的趣味。我当然知道做这些视频不错，不过老师毕竟不是演员，你让他们去实地拍摄一些视频，有时候他们压力很大，也没有这么多时间。要拍摄好教学视频，你得先考虑好脚本，部署好拍摄的一些七七八八的杂务。当然，碰到各方面配合默契的情形也是有的。我曾经一个人去给一个教营养课的老师拍视频，他在自己家里烧烤，然后讲述日常饮食中的营养成分。我们还一起跑到附近的商场，在食品部拍摄食品营养的视频。那位老师上镜非常自然，简直一天生主持人似的，所以他拍得不费什么劲。但很多老师做这种事情时感到拘束，有的不过是把视频变成了他自己的大头照（talking head），一播几十分钟，其实还不如录音。

我则建议增加一些“小组作业”（Group Project）。当然，原因之一，是希望把老师的这种录制负担，转嫁给学生。学生做起这些

项目来，有时候十分有创意，而且这也是训练他们各方面能力的好办法。这么做是两全其美，虽然实施起来更有挑战性。

但是在讨论当中，我们发现，学生从事“小组作业”问题颇多，造成的管理问题也很多。比如，他们问：你将学生分组，有的学生干活多一些，有些干活少一些，你如何公平地评分呢？第二，如果是小组作业，你并不给出具体的做作业方法，学生能否接受呢？

我的建议是：第一，一开始要端正学生的态度。丑话说在前头，告知他们小组作业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告知他们这也是人生的一项训练。第二，保持作业目标的适度模糊性，不要把作业内容说得太死，否则会遏制他们的创意。在实践当中，谁会把问题都描述得清清楚楚让你去解决？你一样要自己去界定问题，增加各种各样的参数，去选择衡量质量的标准。第三，在做作业方式上，可鼓励用PowerPoint、电子故事、视频等多种陈述方式。第四，既然作业的内容和实现方式都比较灵活，那么如何保证学生按质按量完成呢？我建议老师制定一个评分标准，另外规定做作业的大致程序，比如第一阶段，提交项目的创意给老师；第二阶段，将脚本或半成品提交给全班，听取反馈；第三阶段，完成并展示给全班。第五，将好的产品留存下来，作为下一届学生的参考，这种榜样的力量要好过死板的规定。

但凡这种作业，不但老师不愿意去做（因为更费脑筋和精力），学生也常常反对。我曾经在一次会议上遇到在哈佛教物理的马祖尔教授。“同伴学习”（Peer Learning）的方法就是他率先提出的。他说，他经常发现学生强烈反对这种做法，他们希望像过去那样——讲课，考试，然后完事。一些不同的方法，尤其是小组学习，造成的问题很多。这也导致很多大学教授懒得折腾，尤其是责任心比较差而又成了终身教授的那群人。我听得克萨斯一个高中老师说过：

美国小学全讲究教学法，到了中学是一半教学法一半内容，到了大学就全是内容不顾教学法了。很多老师上课，就是搞讲座，然后对学生考考试了事。所以，我很敬佩我们学校的这位老师，教了几十年后还不耻下问，问我这个并无多少教学经验的人。

我以前在雪城，几乎每门课都有小组作业。我的老师尼克说他的评估课几十年教下来，年年都有小组作业，最终他什么情形都遇到过，学生搞到最后打架的、打官司的都有，当然，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他之所以坚持了几十年不放弃，是因为绝大部分学生最终还是意识到了这种作业的价值。从我自己的教育体验里回忆，很多小组项目类的真实任务，当时往往感到"没学到什么东西"，但是几年后发觉获益匪浅。我很幸运，读书是在教育学院，这里的老师以身作则，在教学方法上确有很多费心之处。我后来发觉很多学校老师的教学方法都很陈旧、僵化，真应了那位得州老师的说法，亦即以内容的灌输为主，未必能真正去传道、授业、解惑。

在国内，我也看到有老师抱怨这种新的教育方法遇到的问题。几年前，一位教育界同行K老师在其博客里描述了他开展"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的遭遇。他把作业变成了真实任务。他推荐一位营销课的老师也采用此法，结果如下：H老师开始了她的教学，她把每个班的学生按7—8个人分成小组，要求每个小组在学校里尝试开展新产品的上市工作，什么产品不限，什么形式也不限，同时结合教材穿插着讲授一些理论知识。意料不到的是，H老师遇到了学生的强烈抵触。其中，说没有钱进货的，不懂怎么做的，要求自己到校外去做的，甚至要求H老师自己也在学校练摊的，什么样的抗议都有。

K老师特地和教研室几个老师去听了一次课。刚好是课间操时间，H老师让学生在礼堂前摆完摊，回到教室里准备讲评，结果整

堂课几乎是在争吵中度过的——不同的学生站起来以质问的口气与H老师对话："为什么要出去摆摊？""为什么老师给三个班上课的内容都一样，安排的实训都一样？""老师能不能直接给我们讲新产品上市的过程和方法？""老师为什么不先给我们做个示范？"等等。而H老师对学生的问题只是徒劳地辩解，仅有招架之力，根本没法控制住场面，还是教研室主任在一旁适时地提出先课间休息，才把局势暂时缓和下来。

K老师后来分析：总的来看，H老师对于课程的理解和把握确实存在自身的不足，这与她在营销方面的专业素养和职业能力有关。但是撇开老师的问题不谈，从学生的反应看，有几个问题令人不得不令人反思：

1. 为什么学生对这种灵活的、操作性强的作业形式反感？

2. 为什么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之后，学生反而不适应？

3. 大学阶段的学生对老师的依赖程度到底应该在什么样的一种范围内？

4. 学生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老师上课？

看到这个课堂试验的结果我倒是并不吃惊。你什么时候见过小孩自觉自愿断奶的？如果学生的作业是"真实的任务"（Authentic Tasks），那么这些任务本身和以前的知识学习会有很多不同的特征。澳洲教育研究者简·海灵顿提出，真实的任务应该是：

复杂的任务（Complex Activities）：这个复杂并不等同于困难，而是说会牵涉到各种不同的技能，而未必是单一技能。

结构松散（Ill-structured）：和现实本身一样，你不可能指望老师填鸭式什么细节都告诉你。当学生根本不知明确的步骤时，本能的反应就是紧张和排斥。"老师能不能直接给我们讲新产品上市的过程和方法？"

真实的任务应该以现实生活中的场景和事例为基础。既然是真实事例，若有穿帮，就难以掩饰。最终是要形成一个完好的产品。这个产品可能是一份研究报告，一个网站，一个实实在在经营起来的营销项目，一个实体，一份展示图，一份策划方案……而不是一份试卷。

这些任务的特征和知识型的作业大不一样，事实上学生可能更喜欢你给他一本书，画好重点，到时候去考试。项目型学习假定学习者具有解决问题能力，具有自我反省能力，能够协作，能够自立。可是应试的体系确实败坏了这些能力。这就像把一个人在地下关了几百天，你第一次放他出来的时候，他如何能够一下子适应外面那自然的阳光呢？所以他们的反对是可以理解，却也是需要去克服的。当然，如何克服，那也需要老师自己去学习，去取经。如今，好多老师忙得团团转，举办会议、讲学、作报告，都在往外倒，哪里还在吸收呢？他们不去吸收，就这么年复一年地老调重弹，学生又如何一代代长进呢？

因材施教

以前我们常笼统地说某人天资高，接受能力强，大概是指高智商。一个纯粹的智商表到底存在不存在，很多人表示质疑，尤其是反种族歧视者，因为智商研究总是将人群分出优劣来。照加德纳（Gardner）所说，人有多重智能，不同人有不同禀赋。我数学考试经常考十几分，甚至考007分，可是我英语很好，语文很好，那我是聪明还是笨？过去我以为自己很笨，后来发觉不是学生笨，是老师笨。事实上也不是老师笨，而是教育制度笨。在动物庄园，你怎么能让一只公鸡和一只鸭子一起参加游泳统考呢？

书上有无数种学习理论，说的都是老师要针对学生的不同学习风格，制定多样的教学策略。风格的划分方法很多，在我看来最好的是Dunn and Dunn的学习风格模型，它从环境、情感、社交、生理、心理五个层面，对学习者的风格进行了划分。然而，尽管学习风格的理论甚多，根据学习风格制定相应教学策略的理论却甚少。西方理论界研究了几十年，只是回到了孔夫子“因材施教”这一个结论上来。很多人无奈地感叹，研究学习风格最重要的意义，可能就是让教师意识到因材施教的必要性，至于怎么个因材施教法，很多人则含糊其辞。我倒是在耶稣讨论传道的一段比喻中，得到了很

多启发：

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种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他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

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

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倒了。

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

撒在好土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马太福音》)

同样道理的种子，撒在不同的土地上，会有完全不同的效果。老师光把知识的种子撒下去还不行，还得根据不同的条件，该除草的除草，该施肥的施肥，否则怎么叫他们园丁呢？

己所不服，勿说与人

以前我有个机会给电台写稿，写完还要自己在家里录音，录完刻成光盘传过去。对方很喜欢我的稿子，但是对录音不感冒。我认为这要归咎于我的普通话发音和录音环境。后来有机会去了电台，到了录音室，电台总制作人华德跑来给我做指导。华德以前做过话剧演员。他的夫人在中学教话剧，几乎年年得奖。他儿子是个话剧作家。他自己后来的职业，基本上是做电视，担任过多家电视台的播音员、主持人，采访过无数要人，包括约翰逊总统。

华德看我念了一篇之后，说我的方法大有问题。他让我不要机械地念稿子。他说，你机械地完成朗读，别人一听就听得出来。要想使节目打动人，首先自己要有感觉。听众不可能比你更熟悉你自己，听众也不可能比你对你这个话题更激动。你有十分热情，对方就能吸收七八分。如果你只有三分热情，效果如何，可想而知。他还说，即便你有世界上最美的声音，但没有热情，对方也会听睡着。他接着又建议，在我念稿子的时候，要想象对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说，你就把话筒上的这些小孔想象成一张张面孔。

回家之后，我抄起一本最乏味的学习理论教材，什么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对着老婆念起来，抑扬顿挫，声情并

茂，念着念着她就哭了。

后来不久华德就去世了，那是他给我上的第一课，也是最后一课。我后来不怎么录音了，可是就好像《神鞭》里的神辫能变神枪一样，我把这个道理用到了别的地方，尤其是写文章的时候。我总提醒自己，如果我连自己都说服不了，或者说打动不了，那还不如别浪费别人的时间。

拿申请出国读书这事儿来说。最近有几个熟人来问我出国留学的选择问题，比如要不要出来读博士。我发觉很多人是把思考的顺序搞反了。首先想到的是上什么层次的学校，自己这个成绩能上什么学校，而不首先去问问自己，我这辈子到底想干吗。你自己都不去弄个明白，没个大致的规划，想说服他人，那是很勉强的。

我在读书期间，也参加过录取工作，记得当时问那位负责的老师应该怎么去看那些申请材料。那位老师倒是没有提到考分的重要性，其实 GRE 成绩不过是个参考，过了 2000，你考高一点低一点无所谓，这又不是高考，划分数线的。这位老师说你要看这人的陈述里讲他以后要做什么样的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他先前的发展，是不是朝着这个方向在走，我们到底能不能给他实现梦想所需的知识技能，等等。还有："你觉得他说的可信吗？"

后来有人问我出来读书的话题，我一般都叫他们先问自己。我想，比什么专业更热门、学科排名第几更为重要的，是你愿意做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没有人能替你回答，只有你自己知道。诚然，谁也不能一下子把问题全都搞对，把道理全弄明白。再者，人的想法，日后有了新的体验和阅历，也会发生改变。可是起码在当时，一定要依据自己的所知所想所感，做到最大程度的坦诚，力所能及地剖析，起码你思考过，或者你得表明你在探索在追求答案，而不完全是稀里糊涂。

还在彷徨的朋友，先别管学校录取你可能不可能，先问一下自己，这是你愿意往下走的路吗？这是你要给自己以后选的人生吗？如果不去思考这样的问题，那么即便能够侥幸入学，把书读完，出来之后照样找不到北。

可以跟屠夫学什么

今天图书馆的一个俱乐部卖旧书，平装本一美元两本，精装本一美元一本。我一口气买了大概十几斤，其中包括一本《学习资源黄页》(*Yellow Pages of Learning Resources*)。书的封面上是一本站立的书，上头挂着标牌“open”，活脱脱一个“开卷有益”。学习资源列举如下：

会计、飞机场、建筑师、汽车、面包房、银行、砖瓦匠、屠夫、糖果店、木匠、公墓、孩子、市政厅、城市规划、牧师、电脑程序师、建筑工地、角落、法庭、百货商店、干洗店、电工、食品批发中心、清洁工、加油站、温室、五金店、直升飞机、医院、旅馆、保险公司、记者、垃圾回收站、幼儿园、图书馆、锁匠、木材加工厂、钱币、博物馆、报社、邻居、乐队成员、纸盒子加工厂、药房、照片、邮局和邮递员、心理学家、采石场、赛车场、房地产代理人、饭店、公路建设和保养、社工、体育场、出租车司机、教师、电话、电视维修工、电视台、剧院排演、树桩、工会头目、家具商、空停车场、投票……

字没印错，也不缺页少页。记得前几天去儿子所在的托儿所，也看到墙上贴出的各行各业的图标，从宇航员到清洁工无所不有。和上面的目录一样，说的都是处处留心皆学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道理。

这是一本写给家长、写给老师看的书，是要老师和家长把周围的一切全都变成学习的资源。从孩子们上学所做的各种各样的作业来看，美国学校确实是这么身体力行的。几个星期前，刚上一年级的女儿，还学习做气象员，学习播报天气。老师还曾带他们去银行，学习银行的运作。学校有时候还请各行各业的人过来演示，比如消防队员、邮递员、警察，等等。

确实，当我们的孩子把眼光放到周围，能够把一切都变成学习资源的时候，看着烧水壶而发明了蒸汽机的瓦特们才会越来越多。当我们的孩子开始关注工人、农民、屠夫、电工、清洁工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和隔膜才会越来越少。曾经在一个博客上看到，城市人心安理得地歧视着进城的民工，民工带着歧视回到家乡述说城里人的敌意。这会在各自孩子的心目中，分别制造多少毒素！而这些毒素，要过多少年才能清理干净呢？

我想，我们大部分家长可能都知道教孩子“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样的诗句，可是对城里的孩子来说，这完全都是概念。是不是让孩子有机会去看一下稻子如何泡种，如何撒种，如何赶走吃种子的小鸟，如何施肥，如何除草，如何收割等等过程呢？同样，有没有可能，让农村的孩子也看一下一件产品如何从生产线上走到消费者手中的过程呢？在“罗杰斯先生的邻居（*Mr. Rogers' Neighborhood*）”这个系列电视节目中，我就经常看到罗杰斯先生带孩子们看一件件东西如何产生，比如牛奶是如何挤出来的，羊毛是如何剪下的，等等。孩子们还都特喜欢看。我常感慨，美国怎么很

多人做着很平凡的职业还那么津津有味，从孩子上学学习的那些东西和这本书上看，原来这种“安居乐业”的意识是从小就养成的。

关注平凡的人、平凡的物件、平凡的场合，还有一大好处，那就是能够培养人的好奇心。平庸的成人个个相似，那就是缺乏好奇心。这个好奇心也应该从小养成。

有什么好奇的呢？比如屠夫杀猪卖肉，有什么好学的呢？作者采访了做了12年屠夫的弗雷德。弗雷德告诉他这一行是怎么做起来的，告诉他猪肉品种（特级：里脊肉；一级：通脊肉，后腿肉；二级：前腿肉，五花肉；三级：血脖肉，奶脯肉，前肘、后肘）如何划分，屠宰业内部职业划分（包装工、修肉工、剔肉工、冷藏工、屠宰加工工、检疫员），猪肉的加工过程，等等。

如果你的孩子仰望星空疲惫了，看看四周吧。当你去问屠夫他这一行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一刀下去，切开的或许是一个社会的横断面呢。

| 精耕细作与粗放经营 |

我们这一辈的人都经常感叹，为什么我们的父母随随便便就把我们（或许是一大帮孩子）养大了，而我们现在只养很少的孩子，却折腾得半死不活？是我们做父母的能力不如我们的前辈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现在太讲究了，精耕细作地养育着孩子。我们以为过去是条件不好，或者是我们的父母知识不足，所以只有粗放经营。但是结果呢？

想起安妮·普鲁小说里说的两个牛仔。

"牛仔甲是科学型的牧场主，讲究方法，讲究正确性……他的畜栏全是用上色的钢做的，颜色悦目。机房和牛产房装了暖气，光线充足，每年都重新粉刷一次。他最喜欢的牛是圣达·格特鲁蒂斯品种……他养的牛之中，百分之九十四每年产一次崽。他用复杂的电脑图表，对繁殖情况进行系统地记录。春天用新发苗的冬麦进行喂养，到了夏天，他就很认真地从一片牧地转到另一片牧地。除了草料，他还给他的牛加添豆子、甜菜浆、糖蜜、高粱、甜玉米秆子、玉米、棉籽壳、甜菜叶、罐头废料、无水氨、家禽肉下脚料（包括羽毛）、花生、肉、骨头、家里衣服烘干机用的软布。除这种

杂烩大餐之外，他还给他的牛喂各种催长养料，包括抗生素，还有布瓦特克和鲁门森牌子的药片，还给这些牛灌康博素、芬纳普利克斯、赖尔格罗、斯蒂罗德、新诺维克斯等汤药。

牛仔乙则截然不同。他住在旧棚屋里，他的牧场又旧又破，篱笆歪歪倒倒，路坑坑洼洼。他的牧养方法和他父亲的一个样：他的牛品种很杂……牛的性生活问题他让牛自行解决。母牛产崽后，喂奶喂六七个月时间，所以难以尽快再次怀孕，但他认为这些牛自有它们的安排。他的牛想去哪儿去哪儿，他不去管……”

但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的收入却不相上下。这是因为牛仔甲的经营成本高，另外良种牛犊体型过大，死亡率高。

把养育孩子和养牛相比，是有点不妥，不过有些道理却很相似。你太关注了，孩子自然安全舒适，可是一旦以后离开了你的关注，他的成长就很艰难。比如，孩子读中小学的时候你尽量辅导，让他不在班上落后，以后孩子就有可能失去自学的能力，从而废弃你先前的所有努力。真是不值。

还有，在小的细节上太拘泥了，必然会忽略更大的问题。我们有时候在一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小细节上大做文章，比如喝奶是母乳还是混合喂，尿布是纸的好还是布的好，是能晒太阳还是不能晒太阳……而忽略了真正造就一个孩子的，是你在做人方面的各样培养，你智慧的话语，你在一些环境下作出的选择，你的典范性的行动。

著名的罗杰斯先生说，小时候，父母连石头墙都不让他爬，他爷爷却说，没事，去吧。回来后，爷爷看着这个敢冒险的小子大笑，说：“我就喜欢你这样子，我就喜欢你本来的样子，因为你与众不同。”爷爷的话成就了为千百万人所熟悉的“罗杰斯先生的邻居”节目，还有那句广为人知的主题曲：“你是特别的，你是唯一

的，因为只有一个人像你。”

一位牧师说过，印第安人射的箭，很多都是自己制造的。听说箭杆的长短与材料、羽毛的轻重、羽毛离箭头的位置、箭头的重量与材料，等等，都大有讲究，足够空气动力学家研究半辈子。但是有次他得了个机会问一位有经验的印第安射手关于他的造箭心得。这位射手说，其实把箭杆削直了，其他什么的马虎一点都没有关系。如果箭杆不直，其他方面你就是完美无缺，也很难一矢中的。

牧师由此推论，养育小孩，最重要的是品德的培养。教他做一个正直的人，其重要性远甚于把他培养成天才。可惜这话不一定有人听得进去。搜索畅销书，发现教人成功者众，教人成人者鲜也！

如何毁灭天才

借来一套语音版的《异类：不一样的成功故事》(*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书里的故事是很多，可是希望借此找到成功的秘诀恐怕很难，作者更多的是在描述而非预见。我听了半天，只听出六个字：天时、地利、人和。

比如比尔·盖茨，之所以能打造出一个庞大的微软帝国，一是他自己比较聪明，天赋好；二是因为他生对了时代，那个时候是没有多少人有机会学编程的，他碰巧有了无限上机编程的时间；三是因为他流足了那99%的汗水，花了那一万个小时的时间，作者说天才本身并不重要，莫扎特也是花一万个小时作曲才把自己作成一流音乐家的。

不过此书倒是可以反着看（听），听如何扼杀一个天才。书中说到了一群智商特别高的人是怎么被毁掉的。总的来说，毁掉一个天才有以下几个常见办法（可综合使用)。当然其他办法还有很多，我只写感触比较深的几点。

1. 马虎的父母。书中说到一个智商特别高的孩子，由于妈妈马虎，没有及时填写学校发的表格，结果无法继续上学，一辈子就此废掉。哈代的小说《苔丝》里，因一封信塞到了地毯下没被及时看

到，苔丝的人生从幸福转换成悲剧。这些自然主义小说里的偶然性因素，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多见，可是一旦发生了就确实没辙。所以说，天才不一定是被刻意毁掉的，有的纯属偶然。但话说回来，如果能调整心态——比如暮气沉沉的“退休”二字，在英文里被说成“返璞归真（resigned to the fact）”或“变得更加睿智（I've become philosophical about it）”，多一点调剂的心态，让人的存在不那么紧绷，不那么一触即断，有些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2. 官僚的学校。上述学校就是太官僚，仅仅因为表格没有及时递交，就不让这个孩子继续求学，最后这哥们捧着自己的天才著作却无人问津，只好穿一条破牛仔裤在自家门廊里喝着啤酒感慨人生。相较之下，造出原子弹的欧本海默则比较运气。他读书的时候，想下毒把老师害死，事情败露后，学校知道他是可造之才，没有将其开除了事，而是送他去做心理治疗，后来的故事就是广为人知的历史了。想到国内有位“海归”教师，因为学校许诺的待遇不兑现等等因素，得了忧郁症，以至自杀。在这件事上，学校其实是有不少责任的，他们原本可以多一些人性沟通，多做些努力，帮人适应的。

3. 穷人的心态。我自己也是穷人出身，所以对此深有体会。书中说富人和穷人之间差距之所以越来越大，是因为穷人有时候在心理上自己矮化自己，而富人的孩子就有这么一种张扬的心态，使得他们更为容易获取发展所需的资源。但是一旦穷人扭转这种心态，他们之间的差距就会逐渐消失，甚至逆转。我经常跟人推荐《布鲁克林有棵树》，虽有敝帚自珍之嫌，但主要是希望大家把它当一个成长故事来看。我想让读者，尤其是家境普通的青少年读者看到，人穷的时候怎么做人，怎么把自己的人生一样过得有价值有尊严而且还能前进。人生就好比打牌，你不可能总抓到一手好牌，笑到最

后的，常常是那些牌技比较好的人，而不是头一次抓了好牌的人。

4. 文化的禁锢。书中说中国人数学好，一个主要因素是因为汉语中念数字所需时间较短，符合人的短期记忆习惯。这一点我以前也谈论过，只不过我想到的是音节数多少。拿我们的九九算法表来说，八九七十二，一下子念完就记住了；英语里却要说“eight times nine equals seventy-two”，完全没法朗朗上口。另外一个因素是“水稻文化”的影响，它让人知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多劳多获。而其他一些文化就有一定的禁锢性。比如，法国农民到了冬天要去“冬眠”；非洲一些地方农民靠捡果子谋生，你让他去种东西，他会说世上有这么多白捡的果子，干吗还要自己种。当然美国现在也注重培养孩子的“工作美德”（Work Ethics），比如我家小孩有次就用一种美国信天游告诉我说：“No bees no honey，no work no money。”歌词大意是：“蜜蜂百忙才成蜜，不去干活哪来钱?”

5. 眼光的缺乏。一些人的人生遭遇滑铁卢，其实不是因为缺智商缺才能缺知识，而是缺眼光，不知道地平线那边到底是什么，所以只是跟着别人瞎起哄，追赶别人追赶的一切，最终稀里糊涂而晕倒。书中介绍了一些案例，说一些开始在智商上超凡的人，最后反成了平庸之辈。智商就好比打篮球的身高，太低当然不行，可过了一定阶段，其实并没有多少差异。爱因斯坦之所以成为爱因斯坦，不是因为他的智商超过所有人，而是因为在一些父母送孩子读流行的法律或者会计的时候，爱因斯坦的父母没有，结果他的智商被充分利用上了。

说到这里，请大家转身看看四周，看看周围有多少智商150的人，在做着二百五的事情。

育儿专家的孙子

据说世界上有不少人以发行量“仅次于《圣经》”为好书标准，那么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于1946年所著的《儿童和育儿》（*Baby and Child Care*）也算其中之一。这本畅销半个世纪的书堪称影响了几代美国人。现在去亚马逊网站看，这本书还在继续被家长追捧。有位妈妈读者写道，她不但自己阅读了这本书，还买了分别送给自己的孩子。如果您是家长，我也会推荐此书，因为它确实给稀里糊涂、毫无经验的家长提供了不少实用的引导。

但对此书也有很多批评者。很多人谴责这种育儿方法倡导的纵容和放任直接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年轻人的嬉皮。“垮掉的一代”是被谁搞垮的？真还有人责怪斯波克医生。因为这一代人正是在斯波克教育法的指导下长大的。斯波克反对打孩子屁股，因为据说这样会伤害孩子的自尊。从这小小的指导原则上可以看出斯波克医生在对待孩子问题上的宽容态度。但育儿不是简单的要不要宽容的问题，而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对什么样的孩子实施什么策略的问题。有的家长看到斯波克的书，别的东西没有学到，就学会了对孩子尊重和民主这一套，以至于这一代人长大后，权利意识和自我意识十分强，却又没有学会如何担负责任及怀有敬畏，故而一不留

神就张牙舞爪。

更有人指出，斯波克自己的儿子自杀了。上网一查，发现斯波克儿子自杀纯属谣传，但是他自己的孙子自杀了倒是真的。他的孙子患了精神分裂症。那么这事情又如何解释？也是个矛盾。富不过三代，难道贤也不过三代？

当然，斯波克的孙子自杀和斯波克本人的学说未必有什么关系，但我相信书中确有矫枉过正之处。

世界上有一种人，天生是那种颠覆者。他们会提出和常识完全相反的惊人之说。比如以前教人减肥的阿金博士（Dr. Atkinson），他的做法也是很极端的，说吸收脂肪无妨，可通过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减肥。《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凯就曾戏言说，阿金博士一辈子叫人减肥，自己却胖死街头。面对人类传统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牛顿说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成其伟大。可是如今很多人是通过把巨人干倒来成其伟大。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人世间好多道理其实是物极必反，你反拨到一定阶段，就会开始产生相反的效果，育儿也是这样。

斯波克医生就是个颠覆者。这些育儿方法出台之前，各民族皆有自己的训诫之说。中国人说“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比如，现阶段，作为家长的我和孩子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孩子不断寻求越界和家长加以约束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一味放纵孩子确实没什么好处，家长得教育他们家里的规矩，和以后进入世界为人处世的方式。不然，社会将以更为残酷的方式来管教他们。

与“三天不打”一说平衡的一个说法是孔子所提的“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这其实也是把责任放到了孩子身上，因为有“委身待暴怒”，会“陷父不义，安得孝乎！”这个说法，横竖都是孩子的不对，与斯波克的说法似乎相反。我觉得没必要在二者之间作

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应相信适度、平衡和中庸，虽然有时候这些与一些极端提法比较起来，一点都不酷。

其实犹太人也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没有人说棍棒出孝子就是把孩子打坏，变成家庭暴力，而是说要适当管教，而非以顾及其自尊为名屡屡放纵，终至不可收拾。将打屁股管教的方法完全废止，则是一种因噎废食。这里得区分“打”字的细微内涵。2004 年 7 月，英国议会上院经过三小时辩论，以 250 票对 75 票，否决了禁止打孩子的提案。与此同时，他们又以 226 票对 91 票，赞成父母适度打孩子屁股，作为“合理的惩戒”。不过不能真打（beating），要是造成擦伤（bruising）、抓划伤（scratching）、皮肤发红（reddening of skin），那么就是违法。而在美国打孩子的后果，请参考电影《刮痧》。

但是我知道，在一些传统的美国家庭，私下还是打小孩屁股作为惩戒的，不过从来不会到让小孩受伤的地步。前几天，和教会的熊伟聊天，他说美国的小孩到了十几岁难管得要命，而中国小孩在教会长大，一来由于中国家长根据中国传统进行灌输，二来因为大家看《圣经》上也说到管教的重要性，于是知道适当管教是合理的，是天经地义的，顺服父母是光荣的，反而没有什么大问题。而美国孩子从小讲平等、独立，到了十几岁，孩子变成少年，有能力消费平等与独立的时候，家长的麻烦就大了。而据我认识的另外一位家庭问题专家艾伦·马丁博士的说法，少年叛逆，多半是因为和父母关系不好。如果家长和孩子建立起非常良好的关系，既有很强的管理，又有多方支持（High Control，High Support），这种少年问题自然会消除。退一步说，其实有不少美国育儿专家都强调要对孩子进行管教，只是国内在引进介绍的时候，往往只取了美国家庭对孩子如何“民主”这一个说法而已。

斯波克医生的育儿学里，另一个被广为诟病的说法是“瞬间满足论（Instant Gratification Of Needs）”。这在美国社会尤为明显。美国人不凑合，合不来立马散伙。平时做事，也追求瞬间满足，瞬间达到自己的需要。我认识一个很有意思的美国小伙子，写了一个用于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具体就是用不同声音代表不同情绪。比如有什么好事出现时，掏出手机按一下，立刻出现放烟火的声音；沮丧的时候，再按一下，又发出气球泄气的声音。这个无厘头的程序上传到网络商店后，居然有人付钱来买。在我看来，这大概就是迎合了那瞬间满足之需。

春去夏来，人类教育孩子的方法变来变去，但是最为重要的可能还是建立亲子关系。这里得借鉴斯波克医生的一个说法，他说，对孩子最熟悉的还是父母，你们对孩子的了解，超过100个专家在一起，包括斯波克博士在内。

一只毛虫和两代人

下班回到家，孩子们激动地向我展示他们抓来的一只毛虫。女儿先找了个篮子做窝，后来又和儿子一起在大橡皮擦上挖了个洞，做新窝，还找来草、树叶，甚至一个小草莓给它吃。我和老婆都很反感这只毛虫，都说这玩意有什么好玩的。两个小孩子都不理解，说为什么会反感毛毛虫，“它们好可爱啊！”他们说。

我是反感毛虫的，因为小时候吃过毛虫不少苦头。有时候自己瘦瘦地爬上树，结果胖胖地下来了，都是被树叶上的毛虫给害肿的。大人见我突然一身包，就称我为包公包大人。还有个小伙伴，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那种，光着膀子爬树，下来的时候在树干上擦到一个毛虫。结果他这么一滑，毛虫是壮烈牺牲了，他也没占什么便宜，从下巴到肚皮，留了一道毛虫自杀爆炸的痕迹。

鉴于以上经历，我不喜欢毛虫的原因可想而知。

那么为什么小孩子会喜欢呢？后来想想也觉得自然。我给他们看过一本《饥饿的毛虫》（*The Hungry Catepillar*）。这本书在儿童中很流行，好像还得过奖。书里说毛虫饿极了，吃草莓、馅饼等等，长大就变成了大蝴蝶。内容很浅显，无非是教孩子认各种食物、数字、颜色的名字，不过有这么一只毛虫从头到尾串着讲，讲多了大

概就比较亲切。

女儿还告诉我，他们班老师养了一些毛虫给小孩观察，看毛虫怎么变化（这位老师曾经还带了个孵化箱在班上孵出了20只小鸡），老师有时候还把毛虫放在光胳膊上，让它往上爬啊爬（大家不妨设身处地想象一下，我已经起鸡皮疙瘩了）。于是，关于毛虫，孩子们就受到了一个很直观的教育，可以看到环境的变化（如光线、食物等）如何改变一个生物。今晚，女儿又兴致勃勃地唱了一首新学会的毛虫之歌，我给录了下来。

所以可能是出于这些原因，到最后，两个大人不敢碰，两个小孩拿毛虫当宠物。何况，在美国文化里，我想毛虫不是坏东西，它象征着蜕变，符合基督教“重生得救”的说法。

想想毛虫这个问题，肯定一开始，大家在小孩子的时候都不怕，接着在某个时间，成长的某个阶段，自己在这上面吃了亏，或者听到家长老是说“这么脏的东西还敢往家里带”云云，于是就渐渐敬而远之了。而眼前这些小孩，没经过这番教育，居然就把它们当成了玩偶。

在美国文化里，人还是胚胎的时候，上帝就把一些独特的东西放在了各人的心里。但人不是机器，外界的因素会影响，继而会造成一些变化，甚至有时候后天会打败先天。我们的《三字经》上也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那么“性相近”到“性乃迁”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我倒觉得有些贴在中学教室里的话就可以简要概括：“注意你的思想，因为它们会变成你的语言；注意你的语言，因为它们会变成你的行动；注意你的行动，因为它们会变成你的习惯；注意你的习惯，因为它们会变成你的性格；注意你的性格，因为它们会变成你的命运。”这个变化的过程就少不了各式各样外界的影响。

而关于这种外界的影响，也就是后天的培养和学习，有很多说法。比如“由于经历，造成行为的永久改变”；“由于思维的关联，造成行为的永久改变”；“由于社会交往，造成行为的永久改变”。多少年来，各个流派总是为这些问题争论，其实没有必要，因为所谓定义，大同小异。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我们两代人对同一个动物的不同态度，其实是和经历、思维关联和社会交往都有些关系的。各种因素一起上，才造成了我们最后的“性乃迁”。但有时候，先天（nature）与后天（nurture），谁的影响或作用大，还真是不一定。有些东西，你“经历”也好，“思维关联”也好、“社会交往”也好，好像都没有用，要不怎么老和尚说女人是老虎，小和尚还说就喜欢这老虎呢？

幼儿园在风中飘扬

在网上和朋友聊天，说起了教育子女的话题。她说，现在孩子太苦了，幼儿园变得和小学一样，小小孩子背个大书包。相应地，小学变得和中学一样，中学变得和大学一样，大学变得和社会一样。压力一步步提前，挤压孩子的童年。我说，要是以后回国，很想开个幼儿园，一个快乐的幼儿园。我觉得美国学校的很多做法是可以借鉴的，让孩子快乐地学习，学习和童年两不误。

但我的想法也有个问题。理论上说，大家都想帮助孩子快乐地学习，让他们多玩一点，给他们减压，捍卫他们的童年。可是幼儿园有幼儿园的苦衷，他们说自己面临家长的压力。家长会说，别的幼儿园都如何如何了，你们让孩子在这里玩！从你这里出来，大家都不是一条起跑线了。

人的发展是一个生态环境，是人和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发展心理学领域著名学者尤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说这个生态环境分微观型（micro）、中介型（meso）、外在型（exo）、宏观型（macro）四个系统。

微观系统，就是人在特定的单独环境下活动、角色、人际关系的总和。比如一个幼儿园，我可以把美国学校的班级原封不动地移

植过去，形成一个小的微观环境。我的教学理念可以落实在这个小小的班上。

可是接下来就要面临一个中介系统。所谓中介系统，就是和某个人有关的两个或以上相关的环境。比如一个系统是幼儿园，另外一个系统是孩子的家庭。孩子既是家庭这个系统的成员，又是幼儿园这个系统的成员。不能仅仅考虑幼儿园这一块，也得考虑家长的需求和期望。这样，事情就很棘手了。

中介系统上面又有个外在型系统。这个系统涵盖着中介系统，但是这个系统内的一些部分并不属于发展者直接的生活环境，比如孩子没法直接接触到的家长的工作环境。家长可能上班的时候和同事谈起了自己子女的教育，这样的交流会间接反馈到幼儿园，影响到教学的部署。

最后是宏观系统，就是整体大环境。大环境是人口的压力，是极其激烈的竞争，是升学的压力，是就业的压力，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教育者逐步提高学习者的门槛。家长宁可让孩子早些时候苦一点，把快乐放时间的银行里放着，以后出人头地了再来支取。要是大家都是这种心态，我搞的这种轻松一些的幼儿园，其前途就比较难说了。

不过，如果真的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环境，那么是不是就无所作为了？环境这东西即便就是铜墙铁壁，也总有那么几个不甘心的人站出来，捅上几个洞来。

另外，也可以争取不被环境之风刮倒，而是御风而行。意识到大大小小的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倒是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设计教学。其实哪个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能够轻松地学到东西？这方面大有文章可做。特别是语言这东西，小孩子本来就应该把它“捡”（pick up）起来，而不是像大人一样去啃。在幼儿阶段，它

不是学出来的，而是模仿出来的。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尽量逼真而丰富的环境。

可是很多想法，一贴上标签，基本上就完了，比如“快乐学习”。有的时候，学习也是不快乐的。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标签简化了现实，现实是错综复杂的人与环境的碰撞，现实是非线型的。

玩就是玩

有人问弗洛伊德，怎样才可以过快乐而且有成效的一生，弗洛伊德说："爱着，努力着（Lieben und Arbeiten）。"大卫·艾尔金德（David Elkind）加上了一个词——"玩着"（Spielen）。这样就成就了人生的金三角或者黑三角：Lieben，Arbeiten，Spielen，即 Loving，Working，Playing（喜欢、努力、玩耍）。一个人成年之后的悲剧，就是将三者分开，或者三缺一。喜欢、努力却无玩耍则生疲惫，身累，比如工作狂；喜欢、玩耍却不努力则无长进，心累，比如浪荡子弟；努力地玩耍而不喜欢则属应酬，身心俱累，比如大多数从事不喜欢职业的成年人。

其实，在人的童年，三者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而这个阶段能否统一好，又会影响到长大后的光景。就拿玩玩具这个事情来说，有个小孩上厕所，蹲了半天一无所获，抬起头说："妈妈，我可能电池用完了。"当大卫·艾尔金德博士在《玩的力量》（*The Power of Play*）一书中描写到这个小孩时，他并没有给出有关小孩的更多细节，但是我们可以判断，这个小孩是在玩电动玩具中成长着的。

按照 Loving，Working，Playing 的理论，一些电动玩具是好玩，是让人喜爱，可是都是些成品，孩子玩它的时候没有努力，没有心

智上的挑战性，所以一会儿就会玩厌。我们小时候下河抓鱼，怎么都不会抓厌，因为这需要下工夫，有挑战性，最终的满足是深层的。当然，假模假式的钓鱼不算。我给小孩买过假鱼竿和假鱼，原理是用磁铁钓鱼，很容易上钩，小孩没玩一天就厌倦了。后来我又给小孩买了些贴纸，让他们自己用废打印纸做书。现在两个孩子都出了好几本书了，经常喜滋滋地捧着在一边念“Once upon a time…”（从前……）。我也不知道这个办法能管用多久，但是起码我在给他们找事情做，就算是玩，也不仅仅是玩。我相信，在孩子玩的时候让他们付出点努力，在他们努力的时候（比如学习功课）增加点兴趣，对他们的成长一定有好处。

大卫·艾尔金德博士还说，孩子的玩具，应少不宜多，因为玩具多了，小孩花在每个玩具上面的时间就少了，就缺乏了那种必要的努力。我们经常送孩子去附近的博物馆参加周末的 Kids' Art 活动，不管是捏泥巴还是演小节目，总之是要让他们玩出点名堂来，不能抱着一大堆玩具在家瞎玩。有次活动是去制陶坊捏泥巴、上釉彩。我和儿子一起做了辆汽车，捏的时候命名为“劳斯莱斯”，出窑一看，瘪了，于是改名为“酒后驾驶”。

但要注意的是，玩具的功用很容易被异化。好多小朋友玩玩具，主要是因为别人在玩。他们是希望通过玩具，实现艾尔金德博士所说的“社会认同”。一定要打破孩子的这个迷思。“爸爸，他们都玩 Dora（注：一种卡通人偶），我怎么没有 Dora?”你可以告诉她：“他们都玩 Dora，可是你会做一本关于 Dora 的小书，你看谁更棒?”品牌忠诚度是销售的通行证，却可能是创意的墓志铭。你的孩子吃超人餐，用超人衣，睡超人床，开超人车，长大以后，有可能变成一个穿着超人内裤丢人现眼的废人。

玩具异化的另一个表现，是父母在玩具身上投入了不恰当的情感。比如父母经常出差，和子女聚少离多，于是买昂贵的玩具给他们，以减轻自己的内疚感。说到底这是一种自私，并没有为孩子着想，只是为了自己的心理平衡。这边牧师有一句话：小时候你不带孩子，把孩子送托儿所，他们没有抱怨。长大了孩子们不带你，把你送老人院，你会不会抱怨？

奖赏是个糖衣炮弹

“不要和我谈钱这东西，多俗啊。”这种说法，多半是出现在王朔式的反讽中。如果你当真视金钱如粪土，就会被认为虚伪、无聊、没出息，被孤立，被鄙视。这种价值观的转变，文人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有人几句话就给扭转了过来——“致富光荣”、“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等等。

然而几千年的传统，说是大雪无痕，一夜间全都消失，也不大可能。传统哪怕是被拦腰斩断了，总归还有些根残存在公众的集体潜意识里。曾经有个记者去采访“触电”作家刘恒（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少年天子》的总编导），他提出的几个问题都有个核心。那就是，你一个作家，落到以“工业”而非“文艺”为主要标签的影视界，是不是落俗了，降格了？没料到刘恒很爽快地说：“我们都是资本的人质。”这是个更大的反讽。我们以为会清高的作家，反而落落大方，丝毫不为传统所累。我们以为很大众的记者，却把自己放在传统的重负之下。

作家的使命是创作。创作需要创意。有很多事物和场合可以激发创意。古人说有三上：马上，厕上，枕上。洋人也有个类似的说法，就是创意的发挥，往往是在 Bus（公共汽车，亦即行路的时

候），Bed（床上，即将睡觉的时候），Bath（浴室，即洗澡的时候）。这和我们的“三上”一说异曲同工。两种说法都列出了一些宽松的环境，这些环境让人脱离直接的目的，所以思绪得以轻舞飞扬。

很多时候，我们在办公室这些充满目的、使命和铜臭的地方，想不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一回到家，莲蓬头一打开，突然大脑里灵光一现，有了，这个产品应该这么去做！结果你会像洗澡洗出了浮力原理的阿基米德一样，大叫一声，然后裸奔到你的书房，把想法写下来。

创意的产生过程是个黑匣子。我们只能去探究其源头，寻找有什么东西进入了这个黑匣子，亦即刺激物；然后探究有什么东西从黑匣子里出来了，亦即反应；最后还可以看这个出来的东西得到了什么样的反馈，或曰强化。这就是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一套理论。狗看到了骨头（刺激物）就摇尾巴（反应），但是每次摇尾巴你就扁它一顿（负强化），它以后看到骨头就不敢摇尾巴了。

我们可以从刺激物的角度去研究人的行为，也可以从巩固或曰反馈的角度去研究人的行为。哈佛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就做了一项试验，研究创意和物质奖赏的关系。《金融时报》有一篇关于这项研究的报道，叫“当创造力和奖赏挂钩后”。

文章说，哈佛的特雷莎·阿玛拜尔（Teresa Amabile）教授找来100多名儿童，分成两组，并提供一台宝丽来相机供孩子们拍照。对第一小组而言，他们需要先看一本只有图画没有文字的书，并且答应之后讲个故事，才被允许使用相机。对第二小组则直接说明有两件事，看书后讲故事、拍照，其间并无任何表示说，一件事需要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做另一件事。最后，当把两个小组所讲的故事进行比较时，第二小组讲故事的创意要大大超过第一小组。于

是阿玛拜尔女士得出结论：奖赏所隐含的外部控制足以削弱创造力。

这个研究对教育者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都说要开发孩子的创造力，但我们不知如何开发，或许只知道奖赏。然而奖赏有时候却起反作用，它让孩子把目标集中在授奖者可能重视的目标、价值、标准、期待上，思维的自由性会因此大打折扣。小孩子都很聪明，小脑子里都在想着父母怎样才会喜欢，怎样才能得到你许诺的奖品，而你的目的，却可能是让他发挥自己的创意，而不是投你所好。在这个过程中，奖品让创意异化变质。

谚语说，如果你的目标是月亮，即便失败，你还可以栖身于群星。如果以星星为目标，就是取法乎中，得乎其下了。同样，如果曹雪芹创作的目的是为了评一级作家，我们还有没有《红楼梦》？

童年没有起跑线

前几天，女儿去参加一场钢琴比赛，没有获得名次。不过，我还是很高兴。她才学两年不到，在她们老师的诸多学生当中，能被选去参加比赛，本身就是一个鼓励。女儿的老师曾当着我们的面教训另外两个美国兄妹，说他们学的时间是她的两倍都不止，看她进步多快！

我后来发现，老师选拔去比赛的四个学生，不是中国人就是韩国人。这两种文化里的父母，都望子成龙，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小孩学琴，家长也抓得很紧。絮絮叨叨督促小孩学琴的“中国妈妈”，在美国青少年的心目中都成了一个脸谱化的负面形象。美国家长就比较松一些，一般是让小孩培养兴趣为主，所以平时练得也少。不过，一旦美国小孩自己产生了兴趣，着魔了，那潜力也会很大。

我和这边一些理工科的朋友交流时，也听说过类似的现象。人们常说中国学生数学好，但也说一旦美国学生真正钻进去了，也会学得很好。他们若是去学，多半是出自兴趣，而不是像我们有些学生（当然不是全部），是因当年参加奥数得奖了，或是因为好拿奖学金好找工作而学。这中间有出国留学身不由己的无奈，但未必就

没有个人选择的责任。说到底还是一个兴趣的问题。

我们让小孩学音乐，是希望他们养成一个长久爱好。人需要文艺给自己一个提升，这么做不是为了逃避现实，除非你认为现实就是吃喝拉撒。我们作为人，有义务让生活超出野兽的层面，否则活着又有什么趣味呢？女儿的老师菲舍是个很好的教育者，对于自己教钢琴的事充满激情。我有一回听他说，你们现在把它当作一种训练，日后会发现它是你终身的享受。这便是让一个人去学音乐的本质所在。这位老师始终要小孩去热爱他们的弹奏，而且做得相当成功。他的学生都在乐呵呵地学，没有学得苦大仇深的。当然，我不是说快乐就是想怎么弹就怎么弹，但如果有发展的潜力而不去开发，那也是一种遗憾。在学习中应对挑战，拉伸自己，本身也是乐趣。不过我们得接受一个现实，大部分孩子以后会成为普普通通的人。我想我完全能接受这一点。郎朗毕竟罕见（事实上我很不喜欢），大部分孩子，终归只能把音乐当成一种爱好。我们中国家长，始终都带着一种“不成功则成仁”的态度让孩子学一个东西，过多施压，结果适得其反。用这种方法，每培养一个郎朗出来，不知毁掉了多少个其他行业的郎朗。我认识的每个家长，几乎都让孩子去学一门乐器。这本来是挺好的一件事，让音乐成为自身素质的一个部分。日后同学聚会的时候，家庭小宴的时候，小城办文化节的时候，随便找几个人，都可以组成一个小乐队来表演，而不是一聚到一起就晓得喝酒打麻将。倘能这样，不也挺好吗？别把什么都往出人头地上去扯。

如今说兴趣，可能显得老生常谈。可是在孩子们的童年，还真不能低估兴趣的作用。这兴趣爱好或许会影响他们的一生。我们做家长的，不过是要提供一个资源，让其在探索的过程中，找到终身热爱的东西。而我们所能做的最大的摧残，莫过于孩子本来还有点

兴趣，结果在“都是为你好”的借口下，要么被逼迫，要么被强制，结果产生“免疫”，麻木，疲倦，甚至逆反，最后一点兴趣的火花也被灭了，以至于他们成年以后，反倒不如像我这样的“牛(对牛弹琴的牛)”人——听到美妙的音乐，虽说不出所以然，但能真心喜欢。莫要把童年的一切，变成一场又一场的竞技，让孩子苦不堪言。我在连岳的Twitter上看到过一段让人无语的话：有个小孩刚上小学二年级，学校作业多，经常要做到晚上十一二点，又不敢睡，只能边做边哭，最后全家抱头痛哭。

小孩的学校里有张标语：“童年是一次旅行，不是一场比赛。”如今，家长动辄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或许我们的比喻错了呢？或许童年根本就没有起跑线呢？而孩子们往往在东奔西跑中，错过了童年。

中篇

卧底美国教育

“既然这么难，为什么没有打消她们这个念头呢?”我问。我同事说他不想这样，“是我教育她们要独立思考的”。

动物学校

辛辛那提大学的一位助理学监写过一个著名的动物学校的故事，我这里试译如下。当然，因时间充裕，添油加醋在所难免，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曾几何时，动物们决定干出点青史留名的事，于是开始组建一个学校。动物们觉得人类凶猛，为了对付这个天敌，它们必须强化奔跑、爬行、游泳、飞行、外语等多项技能。动物们本来想各学各的，但是校长猫头鹰不同意，觉得操作麻烦，不便管理。一只名叫墨哥哥的猪倒是个教务长，但它因患猪流感在家休假半年，就没发表意见。而猫头鹰校长平时都是夜间上班，不知道白天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只是按照自己的设想，认定所有技能必须齐头并进一起发展。由于猫头鹰向来是智慧的化身，大家也不好说什么，只好按照它的课程表来。

鸭子的游泳课学得很好，事实上它比教练学得更好。它的飞行也得了个及格，可是它跑步课成绩很差。由于跑步学科偏科严重，它留了一级，放学后又留下来继续练习跑步，两个鸭脚爪都跑破了，结果连下水游泳都困难。可是这个也没有人管，因为大家都是

按照教学大纲奉命行事。鸭子自己痛自己知道，天天叫唤个没完。

兔子在跑步课上一直名列前茅，可是一想到要游泳，立刻就崩溃了。后来有一天，精神崩溃的兔子跑到一个悬崖边跳下来自杀了。

松鼠跑步课成绩也很优秀，可是飞行课让它十分紧张。它提出从树上往下飞，但是老师说，由于鸭子和兔子反对，这种从高处飞的“高考”已经废除了，学校出台了一个新政策，叫“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要求大家一起，从地面同一个起跑线起飞。松鼠从地面“飞”了很多次，摔得鼻青脸肿。另外，它爬树的姿势不够标准，得了 C，游泳得了 D，综合成绩不及格。

老鹰是班上的调皮生，被整得够呛。比如爬树到树顶一项，它其实是最快的，但是由于它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式到树顶，不理学校的意见，结果被开除。于是老鹰转学到一所飞行专科学校，学有所成。日后自己创业，开了一家空中飞的公司，赚得盆满钵足，可惜后来得了禽流感，早早死了。临死之前，老鹰仰望苍穹，长叹一声：“虚空啊虚空。”

公鸡飞能飞一点，跑能跑一点，扔到水里扑腾扑腾也淹不死，所以综合成绩很好。但是它的外语成绩不过关，它有个毛病，发音不大标准，老是说：“咯咯咯。”狐狸老师说它发音不饱满，不是标准的“美音”，应该叫：“Cocka doodle doo。”老师叫它每天清早天不亮就起来，不管天冷天热，站到高处练习“Cocka doodle doo”，而且最好晨练。在把其他动物吵得神经衰弱之后，公鸡终于练成了标准的“Cocka doodle doo”，想学点别的，哪知道狐狸老师溜掉了，去教鸭子说“Quack，quack，quack”了。这种老师总是捞一把就走，不会教你超过三句话。

土拨鼠因为平时不在地面上露面，被动物们看成外来户，加上学校拒绝开挖掘课，它也上不了学。于是它开始了反抗运动，联合

田鼠等，组织了拒绝交贡粮的活动。学校本来是要靠这些贡粮来存活的，所以一度进入紧急状态，但是学校后来找了一些蛇来维持秩序，让土拨鼠们恢复了供应。

一只八哥，由于参加歌唱比赛得了第一，被学校破格录取，免试跑步、游泳、爬行等科目，直接读发声学博士。但是这只八哥必须利用业余时间给学区主任公牛啄身上的虱子。

由于学校管理混乱，飞禽走兽无不怨声载道。猫头鹰被革职了。学校想请一个见过世面的动物来管理，于是找了一只见过大风大浪的海龟。

海龟上任后，卖石灰的见不得卖面粉的，把两个尽职尽责的土鳖老师开了，请了一只原来在海里一起玩耍的大虾来一起管理。大虾不懂跑步、飞行这些技能，但是它很会夹人，于是在体育课上专门教大家夹人。海龟自己最擅长的技艺是在海滩孵蛋养小海龟，于是它就开了一门课，教学员如何用海带等将一串海龟蛋连起来，拖到沙地里藏起来。这门课叫“扯蛋学”。

然而，海龟、大虾都不适应这陆地环境，不久就死的死，逃的逃，留下一片乱糟糟。

老校长猫头鹰官复原职。但是这时候学校的学员已经七零八落，流失得差不多了。老校长想了个办法，想搞搞远程教育。他请来一只名叫夏洛特的蜘蛛，对它说：“唉，你不是会网络教学吗?”于是夏洛特开始编织一个庞大的网络，让学员一个个上网。

学员上去之后，蜘蛛采用游戏教学手段，让它们角色扮演，比如公鸡扮演老鼠，鸭子假装自己是猪等等。这被称为“第二人生”，蜘蛛小姐说这里无所不能。

“你要月亮就有月亮，要星星就有星星，心有多大，空间就有多大。”这位老师说。

一只鹅愣愣地过来说："老师，我要星星。"

蜘蛛说："你将头往墙上撞几下，然后星星就出现在你眼前了。"

鹅撞一次，眼前就全部是星星了。

于是大家皆大欢喜。

故事终。

美国小孩的阅读

国内每逢教材修订，总有一番伤筋动骨，继而吸引多方关注、各方争议。鲁迅先生在课本中的进退讨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诚然，不尽如人意处十有八九，需要鲁迅式的思路帮年轻人直面惨淡的人生。但在通往民主和法制的道路上，也需要林语堂这样的人和学生讲述生活的艺术，就地取材过好普通的一天。我曾在博客上建议增加林语堂先生的篇章，不料竟似捅了马蜂窝一般，惹来不少读者的唾沫。有一些读者显然不了解林语堂的作品和为人，仅因鲁迅先生的反对，就将其当作了反动文人，甚至把曾潜心写作抗战小说，并在国际上为中国抗战鼓与呼的林先生说成“汉奸”，让人啼笑皆非。

有次，我和读四年级的女儿说起此事，大致介绍了一下中国教材编选的重要性，她的第一反应居然是：“这不公平，每个人程度不一样，为什么要让大家看一样的文章呢?”她说应该根据各个学生层次的不同，各看各的。这话一下子说到了我的一个盲点：与其纠缠于选鲁迅还是选林语堂这种问题，思路为什么不打开一点，考虑增加学生的接触面，因材施教地实施阅读计划呢?

我女儿所在的学校，上马了复兴阅读公司开发的“加速阅读”

项目。该项目将大量的图书分门别类，再按照词汇量和难度，分成不同等级。这个等级的学名叫“学力发展水平范围”（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简称ZPD。每个学生经过测试，有自己的ZPD。学生或许在同一年级，但是根据测试反映出来的不一样的学力，老师就会推荐不同的读物。比如，我女儿现在四年级，但是经测试，她的等级为8.5，亦即阅读水平相当于八年级入学后第五个月的水平。这样的话，老师就不建议她读四年级的材料，而是选择8.0以上的材料。有些著名的儿童读物，如《夏洛的网》等级是4.4，即四年级学到第四个月的水平，《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级别为5.5，即五年级学到第五个月的水平。

图书馆也根据这套分级标准摆放图书，每个小学图书馆还配备两个图书馆员，帮助学生选择适合各自水平的图书。学校只负责督促学生阅读的量，检查他们阅读的效果，但是并不具体规定学生是看C.S.路易斯的《纳尼亚传奇》还是E.B.怀特的《夏洛的网》。这就让学生有了自己的选择空间。如果这套系统用在中国的话，那么就会减少是看鲁迅还是看林语堂还是看梁实秋的争论，因为学生可以在家长和老师的帮助下，自己去挑。

上学时，学生有固定的阅读时间，回家之后，还要在家长的督促下每天至少看20分钟的“闲书”（Entertainment Reading）。所以几乎每次去公共图书馆，我都能看到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带着孩子，背着一大包图书出来。与公众对于美国人“不读书”的认识相反，美国中小学生的读书量不知是中国小孩的多少倍。而且在我们为了一两篇文章吵个不休的时候，人家的学生已经是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一本一本不知多少书下肚了。所以我认为，应该让孩子大量读书，读闲书。我们家小孩子，一学期下来，读个二十本书是起码的，读上三四十本也不奇怪。我不让读都不行，因为得跟学校配

合，完成学校布置的任务。

那么学校如何知道学生真的读了呢？这个办法也简单。因为该项目对于每本书都有相应的测试题，学生必须用电脑完成这些测试题，积累“加速阅读积分”。这些测试分成词汇、理解、文学、研究几大块，里面又各自细分，比如理解部分包括字面理解（literal understanding）、判断和阐释（inferences and interpretation）、总结和归纳（summary and genelization）、分析和评估（analysis and evaluation），等等。我看是对应了教育专家布鲁姆关于思维和学习的分类方法，相当精细和科学。

学期结束，所有学生完成了积分要求，学校会开一个“快速阅读”庆祝会，让学生吃冰淇淋庆贺。很多学生都盼着这一天，所以很起劲地阅读，攒分数。

| 美国小孩的读写入门 |

过去的半年时间里，我惊奇地看到女儿从不识字发展到能进行简单的识文断字。她经常在图书馆抓着一本书津津有味地读。她还自己写很多句子，比如在一本脚形的书上，她写着：

My foot where nell polish. （正确拼写：My foot wears nail polish. 我的脚上涂着指甲油。）

My foot can where socks and shoos. （正确拼写：My foot can wear socks and shoes. 我的脚上可以穿袜子和鞋子。）

My foot can do a trick. （这句倒是写对了。我的脚能玩把戏。）

My foot can danc. （正确拼写：My foot can dance. 我的脚会跳舞。）

My foot can kick a boll. （正确拼写：My foot can kick a ball. 我的脚会踢球。）

My foot smell stingky. （正确拼写：My foot smells stinky. 我的脚臭。）

My foot can march. （我的脚会行进。）

My foot can wiggle.（我的脚会扭动。）

My foot can stomp.（我的脚会跺。）

My foot can play.（我的脚会玩。）

从这本关于脚的小书上，我悟出学语言的一个道理来。其实像女儿这样的读写水平在她这个年龄段算是一般，毕竟我们在家讲中文。和她同龄的孩子读写可谓是飞速进步，有些回家还加码看英文的小孩还要更厉害。这些孩子，为什么能在短短时间内，在幼儿园阶段一下子突飞猛进，从不认字到开始读书呢？原因有三。

第一，老师让孩子根据读音拼单词。比如小孩子听到“跳舞”这个字的读音，就会拼成“danc”之类。虽然不对，但是八九不离十。与之相反，我自己学英语的时候，在音标上花的时间太多。老师太关注一个音标对应的几种读音，就好像孔乙己说的“回”字的几种写法，虽然精确，但是在早期学习阶段，在人的理解能力还比较滞后的时候，研究这些是没有多大帮助的，倒不如大量积累，再整理。从学习的次序上，是先听说，后读写。你得知道，英语终归是拼音文字，凡是能听出来的，能说出来的，拼出来都八九不离十。

第二，老师不怎么去纠正孩子的拼写错误，尤其是在幼儿园阶段。因为那是最需要去呵护孩子学习积极性的时候，你求全责备，孩子会吓得不敢往下写了，哪里能像女儿那样就一只脚写出这么多花样来。我之所以发现老师的这个做法，是因为老师是到了一年级以后，才开始关注拼写的，每天在墙上写几个字让小孩子回家背，叫“word wall words”，而且也多是鼓励，尽量不压制儿童的创造性，更不打压其信心。从动机上看，这是激励为主。再说了，在一开始的时候，拼错了也能看懂。Dont u thnk so?

第三，老师的测验是考学生会的，而不是考学生不会的。在幼儿教学阶段，如果有什么“规则”，老师一般测试“规则”，而不是测试“例外”。比如动词的过去时加 ed，在这个阶段老师不让孩子再去记那些千变万化的不规则动词，如 give 的过去时 gave。这些东西到了合适的时候，等学生对一般的规律有了一定的了解后再讲。而中国的语言测试恰恰相反，就喜欢测试一些特殊性用法而不是惯常的用法，在规则动词和不规则动词的用法上眉毛胡子一把抓，缺乏循序渐进，搞得大家对什么是规则什么是例外反而稀里糊涂。从学习理论上说，这是一种不充分巩固区分的做法，是不符合学习的自然规律的。从反馈上看，美国早期语言教学是强调共性，而在日后的学习中让学生学会进一步的变化和区分。

当然，这里遍布的语言环境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很大。只是见到他们入门如此迅速，我还是感到吃惊。但愿这些总结对家长和幼儿老师有一些帮助。你可以照着做一个月，然后告诉我结果如何，这样我也好知道这些做法是否合适——

1. 找几句话教会孩子说。

2. 让他们根据读音把话写出来。

3. 表扬他们。

美国小孩做数学

今天晚上给女儿做数学题——鸡兔同笼。鸡和兔子关一起，一共三十六条腿，十个头。我问她笼子里有几只鸡，几只兔。她先想了一会儿，问我这些鸡啊兔啊有没有什么少腿的、残疾的，我说没有。然后她1—9，2—8，这么一个个对了下去，终于给解了出来，大喜。我说明天你把这个问题讲给同学听，看看他们怎么做。我一直好奇美国小孩做不做鸡兔同笼之类的题目。这么一说，女儿来劲了，绘声绘色跟我描述了他们的解题步骤：

第一步，他们会掏出手指来数一数。

第二步，他们开始抓头发。

第三步，他们会惨叫一声："啊！"

第四步，他们会叫："老师，这个题目是不是错了，没有道理啊！"老师会耐心地解释说："不会的，题目是我出的，我都有答案，你们去做好了。"

第五步，他们跑去做一会儿。

第六步，再次惨叫一声："啊！"然后说："老师，这不可能的！"老师再次耐心解释说："是可能的，你们尽管去做好了。"

第七步，小鬼们这才开始没话可说，跑去做了。

美国小孩学数学注重兴趣的培养，注重各种各样方法的使用。题目偏简单，但是方法比较新颖，名堂花色不少。比如九九乘法表，老师让孩子们制作一个转盘，转盘转到1×9，掀开相应小窗口，你会发现答案9。可是转来转去，等他们转到了2×9，女儿已经学到9×9=81。

她又跟我说她和班上同学比算乘法表的事情。因为她是用中文背的，根据《异类》（*Outlier*）那本书里所说，单音节的中文计数有利于瞬间记忆，所以她一定会比美国小孩快，这有先天优势。她说班上有几个同学向她挑战，结果惨败。比如二三得六，她张口便来。美国小孩从一乘以一到一乘以九都没有问题，但是到了二，就开始犹豫了，掏出手指来，数啊数，然后说“um，um，um”。女儿说，数字越大，他们的“um，um，um，um”越多，最后开始惨叫一声，揪自己的头发，说：“这不可能！”

还有小孩纯粹捣乱。有回我在机房上机，有个同事的孩子在给自己大声地出题目：“What is 1 plus 2 times 5 times 78 times 98 times 124 plus 98 plus 67 plus 98？”

我在边上纳闷，这题目我都心算不出来，难道是撞见了一个美国史丰收？

正要肃然起敬刮目相看，那孩子突然狂笑一声，然后叫道：“A gazillion！”（天文数字！）

| 美国小孩的选择 |

女儿被学校选去上一个班，叫“Enrichment Class”。我先入为主地以为是强化班。后来发现这个班的作业五花八门：数学题，各种各样的智力题，小小的“研究”项目，还有手工制作，如编一只篮子，用毛线给我打个茶杯垫子等。

最近这个班的课堂练习题是，爸爸妈妈要买车，学生帮着选，然后告诉老师是怎么选的。首先，用什么标准；其次，如何根据标准对不同车辆打分。老师布置的课后作业是选餐馆，将课堂讨论步骤迁移过来。比如制定标准——价格、环境、服务、音乐等，然后自己打分，比如中餐馆的价格、环境、服务、音乐，美式餐馆 Apple Bees 的价格、环境、服务、音乐，等等。

我自己是典型的标准化教育出来的，所以最擅长的练习是选 ABCD，以至于后来不管是找餐馆还是找工作，在如何选择的方法上，反应都很慢。比如：“今天晚上去哪里吃饭？”“随便。”

这关键还是缺少一个便于使用的程序、方法。而这方法其实并不难，是可以教会，也是必须教会的。

美国基础教育的一大长项，就是有很多这种“目标模糊”的作业。我们小时候上学，题目出得太板，老师讲得也太细，反而束缚

了儿童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而建构式学习的一大特色就是任务真实——比如是选餐馆，而非池子里一边放水一边装水等模糊问题。老师和家长不是带着孩子一步步走，而是充当脚手架（scaffolding）和资源，不需要帮忙的时候，不插手。这是很值得学习的。因为孩子长大以后，进入工作岗位，没有多少问题是由领导一一明确的，他们不但得自己去摸索过程，连目标也得自己去定。成功的标准，也就是这样定出来的。

从小就这么训练出来的美国学生，虽然我们经常说他们在某些方面基本功不扎实、无知，但很少听说有几个高分低能、“不适应社会”情形的。

美国小孩在学校被欺负怎么办

女儿曾向我投诉，班上有小孩在玩的时候拿沙子撒她，弄得她脸上、眼睛里、嘴巴里都是沙子，老师帮忙洗了好几次才洗干净。事后老师只给了我一张纸条，报告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印象中女儿也欺负过别人，只有一次，是拿水撒人，结果被老师记过。不过大部分情况下，女儿还是太嫩，被人欺负的多。学校的做法是每天给孩子记录，做了坏事就记过。女儿的解释是，一次过都不记会有奖品，记过一次的奖品就放在这个小孩的小柜子里，提醒来接的家长，记过两次以上就没有这样的小奖品了。闹得很厉害的时候，闯祸的小孩会被关禁闭。

我们得承认，如果是偶尔发生，性质不是太恶劣，那么小孩子之间的矛盾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今天你捣乱，明天我捣乱，谁都有这种时候。如果家长一见有事就上，自己插手，处理得不慎重的话，第一，会纵容孩子继续起冲突，因为他们知道有人“撑腰”；第二，可能无谓地失去和气。因为小孩子的脸如同四月的天，说变就变，几分钟前打闹，几分钟后嬉笑，大人为此闹不开心，老脸往哪里搁?

但是有些时候起冲突，小孩子自己完全不知情。比如他以为把

沙子撒到人眼睛里很好玩。你别以为他们知道这很危险。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作为家长，什么都得教。这种时候，我们不论是哪一方，都得教育闯祸的小子或者小丫头：这样做很不好玩，是错误的！我今天早晨还看到女儿的老师劳拉弯下腰这样教育一个小孩呢。

另外，有必要教小孩直白地表达自己的反应，否则受欺负了还不说话，成为沉默的羔羊，我看也不是什么好事。美国长大的小孩，一般对自己的感情都表达得比较外露，和人闹得不愉快，他们会说“我被你搞疯了！你伤我心了！”或者“你那样对我我会疯掉的！”之类的。这是他们老师教的方法，我觉得挺好。不能说这就一定管用，但是让对方知道你的反应，可以避免不少冲突继续恶化。另外，发生了问题，要让老师知道，这也会有所帮助。

当孩子向我们“投诉”的时候，我们不要忙着发表意见，不要先入为主地给孩子下判断，要仔细听，把情况搞清楚了再说。那种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孩子劈头盖脸说一顿的做法最要不得，比如，怒斥“你怎么不还手打他？”“你就这么让他欺负啊，不能告诉老师啊？”等等。如果孩子经常从你这里得到“他错了”的反馈，以后在学校里的任何情况就不敢对你说了，这最可怕。

如果有的小孩有“小霸王”倾向，一味欺负你的小孩，而且不是上述的这些常见冲突，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看过很多建议，总结如下：

让小孩子尽量在人多的地方出没，不要落单。人多了，欺负人的小霸王也会有些胆怯，或者他们不敢太明目张胆。

作为家长，我们要创造一个放心、安心的氛围（不要责备、评价，先倾听），让小孩子无所畏惧地把问题带到你面前。你先肯定他做对的地方，然后再给建议。

培养小孩子自信的性格，甚至让他养成走起路来都昂首挺胸、神采飞扬的习惯。常被欺负的小朋友往往是在肢体语言上就表现得“好欺负”，比如表情怯生生、走路低着头，等等。我自己小时候其实就是这样，不过那时我是个小呆子，不大和人交往，所以也没有受到多少欺负。

让你的孩子少接触一些小霸王，多读书，多交好朋友，小坏蛋们咱们惹不起躲得起。

如果小霸王嘲笑的是长相、口音、家庭来源等方面，你可以教小孩子说：“随你说啦，无所谓。”然后不理睬他。让对方知道你满不在乎，会让他们觉得这种伤害无趣。

美国人还送孩子参加跆拳道、空手道、功夫之类的班，让小孩子强身健体，真正被人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最起码不吃亏。我觉得可以看一些常见的自我防卫书籍，传授一些方法给小孩。

美国小孩的独立教育

我向来认为，成功靠自己，成人看父母。我们常说美国小孩如何独立，会独立生活、独立思考，其实很多都是父母教育出来的。观念改一下，我相信我们一样可以培养出能独立自主、独当一面的孩子来。

不久前，朋友德蕾莎跟我在 Skype 上说到她带孩子时的一些观察。德蕾莎是一个单身的美国人，在中国领养了一个小孩，自己也住在中国。按说这个小孩是长在单亲家庭了，但和一般人想象的不一样，她们过得挺好。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单亲父母更能成为最好的父母，为什么呢？好多时候，父母双方意见不一，方法不一，一个建构一个解构，一个搭台一个拆台，会把小孩搞得晕头转向，最后小孩烦了，谁也不听，就听同学的听老师的听偶像的。单亲父母反倒少了这个两难问题，可能说什么就是什么。

问题是德蕾莎请了位保姆，这个保姆是中国人，和她在带孩子的问题上意见有些分歧。我发现这些分歧颇能反映两国文化思维的差异。

比如孩子在家将玩具、鞋子乱放，保姆就责骂。

德蕾莎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不怕他们乱放，最后我给收拾好就

行了。

按照德蕾莎的反馈，我只比那个保姆进步了一点点。德蕾莎的做法是让孩子乱玩，乱放，玩就要玩得开心，然后让孩子自己来收拾。她说她事后也感到吃惊，这么小的孩子，居然真把鞋子一排排收拾得整整齐齐。我从她这里学到的一课是，孩子该玩的时候让他们玩，该负责的时候让他们负责。中国家长往往家里东西摆得整整齐齐，这个不让动那个不让动，孩子无法玩得尽兴。事情搞糟了，孩子等着家长来收拾，这样孩子过不好，也长不大。德蕾莎是少数几个让我敬佩的管理顾问之一，她把带孩子和管理的心得互通有无。比如，她提出好领导不会时时缺乏安全感，担心局面失控（比如孩子把家里弄乱），关键是要讲明规矩，明晰责任，培育能力，多作鼓励。

作为一个家长，我相信这样的顾问才明白事理，能帮助一个孩子，也能帮助一个企业解决根本问题。人在世界上就活这么一回，你一切包办，孩子始终无法成人，成了你意愿和财富的傀儡，又有什么意思？

美国大部分家庭，提倡孩子独立自主地去迎接生活的挑战和机遇。

上周末，有两个同事来我们家吃饭。一个同事的丈夫是律师，照说很有钱。可是他们家女儿参加短期留学项目的时候是自己去筹款的。方法之一是打工，打工之后钱还不够，又想办法筹款，找赞助人。家长的工作，是教小孩如何找赞助人，比如如何写赞助申请信，如何跟人家陈述，如何感谢人家，等等。赞助申请信发布之后，有位老太太回信了，提了三页纸的问题，问她学什么、怎么学、出国学习有什么好处，等等。同事的女儿像申请大学写个人陈述一样，一丝不苟地一一回复。不久，这老太太寄来了1200美元。

这一切都很费事，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给钱。不过这叫“授人以鱼”，看似是条捷径。不过现在少走的路，日后要用生活的弯路来还。中国文化里，做父母的给子女这么筹划，那么筹划，买房子盼孙子，一一照顾过来，到头来发现造就了一个牢骚满腹怏怏不快的啃老族。这是孩子的问题吗？当然不全是，这也是父母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把孩子最需要的东西教给他们，比如学会独立开展一个项目，比如如何去说感谢。

那天吃饭，还有一位同事，提到他的一对双胞胎女儿。原本我们是请她们一起来的，但她们没来，理由是她们是素食主义者。我很好奇，继续追问。同事解释说女儿看了一些反对虐待动物的科教片之后，对肉类产生了厌恶感，决定吃素，而且已经坚持了一年。“这一年很难啊。”同事的太太感叹。因为每次做饭，都得考虑给她们另外准备。她们甚至试图让父母也一起变成素食主义者，说这样更健康。

“既然这么难，为什么没有打消她们的这个念头呢？”我问。

我同事说他不想这样，“是我教育她们要独立思考的”。还有，这个同事是一名保守派基督徒，两个女儿却喜欢瑞典这种比较“社会主义”的制度，喜欢奥巴马，可是一家人和和气气，不让这些生活的、观念的差异来破坏团结。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让孩子这样独立地思维，对父母来说往往是最难的，什么事情都由父母代劳最容易。作为父母，你敢不敢这么去教育自己的孩子呢？

美国公立学校的特长教育

由于不能正确辨别儿童的才能，且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一度十分红火的奥数出走了，但引燃了更多的虚火，新花样包括“财商班”、“少儿 MBA”，等等。家长总是犯愁到底该给孩子报什么班。或许更好的办法是将家长集中起来，办一个教大家如何找到北的班。

确实，和很多家长交流的时候，常听到的一个感慨是大家都不知道该让孩子学什么。由于不能肯定，所以就什么都学。哈佛大学教授加德纳说人的才能不一样，有的擅长逻辑，有的擅长艺术，有的擅长语言，有的擅长交际，所以他提出了“八重智能”一说。他说在大中华地区（包括内地和港台），家长听了他的理论之后更忙了，因为他们觉得这八重智能一样都不能少，所以孩子下了课被送去上各种兴趣班，唯恐哪方面该补的没补到。他说还有商家说自己生产的一种饮品，可以增强他所说的八重智能。真不知道这种灵丹妙药哪里有售，我这大人都想喝一喝，补一补自己的数学智能。

当然，世上并无这等好事。那么到底如何挖掘孩子的潜能呢？众所周知，常规教育之外，孩子学什么不学什么，一看兴趣，二看才能。有兴趣无才能行之不远，有才能无兴趣学之则乏。家长一不

看孩子兴趣，二不看孩子潜能，他们看广告。有些广告的作用，是悄悄蒙上你的眼睛，让你都猜不出自己是谁。所以大家基本处在一种无头苍蝇的状态中，看到奥数热就报奥数，看见英语热就报英语。好家伙，现在都学理财了！如果只是将成人的社会缩微了，让孩子试用，学完理财后，会不会是少儿高尔夫、少儿品酒呢？学校由于应试的缘故，学科分隔，分数挂帅，给出的指引并不是很多。

我在学校工作，自己也是家长，所以比较关注美国公立学校里的特长教育。在美国，特长教育，叫特殊禀赋教育（Gifted Education）。我的朋友彭达维斯博士，曾经受邀给国内一家出版社撰写过一套青少年版诺贝尔奖作家传记，他是美国最著名的特殊禀赋教育专家之一。和他聊过几次后，我觉得中国现在亟须建立一套特殊禀赋教育体系，给家长和孩子以实际的指引。孩子不能继续这样盲目上兴趣班或培训班了，浪费时间、精力、金钱不说，更重要的是，孩子可能会被耽误。

从美国青少年培养体系来看，我觉得中国特殊禀赋的教育，需特别注意三点。

1. 专业化。目前国际特殊禀赋教育体系十分成熟，有大量的测评工具、专业人才和实证研究在支撑着这个领域的发展。当然，家长和老师的本能和判断，也是识别和培养专才的一个办法，但这毕竟有“发挥不稳定”的时候。而儿童的智力或倾向性测试，有不少现成工具可供使用。另外，在基础教育阶段，中国教育界也没有一支识别、培养特殊禀赋人才的专业队伍，大家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比家长更清楚。

2. 考虑均衡机遇。在美国，特殊禀赋教育在公立教育的体系之内，不在市场的江湖之中。美国公立小学，一般都有这种“强化项目”（Enrichment Program），由学区专人负责规划、测评和培训，不

让学生家长产生额外的经济负担。在现阶段的中国，家庭条件好的大城市的孩子，上各种各样的特长班、兴趣班，忙得团团转。贫困地区的寒门学子，即便有专长，却可能因经济条件、学校资源和师长的观念所限，不能得到及时的发现和充分的培养。这样，在潜能的发掘上，大家饿的饿死，撑的撑死。其实，在强调教育均衡的大背景下，中小学可以合并校外市场培训的杂牌军并进行整合。

3. 重视横向技能。基础教育阶段的“特殊禀赋”教育，应该注重“基础”，不要分得过细及过于专业，不然上课学数学，下课学奥数，校内学英语，校外去“英语集中营”，搞不好会变得“数学疲劳”、“英语疯狂”。在美国公立学校特殊禀赋教育班的材料上，我看到他们注重培养的居然是问题的分析、研究、解决、创新甚至批判性思维之类比较宽泛的横向能力，并无学科界限，甚至刻意模糊，且有很多是基于“真实任务”设置的课程。孩子可能今天去学如何动手编一只篮子，明天学习如何破解一个字谜，后天学习如何针对一个小话题做一番研究，并进行陈述。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横向能力”的培养，表面上看，或许不能让孩子像去上英语兴趣班那样，多记几个单词，感觉“实实在在”有收获，不过，培养了横向技能和思维习惯，日后将其嫁接到纵向学科上，孩子就会有比较强的发展后劲了。

特殊禀赋教育，应该是“殊”而不“特”的教育，能塑造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殊异的人才，这就是用相对模糊的“特殊禀赋”概念（有个性化发展和因材施教的空间），而不是“特”的教育 —— 特在一门学科，特在豪门子弟，特在局部学校。一言以蔽之，特殊禀赋教育，应该成为一种常态的教育模式。商业化的奥数被封杀、被唾骂、被鄙视后，是重整河山，展开特殊禀赋教育的时候了。

美国小孩的品格教育

美国人对青少年儿童的品格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有一种很强的危机意识，这和社会各界的长远目光很有关系。美国有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名叫“幼儿园教会我做人的一切”（*All I Really Need to Know I Learned in Kindergarten*）。此书作者认为，做人最大的道理，比如如何尊重他人，如何对人诚实，如何处理冲突，如何倾听，这些都是在小时候，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的。所以每当媒体上出现腐败政客、吸毒明星、贪婪商人的时候，人们本能的反应就是基础教育阶段出了问题。例如，看到涉案金额高达650亿美元的麦多夫诈骗案，还有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留下的伊利诺伊州议员席位被州长罗德·贝格洛维奇叫卖之类的情况，人们很自然地就开始怀疑基础教育阶段的问题。金融危机发生后，很多美国人认为这和一些政界决策层和商界人士的个人品格有关，他们的早期品格教育是不成功的。此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人深受斯波克医生育儿方法的影响，对孩子过于放纵，使得一些孩子很难教导，这就把一些过去由家庭承担的品德教育责任挪到了学校。

美国的基础教育，和我们的“教书育人”一说一样，是德育和智育并重的。小马丁·路德·金博士曾称：“我们必须记住，光有

智力是不够的。智力加品格，这才是真正的教育目标。”在18世纪，美国的一些学校，包括哈佛等名校在内，主要承担传扬宗教价值理念的任务。到了19世纪，转为传扬新教价值观。传播对象除了传统的白人，还包括黑奴、南北战争后被解放的黑人、印第安人及其他“异教徒”。各州各学校，都将这方面的责任写入学校的纲领性文件，如“使命宣言”等。例如，早在1821年，缅因州的立法者就规定，公立学校老师必须“尽量在儿童思想上施加影响，将道德、正义和对真相的尊重教育给孩子们”。进入20世纪，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学校开始承载为社会培养人才的职能，价值观教育开始让位于知识教育。但随着民权运动的开展，美国公立学校为了避免出现宗教歧视，甚少使用“道德教育”这样的字眼——因为这些字眼往往会让人联想到新教的价值观。根据美国宪法，政教应当分离，公立学校不可宣扬某一种教义，而排斥其他教义或信仰。20世纪60年代，美国曾掀起一场“澄清价值运动”，希望在不强加宗教意识形态的同时，教育学生如何开展道德选择。

因此，目前在美国，学校主要有两种：私立学校或者一些所谓的独立学校，由于不在纳税人供养的范畴之内，家长自己掏钱让孩子接受他们期望的教育。这些学校的思想品德教育可以和特定的宗教背景相结合。比如孩子们可以通过学习《圣经》“摩西十诫”中的“不可做假见证”来学习何为诚实。这方面的品德教育传统源远流长，也是行之有效的。这些教育机构的教育方法和手段非常成熟，有很多做成了著名品牌的视频（如《蔬菜故事》系列、《圣经人系列》），教育孩子相关品质。与此同时，受公众纳税支持的公立学校，在政教分离和种族、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开始追求一种所谓“价值中立”的教育。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一个有伊斯兰教家庭背景的学生，在接受有关基督教背景的教育时，就会产生意识形态

的冲突。故而，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公立学校的“道德教育”越来越多为“品格教育”所取代。但是，受“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政策的影响，现在美国的学校也强调升学，对品格教育有所疏忽。

当然，在升学主义的影响之外，品格教育的实施也面临一些问题。根据美国独立学校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巴塞特、美国学校管理者协会前任会长保罗·休斯顿和全球伦理研究会会长拉什沃思·基德尔主持的联合调查，品格教育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关系到学生、老师、学校领导和其他利益相关人，如校董。品德教育的内容设置，并不是黑白分明，它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教育者也并不一定真相在握。最好的品格教育应该欢迎学生的反馈，也应该给教育者自己提供持续培训，不然会是一纸空谈。有学者对此建议，既然在政教分离的框架下，不能无中生有地捏造出一个完全脱离宗教影响的价值体系出来，起码可以像英国一样，在多种信仰背景之中，抽取一些能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来。此外，品格教育的实施障碍还包括时间缺乏、课程缺位、教师不知从何下手、管理者两头不着，等等。一些家长和老师，还会盲目移植旧有的教育观念进行品格培养，殊不知，它本身就存在问题。

但是美国人一直在探索，一直在改进，一直在细化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比如，每年都会有相关的评奖活动，表彰在这方面做得出色的学校，好让其他学校从中得到启迪。在这方面各个学校也没有什么保密的，因为分享经验可以增加学校本身的知名度。另外，孩子的教育是大家一起共创的未来，从社会的整体角度来看，一旦社会品格和道德水准下降，整个社会、每个人的子孙后代都要为之付出代价，因而这不是一个人、一个学校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由于这种集体负责和逐步改进，美国的品格教育已经越来越成熟。

此外，关于品格教育的界定大家也各有说法。有人认为这是基本的社交技能，如服从指挥、和他人打招呼、能够合理地接受批评、需要帮助的时候知道如何求援、能够积极倾听。受过良好品格教育的学生，也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制定人生目标、努力工作、尊重他人、负责任、知道如何解决冲突，等等。而丽莎·诺尔斯（Liz Knowles）和玛莎·史密斯（Martha Smith）所著的《培育品德：图书和教学活动》，将品格教育的内容分为以下十二个模块：同理心、尊重、勇气、幽默、责任感、毅力、忠诚、诚实、合作、宽容、公民意识、原谅。从这些类别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模块，都是对以后长久的做人有着影响的、很实用的一些教育内容。

美国学生的社会实践

由于工作量加大，外加一个学生助手转学，老板允许我再招几个实习生。星期五面试了一位政治系三年级的学生。这个学生有一家网页制作公司，自任董事长。我这小庙，哪里请得起董事长大人。董事会上面只有股东大会。如果请来董事长，我还不成了股东？

胡思乱想一圈，再一看，发现董事长也在我们学校的招生办公室做事，时薪五六块钱。这种董事长，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啊。招生办公室请得，我们怎么就请不得？我看董事长水平还不错，他开的那家小小的网络公司给学校好几个单位设计网页，还给参选“州务卿”的一位候选人设计网页。遗憾的是，董事长只有晚上和星期五下午能拿出来给我们做事，不符合我们的时间要求，只好作罢。不过，由此想到美国大学生勤工俭学的各种渠道。

美国学生比较能上能下，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愿意去做。北大毕业生回去卖糖葫芦，放在中国是新闻，在美国就不是新闻。我办公室的几个小孩，大部分都打过各种让人看不上眼的工作，比如在饭店或者快餐店当服务员的实习生有两个，一个在 Bob Evans，

一个在 Subway。还有个学生本来在我们办公室做录像编辑工作，后来跑到 Best Buy 卖电器。

美国大学学费非常昂贵。比如，我以前就读的雪城大学，一个学分 800 美元，一个本科学生一年修 20 至 30 学分，那就是 16000 至 24000 美元，外加生活费，一年没有两三万备着下不来。很多家庭采用所谓三三制，就是家里出三分之一，贷款三分之一，自己挣三分之一。挣钱的门路五花八门。除了我在办公室看到的情形之外，其他很多地方也都有学生的身影，商场结账的出纳大部分是临时打工的大学生甚至是高中生，比如 Wegmans（纽约一家大型超市）就经常招收高中生打工。这些学生一是挣钱，二是积累社会经验。由于一直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老美的年轻人多半显得比实际年龄大，比较成熟。比如在 YMCA（基督教青年会），救生员几乎全部是打工的学生，并且很多是附近高中的学生。前总统里根就曾经当过这样的救生员。他们这些打工的经历，以后都会写入履历，成为申请大学的材料内容之一。还有些在 YMCA 托儿所打工的学生，也都是从高中开始就一直在这里，后来在附近上大学，继续在此打工。总的感觉是，这些实习生不是很在乎工作是否对口，什么都做。关键是学会挣钱与接触社会。事实上，教育带给人的，不仅仅是一个学科的知识，也应该包括考虑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也有一些校外工作是和专业学习结合在一起的。比如，照说不好找工作的英语专业学生（美国的英文系好比国内的中文系），最近一个流行的做法是服务式学习（Service Learning），即让学生把社会实践结合到课程的学习当中去。这样的做法也开始被其他学院诸如管理学院所采纳。比如，关于非营利组织的管理，空洞地说上一堆概念，学生不一定能掌握，但一旦让他们亲自去红十字会实习一回，了解其运作方式，即便不胜过老师的灌输，也一定是非常好的

补充。事实上，众所周知，德鲁克就是从非营利组织的工作实践中，而非常理以为的企业实践中，悟出管理真经并加以发挥，最终成为一代管理大师的。另外，在教学过程中，美国教育界也鼓励学生从实践入手，把课程作业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比如，上问卷调查课，要完整地设计出问卷，还原调查过程中的所有细节，包括说明要找什么样的对象，怎么和他们联系，他们不理睬你发出的问卷你怎么办，怎么跟踪。整张问卷具体内容的设计，每一条都像被老师和同学拿着放大镜审查一般。很多学生完成的问卷，都直接可以拿出去使用。相对于市场需求，经过这样严谨训练出来的作业应付起来绰绰有余，而不是与之脱节。

美国学生进入新的工作岗位，很少有所谓的“适应期”。在学校做的是 project，在社会上做的也是 project，一旦养成思维习惯，就不需要花太多力气从头学起。记得以前读本科的时候，老师只是在暑假让我们做社会实践。这种做法是在说：社会实践不是学校的事，而是你们放假回家自己做的事。

有人比较过英美教学方式（详见《剑桥和麻省：共念教学经》一书），发现对社会实践的重视可能是美国教育中像指纹一样鲜明而独特的特征。中国有点像英国，重视知识的积累，难免有些与社会脱节的问题。再者，脱节问题的另外一面是，教育毕竟是个开放的体系，和社会的其他环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让学校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其实不难，难的是哪里有这样的机会提供？我们面临的是，扩招后大学毕业生尚且找不到工作，遑论开放职位给在校生呢？当然，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美国大学的进和出

进——迎新

记得接过一个工作任务，是开发网络视频版的“大学入门”（UNI101）课程。这门课程旨在帮助刚刚入学的学生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课程内容包括各项学术政策（如休学、退学、肄业政策，学术诚实政策）、学习技巧（时间管理、目标设置、倾听技巧、笔记方法）、个人发展（毒品和酗酒、性行为与责任、多元化、健康与营养、压力管理）和学校服务（图书馆、心理咨询、安全、职业服务、校外活动），等等。

除常规内容讲授外，学校还会安排视频制作组准备相关材料。这门课为期十周左右，是所有新生的必修课。我觉得国内的大学也应该开设一门类似的课程。现在迎新活动节奏快，信息密集，不少新生根本记不住，加上很多人是头一回离家，进入完全陌生的环境，很容易产生各种心理压力。

我们学校通过这样的课程，以及其他的网络渠道，想方设法用最方便的方法，把学生需要了解的各项内容，以最合理、最有吸引力的方法传达给学生。学生不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者的错

误。学生知道了不执行，那才是他们的责任。

出——找工作

在一次 Blackboard 全球用户会议上，迈阿密大学校长、前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署署长多纳·莎拉拉（Donna Shalala）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观点。她说高等教育应面向学生的“第三个工作”。如今社会流动性这么大，一个工作就找对，一做就是一辈子的恐怕只是很少一部分人了。大部分毕业生会在经历头两个工作的尝试之后，终于定下心来，知道自己一辈子要做什么。教育在学生人生当中产生长久影响的，也正是这第三个工作。而在第三个工作中你有没有创意、会不会思考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学阶段的影响。

头一个工作是用来碰壁的，第二个工作是用来积累经验的，往往到了第三个工作，才有可能让“工作”（job）变成“事业”（career）。而衡量高校的成败，不在于前面两个工作，而在于第三个工作。我猜不能针对前两个工作的原因，是学生找头两个工作的时候根本不清楚自己的斤两。另外，老师也不能太目光短浅，仅看到学生找到工作就算完事。

不知“高等教育应该针对第三个工作”这话，大家以为然否？

美国的师生互评

学期结束，我问同事约翰他班上的学生成绩。约翰教一门哲学课，他说给了一个优（A），7个不及格（F），其余都是良（B）。这让我想起一部电影来——《一个婚礼和七个葬礼》。老兄怎么下手如此狠毒？后来想想，也许是因为他不需要评终身教授，不怕学生报复，因此大开杀戒，即便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

真要树立老师的尊严，光用嘴巴说是没用的，得让他们有实质性自由和足够的权力，比如在评价方面。其实在评选终身教授之前，美国教师也不敢在学生中树敌过多，可是一旦过了这个阶段，他们就比较无所谓了。

终身教授这个体系的设计思想，原本是要学校无权因为优秀教师的言论等问题将其解聘，是要保证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但和世界上任何一种体系一样，这种设计也有软肋。比如，对新教师而言，在评上终身教授之前，往往是物质条件最差且教研任务最重的时候，但没有办法，只有苦熬。熬不过去的只有另谋出路，跳槽或者转行。一旦熬出头，有些人就会暴露出懒汉、混子的真面目。因为到了这时候，除非他们犯了性骚扰、剽窃这样的严重过失，否则，学校是不能动他们一根汗毛的。

不过，和其他更糟糕的体系比起来，这还算是好的。在中国，老师在社会上被捧得高高的，可是口惠实不至。听几个当老师的老同学抱怨，如今学生总是对的，家长总是对的，责任都是老师的。任何评估评价系统，如果是一边倒，那么几乎可以肯定是不合理的。有来有往，有批评也有反击，才会走向合理。

“给教授打分”网站（Ratemyprofessor. com）是个值得思考的好例子。这个网站在美国大学十分火暴，很多学生会在选课前看一下这位任课教授得过的评价。虽说网站需要用户注册使用，但学生的评价和评论却是匿名的，这样一来，学生又可以放胆评价一些教授，以至于什么言语都可以说出来。这其实对老师很不公平。我在想，为什么不会出现“给学生打分”网站（Ratemystudent. com）呢？如果有，如果老师和学生一样刻薄，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评论：

有可能的话，尽量不要让这个小混蛋来选你的课。
一个纯粹的纨绔子弟，腹中空空。
笨到这种地步，怎么不去申请吉尼斯纪录？
如果她都能跑来学护理，我家的那只狗都可以去学内科了。
他整个课堂陈述完了，我还没有听懂他说的是什么语言。
……

当然，现在这个网站是不存在的，但最近在“给教授打分”网站上也出现了一些教授的反击——辩护的、澄清的、自嘲的都有，十分精彩，大家可以去首页看看。

玛丽山曼哈顿学院大学英文教授威廉姆斯被学生说成一个“怪人”，他的回答是，什么叫怪人，怪人就是在自己的后院里办动物园或者有类似古怪行径的人……再说怪人得有钱才能怪，我们大学

教授想作怪也没钱。

罗格斯大学政治学教授布朗纳的学生说他太刻薄，太不切实际。他回答说，不错，他有时候是比较辛辣，喜欢讽刺当下的政治人物。有学生说他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可惜的是，大部分上这种入门课的学生，连这些概念是什么意思都还没有搞清”。

心理学教授海恩斯是一位美女教授，学生说她的课程太难，可是很漂亮。这位教授得意之余劝学生对那些相貌平平的老师公平一些，不要太狠。

纽约大学艺术系的一位教授也挺漂亮，有学生留言说：“我做她奴隶都干。”她回答说：“可惜我对蓄奴没兴趣。我对研究者比较感兴趣，而你不是这种。”也有学生说她老忙自己的项目，不管他们，她的回答是：“我不是你妈，对你什么都管。”

纽约一个社区大学的教授杰夫·洪很倒霉，学生说上他的课得带个枕头。这位老师反问：“班上其他人都没睡着，就你睡着了，那这到底是谁的问题?”

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一个教授被学生抱怨作业太多，他回答说：“是吗，作业很多？你干吗不回去读高中？这可是大学!”

国王学院哲学教授欧文的学生称其傲慢，他的回答是：“唉，要是你像我这样，受过良好教育、头脑聪明、表达清晰，你也会傲慢的！不过考虑到每日接触的都是这些学生，我已经够谦虚的了。”又有学生说他很狗屁（He sucks），他的回答是：“你学了一学期哲学，从柏拉图学到尼采，结果就吐出这点象牙来?”

美国教授面面观

终身教授

在19世纪，美国高校的校董或捐助人可以因教授的宗教观点、政见或其他言论炒其鱿鱼。直到1915年，美国的高校教授协会（AAUP）才提出一系列教授聘任的指导原则：1. 学校校董可以提高教师工资，但是不可添加违背其个人意愿的附加条件。2. 只有教师组成的委员会可以评估教师，教师评估不受外部决策的影响。3. 教师只能由教师代表和院系负责人任命，需要有：（1）明确的聘用条款；（2）终身任命制度；（3）明确解聘的前提条件。这些原则渐渐演变为终身教授制度。在这一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发起学术自由运动的教育家杜威等学者功不可没。

当然，凡是“铁饭碗”都是有利有弊的，终身教授制度也不例外。由这个职位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回报总是滞后于实际需要。2007年，我去波士顿参加一次会议的时候，就听《魔鬼经济学》的作者之一、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史蒂芬·列维特说，终身教授制度是世界上最荒谬的制度之一。

首先，终身教授制度对学术和言论自由的保障是有限的。部分

原则、利益有时会架空自由原则，比如所谓“政治正确”。2005年，哥伦比亚大学一群学生曾签字请愿，要求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C·柏林格辞职。起因是，哥大的一些犹太学生向校方汇报，中东研究专业的某些教授在课堂上有激怒犹太学生的言论，让这些学生感到了“恐惧和危险”。于是，这位校长在一次演讲中表态：“在课堂上涉及学术自由也应该有个限度，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这一说法立刻激怒了另外一些学生，他们成立了一个抗议小组，写了请愿书，称校长“没有保护我们的教师，所以在整个大学内，形成了恐怖和威胁的氛围”。有老师在呼应学生的请愿时就说，校长试图“在教室里平衡各方观点，这就对学术自由形成了直接打击”，这种做法只会导致“完全的平庸”。“政治正确”本意是好的，到头来却在平等的名义下，把自由放上祭坛，作为牺牲品。“政治正确”也让一个试图教钟型曲线的教授被学生控告，因为他的书似乎贬低了黑人的智商。

如果说在保障自由上，这个制度有心栽花花不开，那在奖励懒人这一方面，终身教授制度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过了终身教授评选，一些懒汉、混子就开始暴露真实面目了。无论他们在大学里怎么混日子，学校也拿他们没办法。前几年我上过一门课，老师就是一个终身教授。这门课程本来应该有三篇论文要交，到了交最后一篇的时候，老师问：“你们大家对自己目前的成绩是否满意?”我们说还行，他就说：“那好吧，最后一篇论文免了。”这样他就不用去改，我们也不用去写，大家皆大欢喜。可是回头再一想，这学期实在是啥也没有学到。就算是这样，学校也无计可施。所以，在美国的大学里，大家说让一个不称职的终身教授滚蛋，除非“死亡、退休、自己走人”。

“打工”教授

为规避终身教授制的弊端，越来越多的学校正在增加非终身教授职位，比如合同只签一两年，到期并不进入终身教授评选的教职。另外，兼职教授队伍也日渐壮大。相对终身教授，他们更像是大学里的打工仔。

一般说来，兼职教授在学校里的地位没法和终身教授比。他们的自主权比较小：每个学期上什么课，给多少人上，自己往往做不了主。如果系里临时把课程取消，他们都没什么办法。不过他们大多更为敬业，因为他们教不好的话，接下来的一个学期就有可能不再被续聘。这些兼职教授的地位很是尴尬。

有一回，我去英文系帮一个老师准备网络课程。下午三点多钟，他刚下课，正啃着一个汉堡包。我和他说话的工夫，还有不少学生跑来问问题。我问他怎么这么忙，他说他教四门课，还在另外一个小镇的社区学院教另外一门课。除了这些教学任务之外，很多时候，作为兼职教授还得参与学校其他很多活动，比如写作指导小组、毕业生论文指导小组，等等。我问他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忙，“得付账单啊。”他苦笑着说。

记得一位研究莎士比亚的英语系教授也曾模仿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台词说：“霍拉旭，天地之间，还有很多账单，是你的哲学所不曾想到的呢。”英文系教授工资本来就不高，兼职的自然更糟。我所在的教育专业也好不了多少，教育系一个老师自称自己是文科的“穷亲戚”。而一些热门专业的老师收入则很高。以前一个教育系老师指着街对面的管理学院说：“大家同是教授，可是街道对面的腰包比我们不知要鼓出多少。”

很多人文学科和基础学科院系提供的工作机会本来就不多，终身教授的职位更少，很多人就只有去做兼职教授。他们行色匆匆，奔忙于不同的教职之间，担负着大部分本科新生的课程教学任务，收入却甚是微薄。在我们学校及附近的一些大学，一学期教一门课，收入只有 1800 美元左右。如果单靠这点工资很难维持生活，因此很多教授必须从事其他工作，或在多个学校兼职。

学校使用兼职教授，可节约成本，但这对老师并不公平，对学生也不公平。学生每年或许要花三四万学费，而兼职教授的收入或许也只有三四万。学校一方面花重金请来大牌学者，一方面却用这些兼职教授去教学生。很多兼职教授十分出色，可是学校并不给他们提供任何资源，比如不支持他们去参加学术会议，等等。有的甚至连办公室都不配备，又如何让这些兼职教授对学生实施课后指导呢?

然而，大学越来越像公司，越来越“懂”开源节流的道理。他们争取教育经费，却削减教育投入。用《高校不是公司》一书中的说法，教学越来越不重要了，而这本该是高校的使命之所在。

“老板”教授

从前的师生关系就是单纯的师生关系，老师给学生打分，学生也参与老师的评估。而现在，师生关系日趋复杂。很多高校转为“研究型院校”，在那里，教学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研究，或者是创收。比如，一些高校为了节约开支，聘请学生从事各种临时性工作，助教或助研，有一些老师把这样的学生视为“私人打工仔”，过度使用而形成利益冲突。有时候，老师在外面另开公司，所经营的业务与研究内容相关，更易产生矛盾。

在斯坦福读书的大卫·扎波尔就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他的导

师盖瑞·诺伦是一个学术新星，掌管一个实验室，同时也在外面开了一家公司。有一次，扎波尔的同学罗森·博格去诺伦的公司开会，发现他和扎波尔的研究成果赫然出现在公司的投资人会议上，而演示中丝毫没有提及这两个学生的名字。二人向导师提出此事，反遭责备。而实验室的其他人则集体失声，因为不少人已在诺伦的公司就职，或担任顾问。后来扎波尔无奈地离开了实验室，也终止攻读博士学位。

暂时还没有离开的罗森·博格后来发现，一旦自己公布研究计划，作为公司老板的导师就可能另找人做类似研究，以其人力、物力，会很快拿到结果。这样一来，自己的导师便成了自己不对称的竞争对手。另外，作为新入门的学者，罗森·博格要和学术同行交流成果。他联系的学术同行凯特·林教授也有一家公司，正好和诺伦的公司是竞争对手。导师得知此事后，严重警告自己的学生不要和凯特·林教授联系。无奈，罗森·博格也只有离开。

有着自己公司的老师们，变得越来越不像老师，而像老板。我曾经上过一门测试课，课程内容与课程名称不搭边，明明是一门测试课，却花半天时间来复习早就学过的统计。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位老师在外面开着公司，所以就把工作内容作为教学材料使用，就连上课讲的笑话也都是公司工作中的笑话。这样的“老板”老师根本不管学生需要学什么，而是自己怎么方便怎么教，最终害苦了学生。

以前对美国教授的印象是一元的，等我在教育这个行当里工作几年后，发现原来教授也是“品种齐全”。就如同我们的一个教授所说，美国教授也是“马赛克一样品种繁多，绝非大石板一样千人一面”。

不过话说回来，哪一行不是这样呢?

美国的中文学校

《哈佛教育评论》曾经刊过一篇署名 Min Zhou 和 Susan S. Kim 的文章，分析中国和韩国子弟学习成绩为何如此优异的问题。通常，人们将其归因为儒家文化的作用。这篇文章却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即单纯的文化价值观未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而“社区力量”和“社会资本”却能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文中特别强调了美国的中文学校在中国学生成长中的影响。

美国的中文学校体系最早可追溯到 1880 年，此后近 60 年间，美国一直实施法律排华，中国人社区为了自救，开始靠自己的语言学校让下一代得到受教育的机会。1884 年，美国第一所中文学校在旧金山唐人街成立。现在，美国中文学校协会属下会员分布于 41 个州，各式各样的中文学校遍及全美。

一般来说，在美的中国家庭居住相对分散，大家虽然都是华人，可是平时见面机会不多，基本就是参加教会活动、家庭宴会、中文学校几种途径。但是一些中国家庭并无信仰，不去教会，而家庭宴会又缺乏教育含量，末了反倒是中文学校提供了一个社区有效交往的契机。大家每周在固定时间来到中文学校，使得中文学校“成为社区重新连接与交往的一个地方”。

对家长来说，这里可以交流教育子女的经验，成为“家庭和美国学校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让家长有机会相互取经，从其他家长处了解到美国教育系统的运作”。从我的经验看，确实有不少家长在中文学校交流子女所在学校的不同做法、经验及相关教育信息。这对一些英语不好的家长来说尤为重要。

对孩子来说，中文学校之类的组织“给移民家庭的孩子提供了一个组建伙伴网络的机会”。这样的网络能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一种独特的支持作用。

另外，当孩子在各自的学校求学时，多少会面临“融合”到当地人群中的压力。在一些并不多元的地区，来自中国家庭的孩子在学校是少数，有时候这会给他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压力。而到了周末，当他们一起在中文学校上课的时候，能够结识来自其他学校的背景类似的学生，并成为好朋友。对一些在学校面临种族压力的学生来说，这样一个独特的“圈子”能有效缓解他们的压力，成为一个让他们骄傲的社交资源。参与中文学校，也能够帮助他们形成对各自背景的自豪感。

中文学校所教的一些传统故事，也在潜移默化地传播一些传统的价值观，有一些是能直接影响到孩子以后的学习态度的。比如，“凿壁借光”的故事，肯定刻苦学习的重要性。在美国学校，只要学生做得稍微超过一般，老师就会狠命表扬。长此以往，就如同温水煮青蛙，孩子在成长中很容易失去一些精神。当然，有些孩子可能并不喜欢这些中文学校，因为到这些学校充电，他们周末就无法和普通小孩一样玩耍。但这种额外的知识充电，却能给他们的未来带来无法一时立竿见影的竞争力。

在美国发论文

我和在国内从事教育工作的兄长合写了一篇教育论文，待到录用通知到手，却还发现一张“版面费”通知。后来向学术界朋友打听，才知这是如今发论文的“常识”，收取版面费已经相当普遍。朋友说还有一些假期刊鱼目混珠，借版面费之名，行诈骗之实。这是一个因为学术评估体系不当滋生出来的衍生市场。

论文数量及被某某索引引用数量，常被当作大学竞争力的重要衡量标准。一些高校，时常把学校论文引用数量拿出来当成绩炫耀。而且，为了追求这样的成绩，一些院校赶着教师、研究生发文章，不发文章不许毕业，或是在某某刊物发了文章就五千一万的奖励。这样一来，大家就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套用美国议长论医改的一段话，发文章的大门关上了，就翻篱笆；篱笆太高了，就撑竿跳；撑竿跳不过去，就跳伞。结果象牙塔内，只要是个哺乳动物，一些年下来，个个著作等身。出去一问，谁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他们有什么社会影响。论文发了一大堆，但是教书的不会教书，育人的不会育人。

学术论文的泡沫化，和房地产的泡沫化一样严重。认真去看那些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个人觉得百分之九十是没有多少价值的，是

废纸一堆，是自说自话。从前大家说“不发表则完蛋”（Publish or Perish），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发完就完蛋”（Publish and Perish）。perish 在垃圾桶里，读者不会去看。

有人说美国也这样，也要交版面费，只不过我自己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所在的教育技术圈子，发几篇小文，稿费是没有，可是没让交过钱。不知道其他学科怎样。不过还是平衡记分卡发明人的那句老话，衡量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利益催生了论文市场。即便在美国，也有职称和终身教授评选的驱动。

但是，美国学术界评估的标准已经在悄然改变。一些学术机构的终身教授评估，标准渐趋多元。比如，强调职位申请人自行定制的学术“成果组合”，弹性就比较大，参加学术活动、学术会议、相关社会服务都可以算人，不单单以论文多寡定成败。

文科最大的学术机构之一——“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近年一直倡议将学术评估多元化。早在 2006 年年底，协会就发布了一个关于终身教授评选和提升的报告，并成立了学术评估改革的专门小组。评估改革报告中，极为重要的一条，是打破学术论文的垄断地位：“业内总体来说，必须反思专题学术论文（monograph）的大一统地位，鼓励学术散文（Scholarly Essay），用多元渠道评选终身教授，还需利用学术成果组合的方式，以拓展对于学术水平的认识。”

另外，该协会还鼓励考量教师通过新媒体（如网络）发表的文章。无独有偶，论文学术规范的发布者之一——美国心理学会学术规范（*APA Style*）最新的第六版中，就有大量网络图书、刊物、文章等资料的类别，博客和播客也已成为被引用的类别了，比如，发表在新闻组、网络论坛的帖子，发表在电子邮件组的信息，博客条目，视频博客条目。

当然，这些新媒体的可靠性、严谨性有待商榷，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新媒体和电子读物层出不穷，发表文章的方式也在不断更新，对于一个人学术成果、思想水平和社会影响的衡量标准，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

如果说新媒体还不能被所有人接受，那么将介于个人网志和传统论文之间的学术散文纳入评估标准，我想学界很多人是不会反对的。学术散文不按照学术八股格式写就，虽不具“形式严谨”（如引用范例）的特征，但是“思维严谨”（如论证深入有力）。发表这类文章的刊物未必是核心期刊，可是这些期刊上的一些文章颇有见地。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上就有不少学者写的文章，其思想性和可读性都非常强，也算是学术散文，虽然这些文章也不算传统的“专题学术论文”。

从领导挂名、论文买卖、发文付费、抄袭成风、假刊物横行这些现实来看，过去看似公正的论文评估标准算是失败的。如果改革评估标准，保证就会挤掉很多学术泡沫。若能这样，国内学界大概也不会一叶障目、本末倒置地追求“影响因子”，而去追求实际影响了。

美国高等教育的三大趋势

今年的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系统（Educause）年会地点在丹佛，以往年会上都会看到中国高校的代表，这次不知为何居然没撞见。有次吃饭，看到几个黑头发黄皮肤的，我便跑了过去，却发现是日本人。

这是我第一次到丹佛。丹佛是美国地势最高的城市之一，由于前几天下过雪，从机场到宾馆的路上，看到远处的山顶还是白雪皑皑。城市就在雪山脚下，城市上空是一片澄净的蓝天。丹佛地势高（被称为“海拔一英里高的城市”），阳光足（机场附近就有大片太阳能采集装置），很像西藏。果然，我后来在街上看到了藏人的商店。

这一周，丹佛的天气都很好。蓝天白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次会议上，讨论的趋势之一就是“云”。这个“云”概念原本是计算机专业的术语，但也延伸到了高等教育一行。在高教里，相应的说法叫“above campus”（空中校园）。Educause的主席奥布林格博士给高等教育总结的三大趋势之一，便是从“实体校园”（on campus）到“空中校园”（above campus）的转变。所谓空中校园，指的是利用技术手段，实现资源的共享、研究的协作，等

等。这次大会的闭幕演讲人是英国开放大学的前副校长。说起“空中校园”，就不能不说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这个系统要是做好了，也一样值得世界关注。事实上，前些年我们学远程教育，都常提到中国的电大系统。这位前副校长说，过去开放大学做课程，有很多和BBC合作，让课程惠及大众，而且这也是开放大学树牌子的一个好办法。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的基础设施很好，过去也有和电视台合作的做法。可惜后来中国的高教系统基本上是金字塔格局，资源向上集中，还是早些年“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思维。那些沉在下面的学校，资源越来越少，生源越来越差，故而优势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在整个高教体系中沦为拾遗补缺的角色。但愿在未来，这个系统能发挥出其自身的优势，能像英国开放大学、印度的甘地大学和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地的远程大学那样，发挥出它的优势来。不过，电大能不能咸鱼翻身，除了看系统内部的努力，也得看教育管理部门的导向。这些部门不能把钱都砸给少数几所名校，让其他学校像没人要的孤儿，有上顿没下顿的。让不同的教育模式共同竞争其实是很有必要的。一个系统，如果封闭，最终就会变成死水一潭；有开放性，允许传统教育和另类教育平等竞争，让后者有机会进入主流，才会形成良性循环。提高国际竞争力，不能用这种金字塔体制。一个符合教育规律的体制，才有最大的国际竞争力。

回来的路上，我看了一份最近的《高等教育纪事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报上提到中国九所名校结成了C 9，号称“中国常青藤”联盟，学分可以互相承认。这当然是一个好的动向，不过，这种学分相互承认的做法不应只限于这九所高校。美国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借鉴。由于经济方面的考虑，美国学生会在暑期跑到社区大学去修一些公共必修课（因为社区大学学费非常低廉），然

后将学分转到自己所在大学。有不少学生甚至先在社区大学读完两年再转学，转入更好的学校，这样既可以拿到名校学位，又省下了学费。虽然照常理来说，名校课程质量应该好于普通学校，可是事实往往不是这样，最起码不是所有课程都比普通学校好。我自己以前在本科上的某些课，到了研究生阶段居然要重上，但感觉相差无几，只不过高校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孤芳自赏各搞一套，结果造成了各种资源浪费。衷心希望校际合作那小小一片“云”呀，吹呀么吹过来，也给普通学校一点机会。九所名校不带其他人一起玩，那云彩也太小，就怕最终整不出什么风雨来。

会议上所说的第二个趋势，是从“拥有”（ownership）到“接触”（access）。我听过不少这方面的感慨。现在的老师，尤其是美国名校的老师，一窝蜂地把自己的课程往网上放。会议上还有老师开玩笑，说自己学校的那些名教授，还为自己的课程没有进入 iTunes 同类课程前 25 名愤愤不平。而在过去，老师上课为了避免自己的“看家本领”被人偷招，甚至严禁学生带录音笔偷录。如今，大家纷纷拿出自己的知识，抢着来分享了，再不分享就迟了，话语权和社会关注都被他人抢走了。

到底是什么因素改变了这个游戏的玩法呢？是技术。过去，知识传播是通过教室里的传授，通过老师对学生的讲座，实现知识传扬。而今大家获取（access）的方式多了，越来越像去吃自助餐，纯粹是取己所需。学生对自己的学位已经开始解构，同样的课程，学生可以在 A 学校选一点，在 B 学校选一点。至于学科学习也一样，比如，同样学习微观经济学，学生可以去 Academic Earth，YouTube Edu（注：两者都是美国高校课堂视频汇集的网站或网站频道）或者一些有开放课件的学校，去听最好的讲座。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受所在学校和授课老师的限制。我记得《快公司》（*Fast*

Company）杂志上还有篇报道，说有人已经在设计这种灵活的学位（当然不是文凭工厂、野鸡大学那种）。

另外，知识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界限日趋模糊，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传统的知识受众——学生）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现在有了一个新词，叫“生产—消费者”。在这样的环境下，知识贵在创造，私人对其囤积居奇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不是教育者愿意看到的现象，但无奈它是一个现实，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它都是朝这个方向走的。

第三个趋势，是从“保护”到“共享”。会上，《再混合》（*Remix: Making Art and Commerce Thrive in the Hybrid Economy*）一书的作者、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劳伦斯·莱辛（Lawrence Lessig）发表了十分精彩的演讲。他呼吁教育界人士组织起来，推翻过去不合理的版权理念。他说，公众对法律怀有一种奇怪的敬畏，而在法学界内部，大家对知识产权保护法深表怀疑。这些法律让人费解、糊涂，前后不一，且不便使用。它产生于19世纪，当初是为了保护作者、艺人等各方面的经济利益。而今，这样的版权法律仍然适合用来保护歌手布兰妮卖唱片，但不适合高等教育内的知识产权。高校肩负着教书育人和引导创新的双重责任，而布兰妮式知识产权保护的烦琐规则，妨碍了学界的交流和创新。针对高等教育网开一面的所谓“公平使用”（Fair Use）则因界定模糊，可操作性极差。据我观察，高校老师基本上是各按各的理解在“公平使用”，说白了是一片混乱。我听过很多关于“合理使用”和“版权保护”的报告。报告人有律师，有老师，有决策者，结果发觉每个人都有一套说法，不去听还好，越听问题越多。

高校知识产权保护有时候起到的是反作用，会抑制创新。比如，一些本该让大家看到的学术期刊，由于费用昂贵，很多小学校

订阅不起。美国有不少期刊，针对学校的订阅价格比针对个人的订阅价格不知贵出多少倍，一旦学校出现经济危机，期刊订阅往往是最容易被砍的项目。知识产权的狭义保护，使得它们的分享很难实施，甚至会导致一些材料无法传承下去。纪录片的转录就是一个例子。过去一些老纪录片以胶片形式存在，可保存时间有限，只有数字化，才可以长久保存下去。可是按照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根本就无法转录成DVD传播给后人。纪录片是很多小片段的组合，每个片段都去申请，让版权许可人同意翻录（而且一般这种授权会有期限，比如五年），那么这整个版权的处理过程或许会超过五年，就算请得起律师花得起钱也找得到人，也耗不起这时间。所以大量材料会死掉，无法传承下去。这对原版权所有人是没有多少好处的。

但是莱辛教授也不同意采取“革命”式的方法，按照“废除版权主义”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而是建议折中，按“创作共享”（Creative Commons，简称CC）的思路解决问题。从过去的“保留所有权利”，转入“保留部分权利”。CC运动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白宫网站发布的内容也都采用了“创作共享”协议。作为该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莱辛教授呼吁，在高教领域，也要开展一场教学共享（Teaching Commons，Learning Commons）运动，让知识成果在教育界、科学界更容易传播、激荡、更新，也让它们更容易进入大众，造福大众。

奥巴马式教改

接受民主党提名竞选总统时，奥巴马称他得到的机会是教育给的。没有良好的教育就没有今日的奥巴马。当上了总统之后的奥巴马，又将如何反哺教育呢？由教育周刊（*Education Week*）杂志社编著的《奥巴马教育计划》一书，集中论述了奥巴马的教育策略，从中可看出“变革总统”奥巴马政府对教育改革的宏观规划。

国家兴亡，教育有责

从书中我们看到，奥巴马将教育和美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成败联系在一起。书中记载，2008年6月16日，奥巴马表示，在这个数字时代，受过高等教育，不仅给个人提供机遇，也关系到经济的兴衰。在作为奥巴马变革一年“小考”的2010年国情咨文演说中，他也指出，“我们必须投资于能源、医疗和教育这些能让经济实现增长的领域”，“美国增长最迅速的领域，四分之三的工作岗位需要超过高中文凭以上的教育”。之所以这个问题比较迫切，是因为“工业国家中”，美国的“高中辍学率最高”。他说接受良好教

育，不仅是个人的事，也是个人给国家帮忙。“今天在教育上战胜我们的国家，明天就能在经济上战胜我们。”

美国经济这几年在走下坡路，很多人从教育上找原因。美国一个投资人鲍勃·康普顿，专门拍摄了一部电影，叫“两百万分钟”，比较中国、印度、美国三国高中教育（各国高中学时都是两百万分钟左右），片中对美国教育一片悲观。姑不论康普顿的比较有无道理，但将经济成败和教育联系在一起，已经成了一种共识。出于这种跨党派的共识，奥巴马不顾过去一年来的“大政府、滥开支”指责，在美国面临严重赤字的情况下，反倒提出追加30亿美元教育经费拨款。

奥巴马的教改思路

但是投资只是一个方面，思路上的改革影响更为长远。此书主要是介绍奥巴马和拜登政府的教改计划，其余部分则是教育者和评论人士提供的介绍、说明和评论。

奥巴马的教育改革，强调的是从摇篮到坟墓的教育，而不是一锤子买卖的敲门砖式教育。他强调基础教育，认为人生最关键的教育在童年。所以他有一个“0—5岁计划”，意在振兴学前教育。在目前的美国，0—5岁的孩子入托，费用非常昂贵（笔者所在城市大约每周150美元），而且效果不明显。根据《教育周刊》记者琳达·雅克布森的分析，芝加哥儿童教育中心的孩子在童年阶段每花的一块钱，在25岁之前的收益为十块钱，投入产出比很高。

奥巴马也非常强调终身教育，多次表示要重视“社区教育”。美国的“社区大学”是一些费用低廉，可以让老百姓接受技能更新的地方。当然也有一些学生为了费用的缘故，大学阶段先去社区大

学，然后转学到更好的学校。奥巴马呼吁美国人至少花一年时间进行高等教育或者职业培训学习。“这可以是社区大学、四年制大学，职业培训或是学徒培训。”这位常青藤出身的精英总统在论述教育改革的时候，优先考虑的是这些社区大学，可见他的战略重点是有助于提高整体水平的全民教育，而不是只惠及一部分人的精英教育。这是一种脚踏实地的“教育均衡”。

奥巴马教改的第二大特点是注重教师的招聘、培训、挽留和奖励。在美国教育部的网站上放有教育部部长邓肯的一段简短视频，大意是经过努力，去年美国保住了30万教师的职位。在美国，招聘到合适的教师，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奥巴马教改计划中包括一个“奖教金”项目，为进入教师职位的学生减免四年本科或两年研究生的学费。另外，他还推出多项措施，让在岗教师得到合适的培训，这包括在职进修，新老教师之间的传、帮、带等。另外，教师工作出色，可得到奖励，这是力图尽量改变过去公立学校的大锅饭局面。

对布什政府“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政策遗产的修正在于，奥巴马政府对那些业绩不佳的老师，希望多提供一些别的机会和支持，而不单纯是砍掉项目、裁掉老师。这一点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奥巴马尤其强调，改革项目应该综合老师的意见，而不是制定好政策之后，强加给老师，继而导致反弹、反抗，最终不了了之。另外，他反对以标准化测试的成败来给学校或老师论功行赏或决定去留。

奥巴马教改的第三大特点是关注弱势群体。比如，给贫困家庭提供上大学的新渠道。目前，一些美国大学，开设一些可让高中学生选修的课程。有些学生在高中后期，可免费选修这些大学课程。入大学后，就可以将学分转入大学，从而大大减少上大学的学费负

担。奥巴马政府希望大力推动这一项目，可惜的是目前这些课程还不是很多。另外一个帮困的办法是提供4000美元的学费减免，但是学生必须用100小时的社区服务来换取。这个“以服务换学费”的做法，在各地施行当中出现了很多有趣的变种。上周末，有一个高中生上门来推销本地报纸。我发现一旦我订阅成功，学生就会获得一些点数，积累到一定数值，报社就会给学生学费补贴。这是商家、用户和学生三方共赢的一种项目。

除了帮贫困家庭想方设法缓解学费负担之外，奥巴马教育计划还突出了其他几个弱势群体，如，残疾学生群体。目前，美国残疾学生所得的平等机会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但奥巴马政府希望进一步拓展对残疾学生的扶助，包括“早期干预计划”，将目前尚处盲点的学前儿童，纳入《残疾教育保障法》的范畴之内。奥巴马政府还希望特别支持不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群，希望提高对这些学生的支持。

一年已过，教改蓝图画得不错，不过“上帝在细节中”，实施如何呢？有数据显示，在经济和战争问题上，奥巴马民意支持下降得很快，但是教育上丢分不多。国情咨文演说中，“经济”一词，奥巴马提到了37次，但是“教育”（包括教育者），也先后提到了18次，不可谓不重视。当然，教育问题也不光是一个总统的事，应该是全社会的事情。例如，奥巴马也同样向家长喊话，希望大家配合起来，把电视关掉，把游戏机关掉，晚饭后和孩子一起读书。“我不是一个总统，而是作为一个父亲，跟你们这么呼吁的。孩子的教育责任，起点是他的家庭。”教育改革如果不能调动全社会的积极参与，纵有过人策略，又有何用？

下 篇

把学习放入学生的口袋

新一代学生向我们走过来了。我称他们为“ME”一代，这不是说他们自私，而是说他们熟悉移动的工具“M”（mobile），也熟悉各种各样电子交流的手段“E”（electronic）。

| 教育脱困是个技术活 |

在经济学家讨论美国经济是否已“见底”的同时，很多高等教育机构正在水深火热危机的当中。我每年参加 Blackboard 公司的年会，去年参加者差不多有四千人，今年几乎减少了一半，只有两千人参加。问到好多常来参会的朋友，他们都在抱怨学校里预算被砍，以至于不能像往常一样负担几个会议名额了。

经济危机影响高校到了什么程度？可以说是哀鸿遍野。今年六月，《名利场》杂志发了一篇《富哈佛　穷哈佛》的文章，说过去的哈佛，花起钱来就怕想象力不够：要建一幢 2.6 亿的医学院大楼？可以，建吧。要扩建法学院大楼？行啊，扩吧。而去年一年，哈佛的捐赠大跳水（2008 年 7 月到 10 月间下滑了 80 亿美元）。筹款下降，一些建筑项目也停了。如果说连哈佛都遇到了这个问题的话，别的学校就更不必说了。《名利场》惊呼：从耶鲁到普林斯顿，从哥伦比亚到康奈尔，预算在削减，课程在调整，在建项目在搁置。耶鲁今年的捐赠款预计下滑 25%，普林斯顿预计下滑 30%，哥伦比亚预计下滑 22%，康奈尔、布朗、达特茅斯大学预计也都会出现 20% 以上捐赠额的下降。“常青藤名校的镀金时代结束了。”这些常青藤高校，通过削减预算，裁减人员，冻结聘用等措施，以

应对危机。

但是危机中几家欢乐几家愁。由于学费的相对低廉，公立大学、社区大学借此吸纳了很多因高学费门槛，被私立名校排除在外的人。这使得过去那些“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私立学校，不得不屈尊和周边一些档次稍差的公立大学抢生源了。但抢生源是一个技术活，得考虑到如何细分市场、如何营销，争取到生源后如何改进自己的环境与平台，将学生留下来。

过去一些学校挺过危机的经验很值得学习。印第安纳卫斯理大学，不到20年间，从一个学生人数才2000的小学校，成长为学生总人数超过15000的学校，就是因为该学校找到了他们所需的“细分市场”。当时学校领导决定将目光盯准“未曾被服务”的群体。20年前，该学校所在地区处于经济转型期，一些大企业搬迁，留下大批等待再就业，却没有大学学历的人群。该学校通过网络教育和定制的成人教育，实现了20年的爆破式增长。在如今的美国，尚有5900万人（亦即成人人口的30%）未曾受过任何高等教育，为什么不可以出现第二个印第安纳卫斯理大学，定制出新的教育模式，创造逆向增长的神话呢？同样，中国在外向型经济收缩、产业结构的调整中，也必然有大量“未曾被服务”的人群，如果一些高校独具慧眼，催生出更多的教育模式，这样就可以给他们也是给自己提供一个机会。今年早期，奥巴马签署《美国经济复兴和再投资法案》，给“回炉再造”的教育工作者提供税务优惠，这就给大批可提供师资后续教育的学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家乔治·凯勒在《教育与新社会》一书中指出，影响高等教育的有三大重要因素：一是人口的改变，二是技术革命，三是经济形势的变迁。如果有人能把握这三者的趋向，则可在危机中挽教育狂澜于不倒。

在目前阶段，技术的变革成了推动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引擎。我遇到的一些教授感慨，过去的老师，死死守着自己的看家本领，甚至规定学生不可携带任何录音器材进教室偷录讲课内容。而现在，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这些名校的教师，都在抢着将其教学录像上传网络，供全世界去看。毕竟第一代完全在网络环境下成长的“网络原居民”长大了，进入了高等教育，这些人的生活和学习习惯，给高校运作方式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加州，继州长施瓦辛格提出中学教材电子化之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克里斯托弗·艾德利教授提出，应该在加州大学系统的10个校园之外，增添第11个校园。这似乎是有些违背常理的做法，但是他在《洛杉矶时报》上提出的这个“第11个校园”，是个“网络校园”。美国《高等教育纪实报》发了一篇关于该建议的评论。近日来，该评论一直列在最受欢迎的文章前列，可见关心这一问题的人很多。

过去，教育质量一直是网络教育里一个让人值得担忧的问题。一些网络教育学院，被人认为是卖文凭的机构、野鸡大学。但这些年来教育形势有所改变，用我妈的话来说，“下河淹死的多有识水人”。一些传统高校抱着过去的资本，不思进取，没有危机意识，如温水煮青蛙一般死掉。而网络教育领域深知外界对其质量的关注，反而在质量监控上励精图治，下足了工夫，最终一只只野鸡飞出了鸡窝，成了信息时代的金凤凰。

野鸡大学的鸡窝里飞出金凤凰

麦肯锡公司至少说对过一句话，它认为中国在信息时代的发展，并没有输在西方发达国家之后。并且，这是个难得的机遇。

由于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在有些情况下，后来者有其天生的优势。比如，西方人花了好长时间进行升级换代，而中国却能一步到位。一个西方人可能一辈子用录像机看录像，出现了 VCD、DVD 之后，很多人并不能转换过来，即便后者在技术上更为先进。原因很简单，我在很多人家里看到，他们一辈子积累了大量录像带，换成 DVD 以后这些录像带怎么办？先生老不死，后生跟不上。而中国很多人家，一步到位地用上了 DVD。

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电子商务。由于信用体系的健全，美国的电子商务非常发达。比如，如今的学生买教科书，大部分都在网上购买。这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有信用卡，或借记卡，再不济还有支票号码，支付手段多种多样，配送渠道也非常顺畅。而中国的征信体系还在建设中，虽然银行和商家望穿秋水，上海甚至建立了个人信用资料库，可是最近好像没有听到什么声响了。虽然国内使用信用卡的人群数量可以陡增，但是形成信用消费文化，形成成熟的征信体系，无法一蹴而就。

可是即便电子商务还和西方有差异，中国的手机商务却异常发达。手机非常普及，而且支付方便，也不存在信用的瓶颈限制。这方面大有潜力可挖。比如用手机收发短信，西方不亮东方亮。我相信没有哪个国家的手机能比中国的使用频率更高了。一些电子商务网站，用手机付费取代了西方常见的信用卡收费。而人工的低成本，使得快递公司大为兴盛，也弥补了配送渠道方面的先天不足。

国情的不同，风俗习惯的不同，使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在不同的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果。我有一次和常庆老师在网上聊天，发现双方都在做远程教育。他说，他所在的课题组给阿富汗做了个远程教育项目，“东西做好了，发现我们的猜测都错了，那里大多数地方根本就没有电”。他跟我说，他们在阿富汗的邮件都是毛驴送的，我说你们干脆给沙特送个蜘蛛去上网。玩笑归玩笑，虽然我没有给沙特做过什么远程项目，但知道沙特自己有个“CCTV”，Closed-Circuit Television，闭路电视是也。沙特费萨尔国王大学外语系运用闭路电视进行外语教育。沙特的女子教育始于20世纪60年代，但真正的蓬勃兴起却是在80年代经济繁荣中实现的。受宗教风俗影响，男女同校不同班。男子班级男老师教，女子班级女老师教。这样本可相安无事，问题是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的教育生产力有需要，男女有别的生产关系就满足不了。怎么办？闭路电视就作为教学手段粉墨登场了。闭路电视将男老师的课，同步传给女子班的学生，女子班同时还有一个女助教帮忙。男学生和女学生、女学生和男老师虽有空间阻隔，却通过闭路电视实现双向交流，正如御医牵个红绳给皇后娘娘把脉一样。

我的结论是，远程教育如果不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种下的种子，也一定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种下的，却被发达国家摘了果实，现在又拿到发展中国家去卖。远程教育其实并不是微软这些发

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推动的，却更多的是在现实需要下成长起来的。比如，资源的短缺（比如女教师），或者学生的居住地太分散，都有可能让人去打远程教育的主意。《远程教学》（*Teaching and Learning at a Distance*）一书举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远程教育的例子：根据世界银行2000年的统计，世界上最大的大学是远程大学，即土耳其的Anadola大学。此外，还有中国一度庞大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坦桑尼亚颇为有效的函授教育。但是到了网络时代，一切都被冠上“E”的名字，于是就有了“E-learning”，一下子重新划分了远程教育的疆界。

中国的远程教育，在“非典”时期还火暴过一阵。但根据《中国远程教育杂志》2005年的总结，目前远程教育没有发展，反而萎缩了。我觉得我们错过了一些关键机遇。

比如人才机遇。以前，我写过一篇《远程教育在农村有点“水土不服”》。为什么水土不服？关键在于缺少懂得远程教育原理的人才。即便使用了技术手段，使用方法也非常机械，没有实现“技术的整合”。好的技术应用，应该是教师和技术的水乳交融，需要在教学活动当中促成教师、学生、技术三者的有效互动，而不是像很多地方现在所做的那样，水是水，油是油。这需要教育技术从业人员起到更大的教育和支持作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边缘化”。西部一所中心小学曾经尝试完全按照光盘的模式来授课。上课时，老师播放一张光盘，让学生跟着光盘中的老师学习。但学生反映“进度太快跟不上”。没多久，一种新的方式又出现了：课堂上先播放光盘，到一定的时间，老师会停止播放，模仿光盘中的游戏与学生进行互动。这种简单的老师、技术叠加或者重复，显然无法有效地将技术集成到教学活动当中。更为可怕的，可能是地方教育部门领导，没有心思下这些不大容易看见的软工夫，而只是添置一些更

能装点门面的硬件设备，因为这可能更容易看出“政绩”。可是不下软工夫，硬件设备搞不好就成了一堆废铁，甚至起反作用。或者是有关部门没有给教师应得的待遇，只在设备上做表面文章，导致他们的反感，影响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不愿意花心思将技术手段整合入教学当中。

再比如扩招的机遇。扩招中造成的资源压力（比如校舍），其实一部分可以通过远程教育手段来消化。美国很多学校设置网络课程，就是出于这一目的。由于主校区校舍有限，或者是停车场不够大，很多课程被挪到了校外租借的中学，或者是网上。我们现在所在的学校，有些课程完全是在网上，有的是把网络手段作为课程的一部分，比如考试全部在网上考，这就解决了考试高峰期间教室安排不过来的矛盾。另外，很多网上的考试，如果是标准化测试，还可以自动评分，这样效率也更高。

还有合作的机遇。其实，国外很多人手里攒着钱在觊觎中国的远程教育。我以前在雪城的时候还帮一家研究机构做过一些调查。很多人希望和中国的教育机构合作，但是我们在政策上有诸多限制，而且学校的网站制作得很差，看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或者是没有英文版，所以海外投资人两眼一抹黑，有钱也投不进来，狗咬刺猬，无处下口。

错过的第四个机遇是观念的机遇。到目前为止，网校还被看成是拾遗补缺的产品，甚至有时还属于“野鸡学校”的范畴，媒体、公众、专家都对其挑剔有加，而对其内在优势缺乏审慎思考。美国的网校也曾有过这个阶段，被人认为是文凭工厂。可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一些文凭工厂遭到淘汰，另外一些学校却成长起来，有了自己独特而稳固的地位。比如 University of Phoenix（凤凰大学，或译菲尼克斯大学），学员人数超过了两万五，比很多公立、私立

大学还要大。University of Phoenix 主要针对的是在职人员，它让无法接受常规校园教育（受时间、地理等方面限制）的人，多了一个选择，所以才会有如今这样的发展。有趣的是，这种网校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开始“空降”，在很多个州（以及加拿大）都开设了砖和水泥的分校。这种网上网下的两栖，拓宽了这类学校的发展路径。目前，一些平素不大正眼看这些学校的美国高校，也开始向这类学校取经了。比如 University of Phoenix 的母公司开发的一些网络教学工具，现在也销售到了传统的大学。

但愿有一日，我们的野鸡大学，也能飞出一只这样的金凤凰。

| 不是软件的问题，而是做家长的问题 |

2000 年，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提出《儿童网络使用保护法案》，同年 12 月，法案被克林顿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要求大部分公立学校和公共图书馆采取措施，强化其公用电脑的“可接受的使用”，包括对色情类网站的过滤。此法案引发多方争议。2001 年，美国《电子教育报告》刊发《过滤软件面临消费者和隐私权益保护团体挑战》一文，谈及学校过滤软件的社会问题。该文指出，一些民权团体抗议这种过滤软件的使用。除隐私外，人们也担心学生个人资料和使用习惯被卖给第三方做营销用途。因此，一些学校拒绝安装，或是在安装前征得家长同意。由于争议的存在，这些软件生产商难有长足发展。

美国的相关法案仅针对中小学和公共图书馆，面向少年儿童，尚争论不息，甚至引发过官司。可以想象，如果倡议将这类软件推广到学校和图书馆之外，影响到更多的电脑用户，把一些不必要过滤的成人用户，和非公共场所的私人使用行为一并作为过滤对象，让全民低龄化，再加之也没有走公开、透明的法律渠道，或公开听证，必然会引起公众舆论的反弹。

抛开用户隐私、安全和涉嫌抄袭等争议话题不论，从保护青少

年的角度来看，安装该软件过滤的做法也值得争议。美国的做法是疏导和过滤结合，将儿童引向“可接受的使用”。儿童教育里最忌只控制不引导的集权式作风。政府、学校做法也一样，不能只控制不引导。否则，就等于将孩子装在笼子里关起来，好让他不去下水游泳淹死。

在技术部门工作几年来，我的一大感触是你不能指望纯粹用技术手段去解决社会问题。作为家长，我当然不希望孩子接触“不良信息”，可是成天说这个不可以看，那个不可以看，不如告诉孩子该去看什么，可以去看什么。在为低龄用户过滤之外，美国有大量为儿童制作的优秀网站可供使用，如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 PBSkids. org，还有帮助儿童阅读的网站 seussville. com，以及帮助儿童学数学的 mathisfun. com。老师和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去这些比较绿色无污染的网站，孩子们或许会沉迷其中却少有伤害。有时候孩子放学回来，还会带着老师留的条子，上面写着建议孩子浏览的网址。在公共图书馆，所有电脑上都收藏了家长可以放心让孩子去浏览的网址。现在中国一些门户网站，虽经“反低俗化”的整顿，仍有或明或暗不适合儿童的内容，无法被过滤掉。专门去找没有广告、没有与只适合大人的网站挂靠的纯儿童网站，还很难找到。仅有“绿坝”式的过滤软件是不够的，让孩子自由活动的“绿地”在哪里呢？

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的“活动理论”指出，使用技术工具时，社会活动是主体、客体、工具交互作用的一个复杂过程。良好的教育环境，应该是内容（比如让孩子看到什么样的健康网站）、媒介（通过什么渠道去看，网吧、个人电脑还是学校的电脑）、方法（学校教育方法，家长的管教方法）三方的优化结合，是学校、家长、商家、政府部门和立法机构的协作成果。政府不能通过技术手

段，去代行父母的职责。有次，我和一位同行讨论到网络不良信息的屏蔽问题时，感慨再怎么屏蔽，软件都不可能挡住“漏网之鱼”。这位同行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不是软件好不好的问题，是做家长的好坏问题。”

把学习放入学生的口袋

按：最近在我们学校组织的“基督教大学技术部门联会”，我们这个州的 Heartland 网络学习会议，还有美国教育信息化会议（Educause）ELI 上作了一些关于移动学习的讲座。由于没法回国和同行交流，现将同样的报告翻译出来。

我来自俄克拉荷马基督教大学，我们学校的学生每人一台 Mac Book，每人一个 iPhone 或者 iPod Touch。这便是我们的移动学习项目。通常人们想到“移动学习”，会联想到手机，而在实际工作和学习当中，大部分人是手机和电脑并用的。就我所知，像我们这样笔记本和手机一加一的情形，在美国还是第一家。所以我想跟大家讲讲我们开展移动学习的得失。

我的题目是“将学习放入学生的口袋”。我是去年提交材料的，那时候苹果公司还没有推出 iPad。所以现在我想，乔布斯不曾想到他也会造成服装流行的改变，那就是大家要穿这种 JNCO 大口袋裤衩了，否则我们没法将学习放入他们的口袋。

言归正传，这两天来，大家听到《世界是开放的：网络技术在如何变革教育》（注：本书中文版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作者柯蒂斯·J·邦克博士和诸多演讲者提到了各种各样有趣的网站，和关于移动学习的丰富资源。我不想再多罗列一些网站，相反，想让大家回到最原始的话题上来：移动学习到底有没有必要？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原因之一是，新一代学生向我们走过来了。我称他们为“ME”一代，这不是说他们自私，而是说他们熟悉移动的工具“M”（mobile），也熟悉各种各样电子交流的手段“E”（electronic）。他们带着新的期待进入高等教育。

最近，意大利文化部门将和谷歌合作，将意大利过去的文献统统扫描上网。这样，有了内容，有了工具，移动学习其实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事实上，现在开始移动学习的人群越来越年轻。现在亚马逊公司有专门的 Kindle 阅读器，iPhone 和 PC 机提供了 Kindle 客户端下载，巴诺书店有 Nook 阅读器。仿佛这还不够多似的，Vetch 公司又开发了一种针对学步儿童的阅读器，卖 60 美元。你会发现，而今的孩子们大多在接触这样或者那样的移动学习设备。我儿子就是个例子，他最喜欢的玩具是我的 iPod。他才一个五岁半小屁孩，可是我发现他居然能用我的 iPod，去 iTunes 商店购买游戏。是怎么回事呢？有一天，我在工作，他来问我 iTunes Store 的密码。由于我很忙，就给他密码了。从此之后，他隔三差五地就跟他姐姐给我下载一个游戏。当然，虽然他现在才上幼儿园并不会阅读，但是我确保他认识“免费”（free）这个字。

我们这里说的是未来的学生，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头，就是学生毕业之后。我在《培训与开发》上看到一张照片，一个经理人在利用自己的手机调阅公司的材料。这本杂志介绍了美林银行如何利用智能手机向员工提供后续学习。如今的产品系列越来越复杂，人脑不是电脑，谁能记得住那么多？所以越来越多的公司——从家得

宝到美林，大家纷纷在用智能手机，帮助员工学习，及时得到公司信息。教育界好像总慢一拍，移动学习喊得震天响，但是不及业界真刀真枪在实践。

当我们教育界说到任何技术革新的时候，思维常常会陷在一个定势里面出不来。那就是，我用这个设备，学生学习成绩能提高多少。这方面我们也得跟业界学一学。他们的移动学习或曰移动应用范围十分广泛。比如，利用移动设备开展绩效支持，在岗训练，产品说明，公司信息推送，调阅数据，甚至可以用移动设备扫描出差收据等。现在苹果公司也在研发一些 iPhone 外接设备，未来可以利用手机，直接量血压，然后发送给医生。

也就是说，我们对移动学习的思路应该拓展开来。多年前，彼得·德鲁克就曾指出，美国在经济转型中，越来越多的人将成为知识工人，能够熟练使用这些移动设备，也是工作所需的技能之一。我们如今一提到“Y 代人”、“数字原居民”，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技术高手。其实他们更精通的，是更新 Facebook、Twitter 这些生活化的新媒体工具，在一些可以提高个人工作效率的技术应用上，他们未必熟悉。比如学术论文的引用软件 Endnote，你不去引导，他们是不会去用的。所以教育者其实是有责任在学生学习期间，教会他们使用这些效率工具的。

移动学习的另外一个必要性，是《地平线报告》（注：这份报告每年发布一次，总结高等教育领域技术应用的走向）2010 年度报告中指出的，目前教育技术的一大走向是人们希望能够实现“随时随地”地学习。顺便说一句，由于我们是一所基督教大学，我们在思考移动学习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问：“遇到这种情况，耶稣会怎么做?”其实大家知道，耶稣就是这种倡导“随时随地”学习的一个典范。他的教学场所在山上，在湖边，在海上，在井水边。

他随时随地开展他的教学活动。所以，大家现在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们几所基督教大学（包括 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会成为移动学习的先驱了吧？

事实上，移动学习在其他文化里也是这么一回事。在中国，孔夫子是一个周游列国的教育者，带着门徒到各个诸侯国讲学，沿途收学生。在古希腊，柏拉图也是一个“远程教育者”。昨日伯克博士还跟我们说，柏拉图是最早开展“远程教育”的人之一。他希望利用书本，不再把学生限制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来学习。

而今“砖与水泥”的这种教室，将学生粘在座位上，其实只是一个阶段的学习和教育模式，它是历史的产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模式也可能有消亡的一天，或者说会与其他模式共分天下。事实上，我们正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在眼前发生。

对学生而言，这个道理并不难讲。在我们持续两年的移动学习问卷调查中，91% 的学生认为学校配发笔记本有助于他们的学习，iPhone/iPod 的比例低一些，但是总的来说，81% 的学生认为这些移动学习的基础设施，对他们的学习有正面作用。

可是变化对于其他人来说是艰难的。我自己本来是个用 PC 机（注：安装 Windows 或 Linux 系统的电脑，区别于安装 Mac OS X 系统的苹果电脑）用习惯的人，我来上班的第一天，学校正在大规模地发放 MacBook。之前我碰都没有碰过 MacBook，所以这时候就开始怀疑人生：我是不是跑错地方了？但我庆幸当时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顺应变化。我在自己的戴尔电脑徽标上，贴了个苹果的标记，以示革命。现在我是 PC 和 Mac 都用得比较熟练了。道理就一条：技术是工具，不是做人原则，我没有什么改不了的，哪个好用我用哪个。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变化。我工作的服务对象是教授

们，这几乎是最难顺应变化的一个人群。我专门在 Youtube 上找了很多视频，搜索的关键词是“professor destroys”（教授破坏），结果是五花八门。我看到俄克拉荷马大学一个物理学教授，为了警告学生不要带电脑进课堂，将一台电脑放进液氮里，看着电脑冒烟，然后拿出来，狠狠扔在地上，跟全班同学说：“不许带任何电子工具进我的课堂。”但有意思的是，他自己腰上别着手机，墙上打着 PowerPoint。他为什么不以身作则，将自己的手机，用某种物理或者化学方法给销毁呢？

此外还有一些教授砸学生电脑或手机的视频，可惜都是用其他语言说的，我也听不懂。这在美国大概不大可能发生，因为这些是私人财产。刚才“液氮销毁”的教授，估计销毁的是他自己的电脑。顺便做个植入式广告，我家抽屉里还有一台电脑，已经坏掉。此电脑很重，同事史蒂文建议我捐给海军，当锚使。而我想卖掉，卖给某个希望靠砸电脑来说明问题的教授。

靠这种禁止的方法阻碍技术革新的人很多。我发觉高校里头，有个 big ban theory，就是希望靠“禁止”的手段，维持现状。有的学校禁止学生带电脑进课堂，有的学校禁止手机，有的学校掐断课堂上的无线接入。禁止是一个策略，可是策略有上中下之分，我认为禁止是下策，也是懒人策略。况且现实往往证明，禁止归禁止，人们总有办法突破。

在课堂上，当你决定禁止的时候，你是在向学生发出非常负面的信息。首先，你是在告诉学生，你拼不过电脑，你在电脑面前败下阵来。“一天一苹果（苹果机），教授靠边站”是不是？为什么这么没有自信呢？

再者，你是在告诉学生，你是一个抵御进步的人。我们在创新扩散理论里，常说革新者、早期应用者、早期大多数、后期大多

数、落伍者，你要不要把“落伍者”，换成“我们教授”呢?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在告诉学生：我不相信你能对自己的学习负责。这是个很不好的信息。在我们的调研中，很多学生这么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成人，大家花钱来上学，如果有人上课用电脑瞎玩，不去学习，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自己要承担后果，可是不能因此惩戒我们其他希望用电脑记笔记的人。我刚才说过，教育者担负的一个重要职责，是教学生如何合理高效地使用电脑，造福自己的职业和人生。你不能一禁了事，逃避这样的责任。

既然我不赞同禁止，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这里说点题外话。古代中国，有两个首领，同样面临洪水问题。老首领用一种叫做“息壤”的土，堵塞洪水，但是洪水总是破堤而出，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他的继任者大禹，采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法：修建水渠，将水引到需要水的地方，将水引到大海，于是成功地解决了问题。我觉得教育者也应该这样，不要老在自己的课程说明里，说不许带这个不许用那个，你应该去想，怎样将学生的精力和时间，引到你所希望的地方，就如同第二个首领所做的那样。

禁止与堵塞，给人类文明所留下的，是传说和景点。不知在场的有哪位好汉去过长城？当年长城不是当成景点来修建的，而是一个将外敌“堵”在外面的防御工事。就是因为当时的皇帝只想着怎么去堵，而不顾老百姓生计，结果民不聊生，起来造反，使得这个王朝成了中国最短命的王朝之一。我再次强调一句，以堵为重点，是起反作用的。教室里的情形也一样。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将电脑、智能手机诸般“奇技淫巧”变成学习的工具呢？面对技术进课堂这件事，很多老师都是满腹牢骚，动

辄责怪技术给课堂带来负面影响。可是赫尔辛基大学教授 Jyri Engestrom 说过：各活动系统之间，由于历史上逐步累积的结构性紧张，会产生干扰和冲突，可是也会造就改变这些活动的创新机遇。换言之，当技术带来课堂管理的困难时，教育者应该反思自己的教学活动，寻找革新的机会。

我发觉，教师抵触技术应用，说到底，是他们习惯了三尺讲台一张黑板这样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之下，他们一切尽在掌握——教学活动从头到尾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为什么技术进来之后，他们会反抗呢？因为他们的部分独立（autonomy）没有了。他们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分工，一部分被外派给技术部门了，比如网络课程的设计和制作，他们需要找别人帮忙。很多老师是不习惯这种改变的。事实上，技术部门可能纯粹出于好心，并没有抢夺他们力量的野心，不过是帮他们实现他们要做的事情。或许有人会问，那么不如退回到以前的状态，退回到没有技术应用的状态？很抱歉，我们都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学生对于技术的期待和应用已经成了现实。教室里的矛盾，变成了学生不断提高的期待和老师的教学方法原地踏步的矛盾。

很多时候，教授们怪罪的是技术工具。但是事实上现在的教育变革，涉及的是三重变革。我这里用三个“M”来表示。Medium（媒介），媒介变了，学生开始购买电子课本了，学生开始收听教学播客了；Method（方法），方法变了，学生开始互相教学，开始更多建构式学习，开始更多基于现实、基于问题、基于项目的学习，不再是中世纪那种师传生受的单一模式了；Message（信息）也变了，过去老师讲，学生在教室里听，这就是学习信息的传播。那时候教授们为了防止他人偷师，甚至禁止学生带录音机进教室。如今大家看，世界各地的名校教授，慌不迭地将自己的讲座传到网络上

让所有人去看，去听。你可以去耶鲁的网站，收看一流教授关于《美国当代文学》的全部精彩讲座；你可以去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大量精彩的计算机课程。过去这叫盗版，而今这叫“分享”。所以教师得面临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过去的教学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手机可以被禁止吗

据美联社报道，阿富汗前塔利班政权驻巴基斯坦大使 Abdul Salaam Zaeef 开始用 iPhone 了。与此同时，比尔·盖茨禁止家人使用 iPhone。连塔利班都开始使用，而微软却死命反对的东西，最好盯着点，因为它的普及挡都挡不住。

按照克莱顿·克里斯汀生的说法，这样的创新产品属“洗牌式创新”。当这样的创新项目或者产品来临的时候，它改变的并非原来市场的规模，而是整个市场的运作方式。

在学校，教育技术的运用，并不取决于一个产品是否适合教学，而是取决于一个产品的普及程度。比如，专门为教育设计的 SmartBoard，就没有成大气候，而博客、维基这些工具，却大为普及，因为这些创新在潜在用户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转入教育用途则水到渠成。

比尔·盖茨“人手一台电脑”的理想尚未实现，人手一部手机的幻想却成了现实。美国一些无线网络供应商推出了手机版的 SAT 考试练习题，供学生在课外使用。

学校到底该不该禁止这些设备的使用？去年在我们学校的年终教师培训会上，我们部门给两位老师发放了技术创新奖。这两位老

师不是成天在玩技术，为技术而技术，而是在教学中看到了一些人力不便实现的需求，通过创新式技术应用，解决了某个学习的问题。比如，获奖者之一是一位音乐老师。他要组织一个清唱剧演出，但是由于时间冲突，无法在规定时间里将学生全部集中过来练习。这位老师想了个办法，将不同声部的音乐分离出来，传到 iTunes 上，让学生分别下载到各自 iPod 或者 iPhone 上，不断练习，练习好之后再录像或录音传给他。由于学生学习进度不同，掌握乐曲的时间也千差万别，技术则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有效地实现了一种因材施教式的教学。

苹果公司的 iTunes U 业务主管杰森打过一个比方，说上学好比上飞机，平时大家都用手机、电脑，进了教室，老师让你将这些电子设备关闭，坐好，听课，让人想到拿起氧气面罩来教育你安全须知的空姐来。手机和电脑进课堂，有很多老师是反对的。但是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埃里克·马祖尔举了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如果说这些东西干扰教学的话，教室的窗户也一样干扰，因为学生会看着外面的花啊鸟啊，你总不能将窗户也糊起来。“关键是你得使用更为合理、更有吸引力的教学法来吸引住学生。”换言之，排除干扰的最好方法不是堵，而是疏导，将学生导向更能激发他的活动上。我很怀念以前刘海平老师给我们上的论文写作课，课上大家围成一圈，学生、老师有问有答，纯粹是启发式教学，学生想发言都怕来不及，老师哪里会害怕干扰？

万变不离其宗：反思教育技术学科

——亚历山大·罗米斯佐夫斯基博士访谈

亚历山大·罗米斯佐夫斯基博士（Dr. Alexander Romiszowski），纽约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教育设计、开发和评估系教授，国际知名的教育技术、远程教育理论家、思想家。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育技术和教育设计领域的界定。在本访谈当中，罗米斯佐夫斯基深入阐述了教育技术领域的一些重要观念，谈到了这一专业的外延与内涵、探究方法、新兴技术和历史渊源。罗米斯佐夫斯基博士对教育者和教育技术、远程教育从业者的诸多问题作出了解答，也对教育设计领域一些常见争议话题提出了他的见解。

罗米斯佐夫斯基博士还在近三十个国家和不少国际组织中担任教育顾问或项目负责人，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也为中国的教育技术领域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参考，希望能帮助中国教育者和教育技术、远程教育从业者反思这个领域的现状和走向。

南桥： 罗米斯佐夫斯基博士，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知道您在教育技术、远程教育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可否先给中国读者介绍一下您的个人背景？

罗米斯佐夫斯基： 我在波兰出生，但是早年在英国长大，在英国接受教育。我在牛津读书时学的是数学、物理和教育。毕业后，我先是在汽车工业做技术管理，后来转入人力资源开发，从事咨询和项目实施。服务对象包括各种大大小小的组织和一些国家机构。那时，我开始比较深入地研究教育、培训、绩效和产能改进的理论和典范做法，包括在这些领域如何利用新兴技术解决问题。后来，我在工程硕士、研究生教师资格之外，拿到了教育技术方向的博士学位。此外，我还学习了工商管理硕士的相关课程，以及计算机、软件工程类的很多课程。不过学这些不是为了拿学位，主要是想把自己所学的应用到我的工作当中。

我后来回到校园，在雪城大学的课程设计、开发与评估系（Instructional Design，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执教二十多年，教过不少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包括课程设计、媒体选择、远程教育、多媒体、人类绩效改进，等等。与此同时，我也在生产力改进、绩效技术、信息沟通技术、组织开发、经营管理、岗位再设计、督导和管理等领域提供咨询服务。最近一段时间，我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做咨询。

我曾经服务的国家包括阿根廷、阿塞拜疆、巴西、智利、东帝汶、埃及、法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莫桑比克、荷兰、新西兰、波兰、罗马尼亚、新加坡、南非、西班牙、泰国、英国、美国和委内瑞拉。大部分项目的经费来自国际机构和国家机构，如英国文化委员会、英国国际发展部、欧盟、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国际开发署、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中国从事任何项目，或许将来会有机会。我离中国最近的项目可能是在韩国。在那里，我给三星公司、LG电子和起亚、现代汽车公司提供咨询和培训。在亚洲地区，我还曾给新加坡的一些大学和机构做过长达十年的咨询和培训。最近，我每年在印度尼西亚的 Universitas Terbuka（注：印度尼西亚提供远程教育的大学，相当于英国著名的"开放大学"）工作一个月，为印尼的远程学习网络和东南亚部长开放和远程学习中心工作。

南桥：您写过多部关于教育系统设计的著作，如《教育系统的设计》（Romiszowski，1981）、《教育开发思想》（Dills & Romiszowski，1997）等。您曾经在作品中表示，教育系统的一些热门话题其实都是重复出现的老问题，不断被教育技术领域的学者和研究者翻来覆去地讨论。根据您的观察，这么多年来，这些问题是否发生了变化？有没有找到答案？

罗米斯佐夫斯基：我想你可能是在说我曾经提过的一个说法。我确实讲过，一些研究问题受到经年累月的讨论，冗长繁复得让我个人都觉得这些讨论很多余。一个比较"流行"的话题是如何选择最适当的媒体或技术，为特定类型、特定内容的教学服务。这方面我有自己的研究。你刚才提到的书里也谈论了这些问题。在我最早写的一本《如何选择和使用教具》（Romiszowski，1968）一书中，我就对此做了综述，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选择模型。后来我不断完善这个模型，在《选择和使用教学媒体》（Romiszowski，1974）一书

中给出了一个更完整、更系统的版本。

当然，这个话题的研究者很多。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大概有超过20种不同的模式来帮助人们选择合适的教学媒体。1983年罗伯特·莱斯纳（Robert Reiser）和罗伯特·加涅（Robert Gagné）还用了整整一本书来比较这些模式。我的模式和大部分模式不同：大部分模式是将具体的媒体分类，试图说明针对一些特殊教学任务而言，某些媒体才是"理想选择"。我的模式强调教学任务的演示和练习要求才是决定因素，满足这些要求的媒体都是合适的媒体。反之，不能满足的就应该尽量避免。你可以说我的模式是"淘汰式选择法"。这个方法的依据不是具体媒体的性能特征，而是教育设计的原则。从理论上说，我是轻应用符号学，重应用教学法。

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大家的答案不尽相同。以我一直研究的教导学生的教育设计为例，这个学科在美国称为"教学设计"（Instructional Design），在英国则是"学习设计"（Learning Design）。这说明两个英语国家之间尚且有一些概念及文化上的差异，放到不同的语言中看，比如英语和法语、中文和英文，差异必然更大。不过，我近来也发现，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之外，教育设计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原则、程序还是普遍适用的。

南桥：那么总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在教学中的角色发生了哪些变化？

罗米斯佐夫斯基：这要看你怎么理解"技术"了。如果你和其他大部分人一样，把技术理解为信息沟通的技术产品，那么当然，我们所处时代的变化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不过才十多年时间，互联

网就掀起了一场革命，改变了人们搜索信息、相互沟通和完成大部分任务的方式。我们刚刚学会第一代网络（强调信息和知识的组织、传播、分类），又要忙不迭去了解 Web 2.0 的新技术。这些新技术强调协作和产销（prosumption），亦即信息的生产和消费同步进行，其表现形式为维基、博客、第二人生和大部分社交网络环境。据说 Web 3.0 也近在眼前了。

唯一不变的是持续的改变。但是变化却并非恒定的，而是在加速。这对教育的影响和对其他领域的影响一样大，或许更大一些，因为在教育中，我们更强调信息和沟通。另外，我们这个社会最精通技术的阶层是学龄期的年轻人，他们长在新的环境下，几乎是一出生就开始接触新型的信息沟通技术工具。

因此，教育流程当中，技术变革的压力既是自上而下，也是自下而上的。中间的教育者反而是个问题。和其他变革过程一样，这个“中间层”鲜有愿意主动尝试新想法的特别热心的“技术迷”。但是，会有一些比较开通的“早期应用者”，他们愿意尝试“学习新花样”，更多的大众是“缓慢的追随者”，你得说服、规劝、教育、培训，甚至偶尔惩罚他们，才能改变伴随了他们一生的教学习惯。还有一类干脆就是活跃的“反抗人士”，他们或许永远都不会适应新的环境。可是生活还会继续，一代又一代后浪推前浪，在这个过程当中唯一能肯定的是变化一定会发生。

我们这里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些变化是好的变化，还是越变越差，还是纯粹为了赶时髦而变化。这里我们看一下“技术”这个词，它的字面意思是“运用科学知识，达成实际目的，解决实际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是计划性变革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其结果是系统或产品的改进，使之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或满足社会某个局部的需要和愿望，这些局部包括健康传播、政府管理、教育

等，我们不妨称之为“客户”。

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原则上什么也没有改变：教育技术的角色如今仍然是运用现有最佳、最科学的知识，改进教学过程、教学工具和教学环境，继而改进教学的结果。今后也还会是这样。当然，这个意义上的教育技术也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因为现有的科学知识在变化：新的理论在诞生，新的研究成果可供使用，新的思维模式被人接受，新的风潮和观念也走向前台，影响着“客户”们的期望和愿望。

南桥：*在您的著作中，您主张运用“系统的办法”来进行教育开发。如今也有一些研究者主张用迭代（iterative）和增量（incremental）的方法进行开发。这或许是出自软件工程中的敏捷设计方法。这些方法是否合理？*

罗米斯佐夫斯基：诚然，在一般意义上说，我确实倡导系统（systematic）的方法。但更重要的是，我也主张“生态性”（systemic）的方法。systematic 和 systemic 不是同义字。系统性意味着在解决问题的时候，用系统的方法去分析、思考，要考虑影响到特定环境的所有要素。而生态性的方法，则试图考虑我们可能做出的决策，是受哪些宏观因素的影响，继而又会影响哪些宏观因素，以及在这些决策的实施当中，又会影响哪些微观因素。

在复杂问题和局势的解决当中，为了实现思维上和决策上的生态性，我们必须采用系统的方法，对不同选项进行分析、设计、开发、实施、评价。这个过程通常简称为 ADDIE。这或许是系统的方法，但是如果使用得当，它就绝不是线型的、机械的过程，绝不会缺乏产生创意和创新的机会。这个过程也一定会导致对流程的重新

思考、重新设计、重新启动，而这也正是迭代的过程。

系统的方法本身就应该是迭代的。通用系统论（或称科学论）是系统方法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告诉我们，很多人为的、有特定目的的系统都是复杂的，充满或然性，会牵涉到很多交互的因素。这些交互并不全是可以预测的。因此，第一次就能产生理想结果通常只是一种巧合，在现实当中很难发生。更常见的情形是，我们必须利用测试中的信息和反馈，对结果开展迭代、增量式的改进。

我认为教育设计、开发的原则和软件工程颇有相通之处，并非因为二者相互影响（虽然这种相互影响的情形也存在），而是因为二者都要运用理性、科学的方法，处理复杂系统中的问题。二者都是系统方法的实例，都是在用“工程”式的方法，产生理想的系统性结果。确实，二者都是实践中的“技术”。

南桥：您知道，人们对词语总是赋予不同的内涵和感情色彩。例如，“技术”、“教育技术”这些，就能让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感情体验。这不仅仅是词义上的差别。这些界定的不同可能导致整个学科的变更。在中国，教育技术似乎是理工科学习的对象。这个问题或许有些大，您对“教育技术”这个学科究竟如何界定？这个学科的参与者都是谁？在这个学科历史还不长的国家，如中国，什么样的人会受到最大的影响？

罗米斯佐夫斯基：幸亏我们刚才已经对“技术”一词的“流程”含义和“产品”含义作了区分，这样你的“大问题”可能就会好回答一些了。不过还有很多方面不能展开，此外，还要比较你提到的中国和其他国家“教育技术”内涵上的差异，因此，恐怕我的回答还是很“大”、很笼统，请谅解。如你所言，这么重要的问

题，会影响到整个学科的界定。

首先，我们来看何为科学，何为技术。首先应该区分二者的本质不同。科学研究调查现象，形成或改进我们对于这些现象的知识。技术则是运用通过科学方法形成的知识，达成期望的目标。例如，评价科学工作者（Scientists），是从学术角度，而不管他们的研究是否投入使用，是否和社会有关，能否见容于社会。而技术工作者（Technologists）水平的高下，则取决于其解决方案的效率、效果、成本，以及诸如“美感”、“能接受”、“可持续”、“符合社会正义”之类的衡量标准。

由此可见，科学工作者的工作，独立于社会价值和伦理价值。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自由地调查，形成相关现象的知识，哪怕这些知识被人视为不合伦理，不合道义。例如，研究可能作为无尽能源来使用的核聚变，研究克隆人类，研究通过药物方法改进学习、业绩、个性的做法是否可行。而技术工作者则要解决给定问题，他们总会有伦理、道德上的抉择，要选择何为可接受、何为不可接受——要不要制造原子弹？要不要克隆人类？要不要改变一个人的个性？要不要为了改进学习成绩或者运动成绩，去冒让人服药上瘾的风险？通常情况下，这些伦理道德上的立场并不是技术工作者个人的信念或者立场，而反映其“客户”的立场，比如某个具体的组织、一国政府，或是人类社会的整体。但是技术工作者仍然要面对内心的挣扎，要决定是否应该奉献自己的力量，达成客户的目标。

解释了科学和技术的区别，或许可以证明为什么我们这个学科存在这么多的误解了。很多时候，在正规教育课程里，老师将未来会从事技术工作的学生当成科学工作者来培养。学生学习如何开展研究，形成知识，而没有受到相关的解决现实问题的训练。他们甚

至没有机会去接触他们行业内固有的一些伦理和道德问题。另外，在实践当中，很多人被拉来，科学与技术一起做，可是他们根本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尚不能分清二者的角色和责任之别。因此，我觉得你说的对“技术”一词的看法和感情人各不同的情况，不限于中国，而在世界各地都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这些专业角色没有好好区分。

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的情况，在教育技术里，或许更为严重。因为很多人，包括一些教育者，在思想上、感情上认为“教育”和“技术”在一起是一种“包办婚姻”，本来就不该在一起。即便在重视教育技术，认为教育技术很有用的地方，困惑和误解也无处不在。

例如，最近，荷兰的特温特大学（University of Twente）刚刚经历一次重组。重组的目标之一是减少学院和科系数量。这所大学的教育技术系是欧洲最大、最好，也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碰巧也是我所在的雪城大学教育设计、开发和评估系的姐妹单位。可是在这次重组中，他们不知何故被划到了计算机学院下，而不是教育学院下。这个系的教师是欧洲最优秀也是最受尊敬的教育技术专家，他们强烈反对这种重组，可是结果还是没有变化。学校的领导层“根本无法理解”教育技术教授们的观点。

美国据称是“教育技术发源地”，但这里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很多学校也存在同样匪夷所思的院系重组，他们在系科角色和兴趣的阐释上，也大相径庭。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简称 AECT）发布的一篇文章很能说明问题。文中列出了美国各大学教育技术系中 100 多篇较有分量的博士论文，雪城大学的同仁们惊讶地发现自己根本不在榜单前列。另外一些知名教育技术专业所在学校，如佛罗里达州立大

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也不在排行榜前列。倒是一个波士顿的学校——我们雪城大学的老师认为他们的教育技术系连重点学科都排不上——教育技术专业博士论文入选最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那100多篇论文的标题稍作分析，我们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原来波士顿这家学校是将教育技术当成“作为产品的技术”，所有的论文研究都是关于电视工作室设备运用，或是某个具体多媒体软件的应用之类。与之相反，雪城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教育技术学科都是将技术当成“作为流程的技术”。这也体现在论文中。很多学生写的是“促进学习”的理论和实践，偶尔也会涉及具体的技术产品，但并不总是涉及技术产品。

即便在全国，也有一些概念混淆的情况发生。几十年来，美国政府发起并资助设立国家教育技术中心。中心以招标方式产生，定期更新，竞争十分激烈。但是这么多年来，中标的机构都是些研究机构，如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媒体实验室。该学院虽称“技术”（technology）学院，可是担负的却是“科学”（science）的角色，研究如何运用新的媒体，或是信息沟通技术，而不是系统地、生态地研究如何解决美国中小学和高校面临的问题。以需求为基础、着重解决问题的高校也投过标，但是从来就没有中过。美国政府总是将合约给予按照科研方法，采用“给方案找应用”（solutions-seeking-possible-applications）策略的高校，而不是按照技术方法，采用“给问题找答案”（problems-seeking-solutions）策略的机构。可是如果单单去看政府官方文件所介绍的中心设立理由，我们却会产生截然相反的期待。

在欧美，虽然教育技术这一领域的产生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但大家还在花精力对这个领域进行定义。最近有本书就是专门阐述

教育技术领域的定义。它是由 AECT 资助，由雪城大学教育设计、开发和评估系的两个毕业生编写的书名为“教育技术：定义及评注”（Januszewski &Molenda，*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2008），该书的作者和编者曾在 AECT 的定义和术语委员会任职，他们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制定这个领域的“官方”定义。这个官方定义我们逐字逐句引述如下：

> 教育技术研究如何创造、使用、管理合适的技术流程和资源，促成学习，改进业绩，并对这些研究结果以合乎道德的方式付诸实践。

这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定义，是委员会讨论了几个月的成果，中间的每个词都经过精心选择，而且内涵丰富。就像我刚刚一直试图澄清的那样，这个定义同样兼顾了科学工作者和技术工作者的双重角色，提到了常常被人忽略的伦理道德问题，以及作为产品的技术（资源）和作为流程的技术。如果我们细细去看的话，就会发现它虽然只有一句话，却包含着十个重要概念。这些概念在书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如促成学习、改进业绩、创造、使用、管理，等等。基本上是一个概念一个章节，包括具体的内涵、历史背景、进入定义的原因、理论与研究基础、另类方法、相关的哲学理论和典范做法，等等。这样下来，十个章节的概念阐释，外加介绍的第一章和最终结语的一章，全书一共十二章，360 多页。这实在是个比较“大”的定义。和它相比，我花这么多时间来回答一个问题，也不为过。

南桥：您曾经观察过教育技术领域中各种媒体的使用，也有专著介绍如何选择、使用教学媒体，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促进互动式、个人化教育。您如何看待对媒体扮演“纯粹工具”（mere vehicle）角色的争论呢？

罗米斯佐夫斯基：对，在前面也说过，我最早出版的一本书就是试图创建一个系统的模型或方法，帮助选择教育媒体。但是前面也解释过，这种选择依据的总原则是：任何媒体，只要能满足给定课程的根本教育需要，都可以使用。选择过程是先淘汰不合适的媒体，也就是不能满足教学计划需要的媒体，然后从余下的备选媒体中选择。这时候的选择应考虑一些现实的因素，如成本、可获得性、个人偏好。

20世纪80年代有很多宏观分析，就是在一定的环境控制之下的媒体比较。大量的分析都指向一个结果，不同媒体对学习结果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老实说对这个结论我不是很意外。记得有一篇颇具历史意义的论文叫做“媒体学习研究的反思”（Clark，1983），文中提出了“纯粹工具”（mere vehicle）一词，说明媒体在教育设计当中仅仅起到工具的作用。这时候我意识到，同样的话，我自己也说了将近20年。唯一不同的是，我是从理论者和实践者的角度去说，而克拉克则是从严格实证研究的角度去说。另外，我也是用了不同的话语在陈述这个结论。我这时候的感觉，有点像说过这句名言的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今天我才发现我一辈子都是在写文章，而我还浑然不知。”

南桥：在您发表在《教育技术》（*Educational Technology*）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您列出了远程学习的成败和优劣，说“人性的乖

谬”(Quirks of Human Nature)会影响到远程学习的成败，可否详述？

罗米斯佐夫斯基：这个短语最初出现在我的一篇论述教育革新成败的论文中，是在总结了一个预测、规避失败的模型之后提出来的。后来这篇论文收录为《教育系统的设计》(1981)一书的第一章。这本书严格以系统论为理论基础，以系统思维、系统方法为依据。在提到“人性的乖谬”的那一段，我写道：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是项目成功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一个原因是，对任何项目的分析，我们都带着一些假设，包括对项目目标、预期的假设。这些目标和预期往往是“高层客户”(亦即签约开展这些项目的机构)提出来的，但是它们未必就是真正的目标。另外，我们还假设这些目标能够被管理团队(客户机构中与教育技术工作者对应的部门)转化为具体指标和行动方案，而不是“无意”或者“有意”偏离“高层客户”的愿景。

拿我自己参与过的一些远程学习项目来说，第一个例子和广义上的组织、宏观经济和政治问题相关。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是通常都没有人说出来，也没有明确界定，事实上，客户或许故意瞒着，不跟设计者说。我这里想到了一个国家，其规模和人口都在世界前十名。这个国家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对远程教育视而不见。当它终于意识到远程教育的存在，并认为它的存在“对全国教育系统十分重要”的时候，他们开始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在教育部下设一个秘书处，专门负责推广、激励、促进、管理远程教育。

结果呢？很长一段时间过去后，我们发现，这个秘书处非但没有促进、实施远程教育，反而增添麻烦，设置关卡。经过十年的研究，远程学习专家指出了问题所在——这些人并非不称职，也不是水平低，对付不了创新中的教育和技术问题，而是他们有自己的

"潜在目标"，而且他们一直忙于实现这些"潜在目标"。有很多大型私立大学和中学的负责人担心远程教育的扩展会减少传统课程的学生，最终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腰包，所以他们反复游说这个秘书处。而秘书处对待远程教育的消极态度，就是在回应这种游说。

因此，这个身负重任的秘书处，表面上是要鼓励、促进远程教育的角色，私底下的角色定位却恰恰相反。热心的教育者和技术"大师"们花了好大精力"引导、教育"教育部这些官员，许久之后才发现，这一切原来都是白费时间和精力。

第二个例子来自一个比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数据，它可能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希望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上，通过网络学习实现"大跃进"。可是，当这个项目启动时，这个国家竟然只有首都可以上网，而且还是窄带。所以，这个国际资助的项目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技术基础设施，以及"砖和水泥"的教室设施。但是，考虑到这些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我们还是留了下来，在这里继续开展课程，重新规划和设计一些教育开发工作。

到了项目第二年、第三年（项目期一共五年），宽带网络进入了所有主要城镇，而且公共上网设施也比较齐备了。供应者既有私营的"网吧"，也有公有的"电化中心"（telecenter）—— 国有电信公司的每个区域分公司都设有"电化中心"。但是，教育部提出，这个全国性远程学习项目要拥有自己的一套电化教育网络，供国内的高校和部分中学使用。而这些另起炉灶的电化中心到第三年还是无法自我运营。

这时候，这个国家对教育的需求已经进入一个增长阶段，课程规划已经完毕，局部设计已经完成。项目的国际顾问建议，哪怕用租用公共上网场所的形式，也要先给学生提供需要的教育。这样，

在教育部的设施到位之前，学生已经能学到一些东西。可是无人理睬。国际顾问准备的报告（其中提出了这些建议），甚至被扣押在项目的直接管理方那里，根本没有交给“高层客户”。

对此，国际顾问深感困惑。大家在教育设计上投资巨大，却不见有人想着去做点实事，寻求一些投资回报，只见他们表现出一无进展、二无兴趣的状态。出于愤懑，这个顾问离开了项目。后来，他通过自己的同事、熟人，继续跟踪该项目的进展。最后他终于意识到，这个项目的中层管理者根本不在乎课程能否实施，根本不管能否给学习者提供急需的教育机遇。这些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们想建设一批“砖和水泥”的建筑物，好让别人来参观，来照相，作为他们职业晋升的“王牌”和政治竞选的资本。很快，到了项目的第五年即最后一年，教育部管辖下的电化中心基础设施只完成了20%，还没有一个学生学习到远程教育课程。

这些例子说明了高层的“人性的乖谬”，这是技术系统分析不出来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基层项目经理、项目协调员的“人性的乖谬”，私底下也是存在的。例如下面这些：

“本地出品综合征”（not-invented-here syndrome）：如果一项创新不是出自本地，哪怕其技术上十分可靠，也不会被使用，因为这不是当事人自己想出来的。

“人有我有综合征”（keeping-up-with-the-neighbors syndrome）：因为与之竞争的机构有某个具体的技术创新，于是跟着效仿，或者因为风潮而跟进。比如，他们会说：“大家都有自己的教育门户网，所以我们也必须有。”

“坑人添乱综合征”（the grind-the-bastards-down syndrome）：当事人的决策就是为了给组织中某个人、某个部门添乱添烦，决策的依据与项目毫无关系。

“推倒重来综合征”（baby-and-bathwater syndrome）：美国教育家杜威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描述过这种状况，他认为这个现象在教育系统中极为常见。一个新的管理者上任后，遇到一个组织中不合理的地方，便无论好坏完全推倒重来，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制造更多的问题。

这些“人性的乖谬”使得项目管理变得复杂，而且难以预测。另外，要规避项目失败的风险，光靠系统（甚至生态性）的程序还是不够的。我曾经在一个大型的绩效和生产力改进、管理咨询组织做事，记得当时那些有经验的顾问不断给新人灌输一个说法：“成功的项目是20%的技术，80%的战术。”也就是说，学生在商学院的教室（或者我们雪城大学教育设计、开发与评估系的教室）里学到的技术项目的管理程序，对项目成功的作用，反倒不如我们在工作当中，或者说在“社会大学”学到的人员管理技巧。

我在荷兰特温特大学的同事约瑟夫·卡瑟尔斯教授的博士论文，就对教育开发的这个方面进行了一套系统分析。他的论文中体现了“系统”、“生态”的双重方法，还有他所称的“关系”方法。他认为这些对任何教育、培训项目的成功都很重要。可是，从系统规划的角度去看，一个不怎么完善，甚至很平庸的项目，如果实施得好，在“关系”方面做得好，还能挽救；反之，不管规划得多么系统，多么高质量，如果在人员管理上失败，在事实上失败，那么项目也会失败。

关于人性在教育项目中的作用，可以看看约瑟夫·卡瑟尔斯和特耶特·佩洛普（卡瑟尔斯的博导）合写的有关章节，在我编写的《教育开发思想》（Dills & Romiszowski，1997）一书中收录了。

对了，顺便说一句，如果想进一步探讨“人性的乖谬”这个话题，可以去一个专题博客：http://www. psychologicalscience. org/onlyhuman/.

南桥：您提到过，过去十年间，关于网络教育，追风潮赶时髦的行为太多。现在人们似乎理性了很多。但是斯隆联盟（Sloan Consortium）又发布了一项报告，称网络教育终于进入了主流。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觉得网络教育未来走向如何？

罗米斯佐夫斯基：我想你说的是我2004年发表在《教育技术》上的那篇《电子学习长势如何？论教育技术革新成败要素》（*How's the E-learning Baby? Factors Leading to Success or Failure of a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novation*）。这是一篇针对当时文献的非正式回顾。在当时的许多论文和专著中，很多作者都提到了“风潮”，而且关注这个泡沫什么时候破。我那篇文章本意是比较、对照当时发生的状况，尤其是美国的情况，想探讨的是教育革新项目的引进和传播情况。一般来说，社会创新项目的传播有个经典的扩散模式，即遵循一个著名的S曲线，传播开始很慢，然后突然加速，直到最终实现饱和。与之不同的是，大部分教育革新的道路更崎岖。一开始人们会充满热情地接受新事物，随后是低潮和失望，有些革新项目就此消失，有的则会“起死回生”，而这个“起死回生”过程比较慢，比较谨慎，比较扎根于现实。这种奇特的传播规律有时候被人比作凤凰涅槃：一个凤凰或许会飞得太高，接近太阳，最终着火

烧死，落到地面，然后在灰烬中重生，变成更为谨慎、更为智慧的凤凰。

可以说，网络教育会持续下去。关键是看它对教育质量和教育内容会有什么影响。我感到担心的是，教育管理者常常将节约成本视为发展具有学校规模的网络教育的一大原因。这些管理者不厌其烦地引述教学效果上“没有本质差异”的研究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说，既然学生远程学习与在课堂上学习相比，学习质量并无本质差异，那么二者效果等同，而在效率上（亦即成本效率上），应该采用成本更低的网络教育。可是这些管理者忽略了两个现实。

首先，大部分学术期刊上登载的“没有本质差异”的研究，都经过良好的规划和实施，能够产生研究者所期望的结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说，这些论文中所用的网络课程个案，都是“好例子”，或许也是跟比较好的课堂教学比较。可是，一旦这些好例子在整个学校推广，成为整个学校、整个系统、所有课程都一起上、硬性推广的做法，就难以保证效果了。还有一个风险，就是质量的下降不容易察觉，也难以纠偏。因为这些教师、教育设计人员未必有办法争取远程教学质量的整体改进，因为在他们所处的学校环境下，很多传统的课堂教学质量也很差。因此，一些管理者仍然可以声称“没有本质差异”，可是他们或许只是看到了以前的平庸教学未有改进而已。

第二个现实情况是，如果网络教育真要根据内容和所处环境精心设计，或许和课堂教学的费用一样昂贵，甚至更昂贵。崇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人或许并不喜欢过去其他形式的远程教育，却会支持网络教育，因为网络环境有利于促进小组协作，能够促成“知识的建构”。可是这些支持知识建构的教学方法都很耗费时间，而且需要小组协作，这样的教学法对老师（引导者）的要

求更高，所有这些因素都抬高了网络教育的运营成本，使得它比传统的课堂教育费用更昂贵。这是一个悖论，和很多教育管理者的愿望背道而驰。

以南非的一个真实案例来看这个悖论。南非大学（UNISA）自20世纪40年代成立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早、最大从事远程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公立教育机构中的远程教育领先者之一。当然，在早期，他们主要是函授教学，将大量纸质材料发放给学生，人均成本很低。南非政府的政策，是在提供资助的时候，将远程学生算作“在校学生的一半”。因此，南非大学每个学生人均摊到的政府经费只有其他在校大学生的一半。

随着互联网和网络通信技术的普及，大部分高校开始设置远程学习课程，到2004年左右，南非或许已是全世界远程教育最普及的国家，大概有50%的学生实现了远程学习。南非教育部因此让人开展了一项研究，关于远程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成本，希望借此改进经费使用方式和法规政策的制定。我参与了这项非常全面的研究。研究当中，我们不仅收集了南非的数据，也收集了其他国家的数据以作比较，这些国家包括孟加拉、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我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这些参照国家）。

研究结果出来后，我上面说的“悖论”就昭然纸上了。无论是南非还是其他国家的高校，如果使用现代网络教育手段开展高等教育，经费政策应该对远程学生和在校学生一视同仁才可以。这个结果让南非政府很吃惊，也不喜欢。因为当初政府希望通过研究证明，换用远程教育手段，上网储存、传递电子材料交付给大量学生，应该比纸张印刷和邮局投递便宜。他们本来希望借此进一步削减远程学生的经费补贴，削减到在校学生的三分之一。据我所知，这个悖论式的情形至今还未解决。将这份报告束之高阁，保持原来

的经费政策，似乎在政治上更便利一些。

还有一个现实情况也值得一提。其实，很多网络教育能节约成本的提法和其他形式的网络协作的说法来自企业。企业界和教育界的背景大为不同。企业培训和人力资源成本的统计数据显示，培训的间接成本远远超过直接成本，有时候甚至超出两三倍。这些间接成本包括去外地参加培训的差旅、食宿费用，还有员工培训期间的生产损失，这些成本比培训本身高很多。因此，在企业界，网络教育确实有削减成本和替代培训的作用。而在教育界，大家一般不希望裁减老师、关闭学校，或是将在校学生赶走。在这种情况下，网络教育反而有可能增加额外的成本。

南桥：您认为网络教育的教学设计和传统类型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哪里？而且，现在有很多人在谈论移动学习，您觉得这类教育的设计又有什么不同呢？

罗米斯佐夫斯基：这要看是从教学设计的角度还是从媒体设计的角度来回答了。从教学设计的角度来看，这些类型的教学设计并没有本质差异。我的意思是说，教学设计者都必须以课程的目标、内容，学生和具体项目背景为依据，掌握一些关于学习理论的最前沿知识。

从媒体设计或者媒体研究的角度看，我的回答会有所不同。显然，如果专门设计一个在手机上使用的教学游戏，要求有趣、生动，有教学价值，那么这项设计的技术任务会完全不同于针对Web 2.0式协作学习环境下的互动游戏设计。每次技术升级后，都会有一系列新设备应运而生，需要运用合适的（通常是新的）软件进行设置，然后才可以被有效利用。媒体设计者、网页设计者要学

习使用每一代媒体设计工具，以便能够为新一代的设备开发出配套内容。随着项目的推移，他也会找出运用这些设备的新方法。

打个比方，媒体的设计者就好比创新者，总是建议如何在新的课程中使用新的技术工具，而教学设计者则“踩刹车”，好让整个程序按照经典的方式继续顺利推进。这里我们可以引用上面提过的《教学技术定义》一书开头的一段话：

> 最近，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项目深受学习、信息管理和其他相关领域重大理论的转变影响。例如，认知和建构学习理论，将教学的重点从教转为学。研究者越来越关注学习者的视角、偏好和学习过程中的自主性。这些理论转变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学科的导向。过去教育技术是设计教学，是用不同方法传播的教学行为。如今教学设计关注的是创造学习环境，让学习者能够在电子绩效支持系统下开展探索，从而形成认知和理解。

由此可见，教学设计也并非是一个一成不变的领域，事实上，它一直在发展，在变化。不过这种发展变化是对教学过程中某些理论性变化的回应，而不是随着新技术工具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工具可以用来达成教学任务，而不是相反。网络教育就是个例子。网络教育的产生应该是因为要解决一些教学问题，而不仅仅是在跟着技术走。

说到移动学习的问题，从教育方面来看，我们关心的焦点是移动设备的小屏幕能否交付合适的教学内容。小屏幕对移动学习来说局限性很大。当然，我们这里只是抛开其他因素在说教学。事实上，有时候出于政治、管理或是其他高层系统的原因，这些技术和

设备已经开始采用。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只好尽量利用已有的基础设施和资源了。

南桥：您曾经帮助众多国际组织和国家政府设计教学系统和教育项目，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十年当中，教育体系也在开展改革。您能否举出您职业生涯中的相似或相关案例，与中国读者分享？

罗米斯佐夫斯基：这次采访中，我一直在说各种教育设计、项目管理的案例。这些个案并非来自中国，可我相信，这些例子在中国或者其他地方也一样适用。至于有没有特别和中国有关的案例，我倒无法回答，因为毕竟没有亲身接触过中国教改的体验。可是我想，可能从人口、规模上看，巴西（虽然小一些）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参照。

我最近的一个项目，是帮巴西把高等教育拓展到偏远的农村和小城镇地区。可能这个项目你会感兴趣。这个项目利用电视广播和互联网双重渠道，传播高速、宽带交付的高质量视频学习材料，这是课程材料的基本部分。另外，学生还可以利用现有公共基础设施，开展网络互动。每个希望参与项目的地方政府，都必须建设接收设备等基础设施，一般情况下是在教堂和学校。各地还有“班长”，在第一线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如果遇到更大的问题，这些班长可以在线求助更加训练有素的辅导人员。另外，网络学习社区也得到很好的利用，学生可以在网络上展开互动，相互提供支持。这个项目现在看来成效不错，实施的第一年，全国范围内接受这种公共高等教育的人就增长了几倍。不过目前课程还限于几个学科，而且使项目受到制约的是，课程开发还需假以时日，资源也没有到

位。对它的最终结果，我们拭目以待。

我想这个项目的一个创新，是将当地社区的积极性和资源调动起来，让大家一起参与这个远程教育系统的建设和运行。这种情况在巴西并不常见。过去，这个国家在公共卫生和教育领域总是等着中央政府把一切都做好，“端在盘子里送来”。我不知道同样的项目，在中国是否可行。我知道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规模很大，而且已经经营了很长一段时间。2006 年在巴西举办的远程教育国际大会上，有些中国代表提交了论文，从中可见，中国也实施了一些基于互联网的大型项目。可是具体细节我并不清楚，不知道实施状况如何，在基层的接受程度如何。

你看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虽然在同一个大陆，面积大小也类似，但是它们各自远程教育发展的历史并不相同，如果再和中国相比，想必又是一番天地。可是，在具体的技术（如远程教育技术）运用上，又会看到一些相似的趋势。虽然可能由于一些文化或政治差异，技术的具体传播方式还有些区别，但总体来说，我觉得各个国家之间可以相互借鉴。

在这次访谈里，我们没有时间具体分析这些不同之处，或许这些差异也不是特别和中国有关，可是，如果有这些分析，严格界定了研究范围和参照对象，我们就可以作出更有益的对比。比如，界定一些在中国背景下实施的项目，然后寻找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进行参照，寻求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许我们可以一起设计、实施这样的项目，我对此十分感兴趣，若有需要，我乐意效劳。

无所不在的技术与学习

——美国俄克拉荷马基督教大学的移动学习访谈

访谈背景

据《福布斯》杂志报道，今年新学期伊始，俄克拉荷马基督教大学（Oklahoma Christian University）和艾别林基督教大学（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福瑞达·哈德曼大学（Freed-Hardeman University）都慷慨地给新生发放了一批移动学习设备，包括苹果公司的iPhone（智能手机）、iPod Touch（可携式媒体播放器）、iMac（笔记本电脑）。由于这几所都是私立大学，也许可以说它们发放这些设备在一定程度上是争夺生源的需要。但与此同时，综合排名靠前，一向不愁招生的马里兰大学、杜克大学也在移动学习上进行了尝试。《福布斯》认为，移动设备的普及渐成趋势，既然阻挡不了新生代的学生使用这些设备，不如反堵为导，让学生将这些“口袋中的互联网”带到教室中来，为教学所用。

这些由移动设备促成的学习被称为“移动学习”，英文为Mobile Learning，或简称M-learning。《英国教育技术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曾刊发过一篇文章，简要回顾了

"移动学习"不长的历史:"早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就开始设想学习者人手一个笔记本电脑的情景……或许比这更早——始于美国学校开始给学生购买电子计算器的时候。移动学习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68年艾伦·凯(Alan Kay)的《活书》(*Dynabook*)中,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爱帕·牛顿的《信息板》(*MessagePad*)一书中得到弘扬。'信息板'成了后来移动学习的基础平台……"(Rushby, 2006)

移动学习的常见设备为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掌上电脑、个人数字助理(PDA)等。其趋势是更小(即整个设备越来越轻、越来越小)、更大(这里指的是在同等重量和大小的设备上,显示屏更大)、更广泛(即适应能力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Fischer & Konomi, 2007)。如今学校的大部分学生至少拥有一种这样的产品,而教育者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它们,将学习内容传播给学生。比如,在美国马歇尔大学(Marshall University)的医学院,老师把授课内容录音,发布在网络上,让学生下载到各自的iPod等设备上去听。这些设备往往是学生自发开始使用,学校在一段时间之后作出反应,帮助学生使用设备以分享教育资源。而《福布斯》提到的那几所学校,则更为主动,它们抢先一步给学生配备这些设备,为今后更为系统地利用这些移动设备开展教学活动做准备。

学生可以利用这些移动设备开展的活动包括:时间管理(如使用日历的活动管理功能)、学习内容的获取(比如通过iPod收听、收看多媒体课程内容)、沟通(比如和老师、同学之间的即时通信及电子邮件往来)、上网搜索教学内容等。但是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移动学习设备的功能也不止学习,学生可使用这些设备管理自己的个人生活。例如,在俄克拉荷马基督教大学,学生可以通

过他们的 iPod 或者 iPhone，查阅 Google 地图，找附近餐馆，或是了解食堂当日的菜谱等，当然更多的是收听各自喜欢的音乐。通常情况下，学生是被这些便利所吸引，喜欢上它们，继而习惯借此接收学习内容。

移动学习之所以变得热门，也和人们教育理念的转变有关。在这个时代，单向的教学灌输已不再是唯一的教学方式，基于建构主义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日渐深入人心。建构主义者肯定学生的自主、自发学习能力，在此过程中，教师充当督导者(facilitator)、脚手架（scaffold）的作用。移动学习设备能够让教育者将教学资源以更便捷的方式“推”给学生。这是一种新型的思想解放。主动引导学生的移动学习，而不是对其进行封堵，说明教育者不管是姿态上还是实质上，都将学习真正地交到学生“手中”。目前的教育，也在面临从“大众式教学”到“个人学习”的转变，从强调灌输到强调自主学习和批判式思维的转变(Fang，2007)。

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移动学习的吸引力或许超过基于电脑的网络学习。例如在中国，移动电话的普及率远远超过电脑，而且移动电话的功能也越来越强大，能够帮助使用者完成一些以前只能由电脑完成的任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亚洲发展银行曾经在日本开设关于发展中国家移动学习的培训课程。课程讲义中写道：“移动学习（M-learning）可以提高教育领域的效率，在不发达和偏远社区有扩大教育机遇的巨大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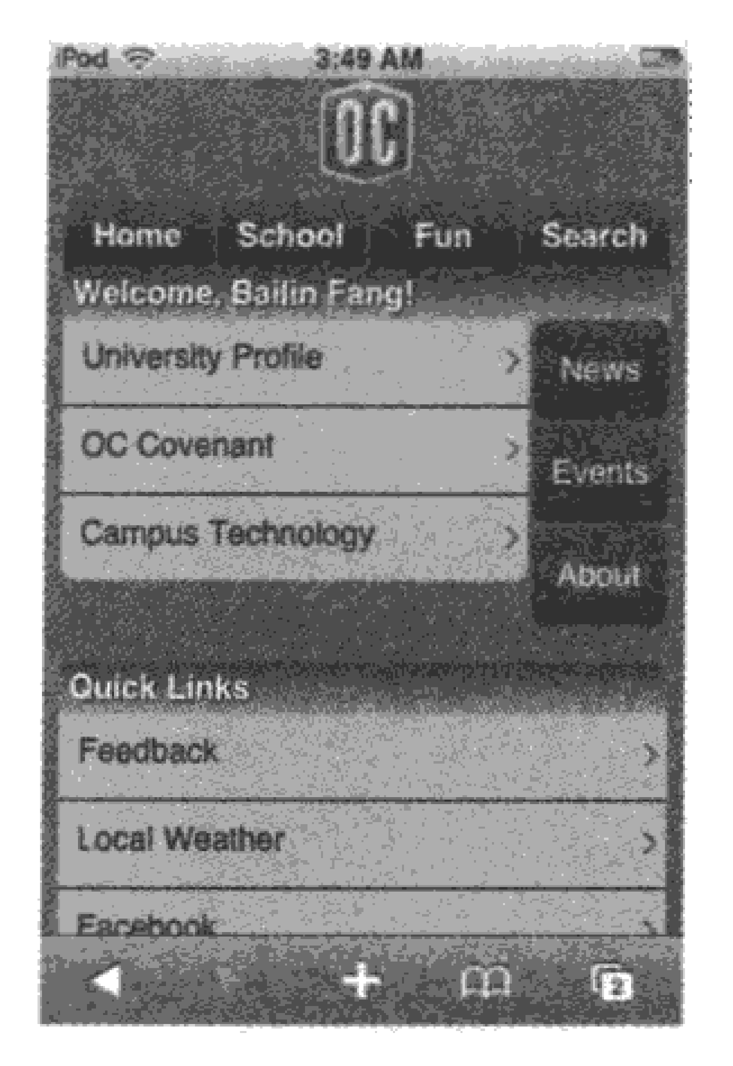
在当下的中国年轻人当中，从高端的 iPhone 到各种山寨机都得到青睐，3G 智能手机成为一种时尚。这些习惯了新技术的年轻人进入学校后，教学过程和结果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这是一个教育者必须预先考虑的问题。如果这种考虑滞后，政策僵硬，

便会在教与学之间产生更大的鸿沟。移动学习虽然有很多优点，但是在具体的教学实施当中，也会有很多需要避免的问题和需要注意的盲点。

学界已经开始探讨关于移动学习的话题。其中，学校如何在组织上、基础设施上支持移动学习得到了广泛的讨论。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科勒特教授等人在10个月的试点研究后指出，对移动学习影响最大的，是“学校对移动学习的支持”。脱离了机构支持的学生的自发使用，会降低学习效率，乃至起到副作用。此外，《移动学习》（Kukulska-Hulme & Traxier，2005）一书中，用12个案例来分析移动学习，展现在学校的生态环境下，学生、老师、管理者、支持者如何运用技术，展开新的互动，改变自身的教学或学习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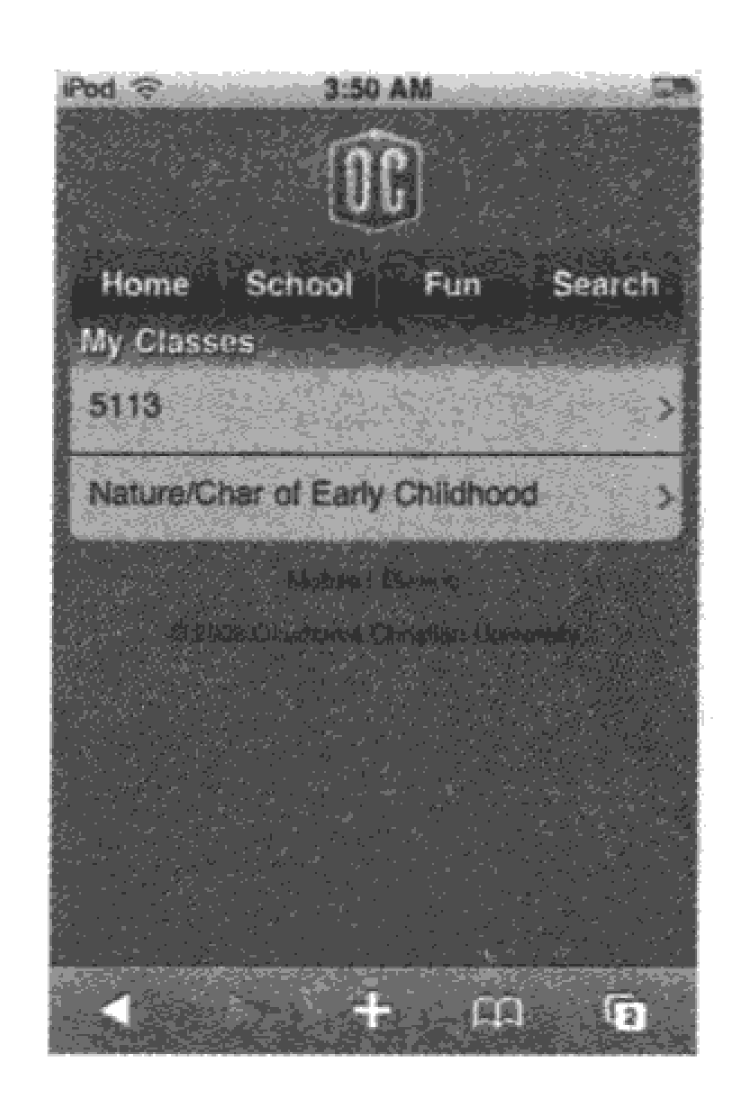
以下这篇访谈，也是通过案例分析，从技术管理的实践角度，了解移动学习在一个机构内实施的详情。

俄克拉荷马基督教大学是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在硬件上，学校有覆盖校园的无线网络，学生在学校任何地方均可上网，学生和老师均拥有个人笔记本电脑和其他至少一种移动上网设备。在软件上，学校不断开发出适于移动上网的应用程序，例如，可以让老师在班级通过 iPhone/iPod 收集出勤情况的反馈程序。学校还设立了专供移动设备使用的校园门户，分为“移动主页”（Home）、“学校教育”（School）、“生活娱乐”（Fun）、“校内名册”（Search），等等，师生可以迅速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并给技术部门以反馈（如图一、图二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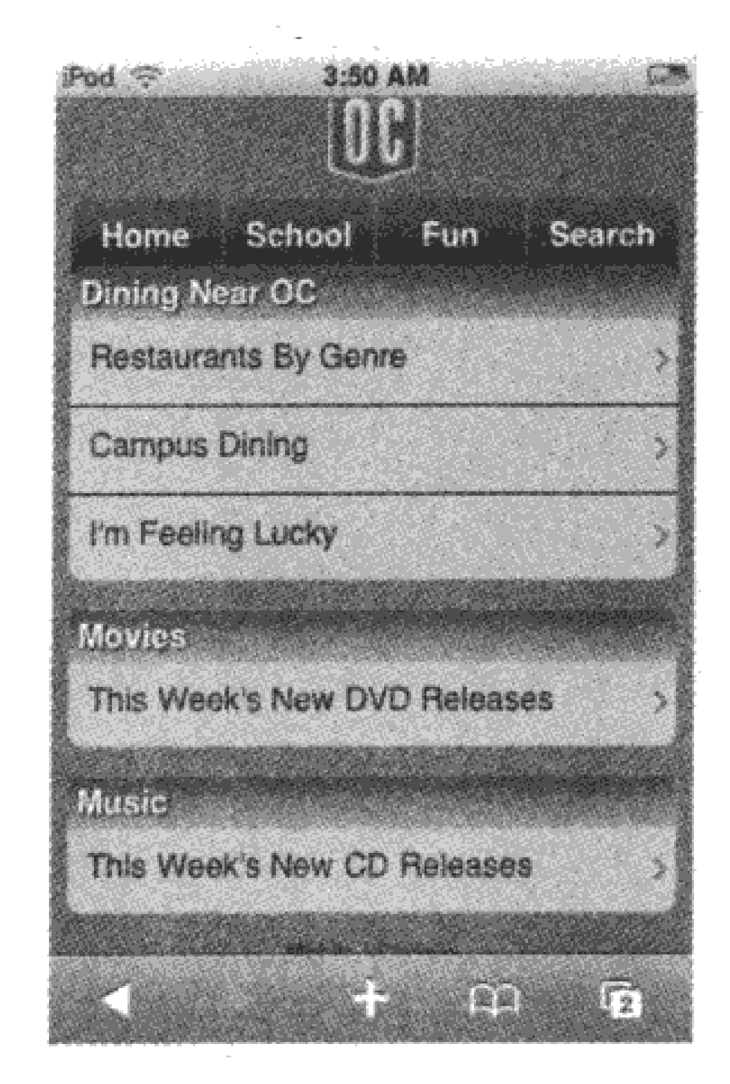
图一 主页

"学校"(School)板块与课程管理系统结合。学生可以实时收到自己课程的通知、邮件及更新内容的提醒，还可以看到同班同学的名册。这能够帮助学生快速认识同班同学。由于名册中列有同学的邮件地址，大家相互沟通也更趋便捷。（注：通过 iPod 或者 iPhone 触摸屏点击每门课程的名称时，会出现该班级的学生名单、课程通知、提醒内容等）



图二 课程清单

在“生活娱乐”板块，学生可以迅速查找DVD信息，学校附近餐厅、校园内餐厅开放时间和食堂菜谱等。由于学校校园开阔，出门需要开车，这些信息对学生十分有用（参见图三）。随着学生需求的增长，这些应用板块的内容还将更加丰富。



图三　“生活娱乐”板块

在“校内名册”板块，学生可以通过姓名搜索到老师、同学的相关信息，包括老师放在数据库中的文件。对老师来说，这也是一个便利的服务，在人数比较多的班级，如果记不住学生姓名，老师的移动上网设备随时可以帮助他调阅学生的资料。

另外，移动上网设备自身还有很多应用程序，可用于教学目的，尤其是收听教育有声材料的Podcast。学校加入了苹果公司设立的教育播客空间iTunes U，这样有声教学材料和视频就可以通过Podcast，进入学生的移动上网设备。

除了这些掌上移动设备之外，笔记本电脑的使用也颇为普遍。这样一来，全校范围内就有数以千计的计算机、移动上网设备和软件设备需要维护、支持、管理。如此庞大的工程，学校如何应对？

以下访谈的对象是俄克拉荷马基督教大学的首席技术官（Chief Technology Officer，简称 CTO）约翰·霍尔默斯（John Hermes）先生。他负责这所学校移动学习的设计，统筹全校的技术服务和整合活动。霍尔默斯先生毕业于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获电子通信管理硕士学位，在教育技术实践领域有 15 年的从业经验。访谈侧重移动学习的具体实施和管理问题，其中也涉及实施当中的具体问题，希望能给国内同行一个有益的借鉴。

南桥：请问您作为一个高校的首席技术官，具体职责是什么？这个职位的设立初衷是什么？

霍尔默斯：作为首席技术官，我负责整个学校信息技术的战略规划。这包括掌握信息技术系统的更新，了解其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学校的应对方法。我的上司是常务副校长。

在美国，首席技术官这个职位比较常见，这一点你们可能也已经注意到了。事实上，根据我们从 Educause 所得知的数据，美国的多半高校设立此类职位，属于总监级别的技术性职位，统领全校的信息技术工作。

这个职位的设立有利于对校内信息技术类业务进行统一管理，对信息技术的日常性事务统筹安排，以免各自为政，分散经营。

对我们来说，设立该职位也是一种节约成本的模式。倘若各个院、所、系各有各的信息技术部门，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比如，商学院使用一种平台，而英文系使用另外一种平台。此外，后勤支持、服务部门或许又有他们的系统和信息平台。这样肯定会乱套，学生使用起来也不方便。CTO 的设立就可以很好地避免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是一所私立大学，要与其他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展开竞争。我们希望能给学生提供独特的信息技术体验。等学生毕业之后进入“现实社会”，这个社会会期望他们具有很强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而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毕业生做到了。这也是我们领先于很多高校的地方。

南桥：那么，在您看来，信息技术的优势在哪里？这对俄克拉荷马基督教大学又有何启示？

霍尔默斯：最近我在《商业周刊》杂志上看到一篇有趣的文章，说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使用苹果电脑，而过去，似乎只有营销和创意部门才使用苹果电脑。原因是苹果电脑对自身的平台进行了很大的改进，比如，它现在既可以运行苹果专用的 Mac OS X 系统，也可以运行微软的 Windows 系统。在俄克拉荷马基督教大学，我们就向每个学生提供一台 MacBook 笔记本电脑，这样学生就可以兼得两个系统的好处。而且苹果的 Mac OS X 系统比 Windows 系统更加安全，更被首席技术官看中。

另一方面，基于服务器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即只要连上网络就能使用，原本只在电脑上运行的应用也逐渐扩展到多个终端，比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等。人们越来越喜欢“云”的概念，而不再依赖客户端产品。

基于这些原因，你会发现，信息巨头们在建设越来越大的数据中心，而且选择的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地方。这些数据中心规模很大，所以必须建在能源价格低廉的地方，比如，在我们俄克拉荷马塔尔萨北部的一个无名小镇，Google 公司会来建一个数据中心。谁会想到他们会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建数据中心呢？然而，对能源的

焦虑使得人们改变了决策的标准。数据中心的拓展，也说明基于服务器的应用会越来越普遍。

南桥：俄克拉荷马基督教大学的移动学习，现在看来很普遍了，您是否可以介绍一下当初的实施背景？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大力发展移动学习？

霍尔默斯：我们的移动学习计划是从2001年开始的，目的是提供个性化的、技术增强型的"俄克拉荷马基督教大学学习体验"，即让学校社区所有成员能够随时随地使用网络。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希望改进学习体验、沟通渠道和服务质量。

当时决定开展移动学习计划，还有一些现实考虑。2000年，我们常碰到教室资源不足或机房维护工作量大等方面的困难。机房维护需要很高的成本。当时，大概有110个学生实习生在维护机房的运作。于是，我们决定改成移动学习的模式，给每个人发一台笔记本电脑，提供无线上网服务。通过这种方法，我们的机房需求急剧下降，甚至现在只要20个学生实习生就可以运作我们的技术支持中心。

当然，实施这套方案也是为了学生的便利。当时很多人都没有电脑，机房又供不应求，学生有时候需要排队才能使用。

另外，也是出于平等的考虑。既然我们认为信息技术对所有学生未来的就业都有帮助，那么就有义务让大家享有平等的使用权。那个时候，只有一些家庭富裕的学生有自己的电脑，而家庭贫穷的学生则没有。实施移动学习计划后，我们给每个人发一台电脑，这就实现了技术使用上的平等。这样的话，无论家境好坏，都不会影响到信息技术的学习和使用。

南桥：能否详细介绍一下移动学习在学校里的实施情况？

霍尔默斯：每个入校的学生，只要是每学期所修五学分的课程超过五个的，都可获得一台 MacBook 笔记本电脑和一个掌上设备，这可以是 iPhone 或者 iPod Touch（注：强调五学分以上，是因为有一些学生只是在该校选修一两门课的外校生或临时学习者）。整个校园内均可无线上网，学生可以学习课程内容，接触媒体，开展沟通。信息技术服务部门提供所有的技术支持，包括给学生提供校内维修，维修时间如果超过一天，会借给学生电脑。

这个移动学习模式最大的收获，是提供了更多、更便捷的渠道，让学生沟通和协作。过去，学生如果要凑到一起做小组作业，通常要约时间，一起去机房做。现在，他们使用各自的移动上网设备，可以很灵活地安排。学生会使用网络聊天、讨论区、邮件等方式沟通，而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再自然不过。我们“全天候网络连接”的基础设施，使这种协作变得非常容易。

移动学习也发生在师生的互动当中。过去，学生有问题找教师讨论，得去他们办公室，得知道他们的办公时间，等等。现在，电子邮件、聊天软件、讨论区都能让师生讨论更为容易。很多教师还在用“虚拟办公时间”的方式和同学在网上会面。例如，我们有一位英语教授，就通过 Blackboard 的聊天室，在指定时间，定期和学生开展交流。

另外，我们也开始尝试使用一些虚拟会议系统，如阿帕比公司的 Adobe Connect（注：原名为 Breeze），让教师学生开展实时的教学活动，包括桌面向全班共享、远程网上作业展示等。

由于移动设备，如 iPhone、iPod 进入课堂，师生可以实时沟

通，我们开发了诸如 iChoice 这样的软件，帮助老师便捷地收集学习反馈信息。以往有些大班授课，老师登记出勤情况十分麻烦，而使用这些移动设备后就方便很多。而一些需要老师用大量时间批改的作业，比如平时的小测验，就可以由课程管理软件当场生成成绩，这类自动批改省去了老师批改客观题的大量时间。这些时间可以解放出来，让老师去从事更有创造性的劳动。

南桥：可不可以说，这种移动学习改变了学生学习的方式？

霍尔默斯：移动学习提高了学生协作的能力，也让师生能够更及时地沟通。但是我不建议使用“改变”一词。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在适应学生的需求、学生的偏好。如你们所知，如今学生上大学的时候，多半都已经有了一些技术使用背景。他们期待大学能够满足他们在信息技术上的使用习惯。他们多半是“技术原住民”，信息技术应用对他们来说很平常。他们会使用电脑同时做很多事情。

当然，有时候我们也听说现在的学生不喜欢社交了，因为成天坐在电脑前面。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他们坐在那里，说不定恰恰正是在忙着“社交”。他们或许正在和某些千里之外的人，用网络聊天、邮件或者实时协作软件进行沟通。

南桥：这种“实时”沟通会不会对学生的写作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霍尔默斯：在不少论文中，我们都看到过这样的担忧。但是实际上，我并没有从任何教师那里听到过这样的抱怨。学生们如今的

写作或许比以前更快，而且他们的写作量也增加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因为技术手段的应用，学生比以前写得更勤了。

南桥：移动学习是否改变了教师的教学方式？它对你们学校的远程教育影响如何？

霍尔默斯：或许最大的变化，是教师能让学生在课堂之外接触教学内容，有时候这能促成一种混合教学模式，达到线上、线下学习的统一。

然而，信息技术的改变对一些教师会形成挑战。有些教师学会一种应用程序之后，学校的平台换了，又得“重新学习”一遍。我们把 PC 机换为 MacBook 就是一个例子。但是我有信心，经过初步学习之后，教师会认识到这种改变的好处。如果我们的培训等工作到位的话，教师实现这些转变是不会太难的。我们还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如从事电子媒体制作的路加·哈特曼，他在出色地从事教师支持工作。

此外，移动学习对俄克拉荷马基督教大学远程教育的改变在于，它促成了更多网络课程的出台。前面说过，我校的技术硬件很好，另外，我们也有网络课程管理平台，目前使用的是 Blackboard。教师可以将课程的相关材料放在平台上供学生随时随地取阅。还有一些技术手段，让以前靠人工完成的教学活动更加自动化。比如，Blackboard 上的“成绩单”功能，可自动录入一些学习活动的分数，并进行汇总。我们还购买了一些软件和服务，帮助老师更为顺利地开展网络教学。比如，我们拥有 Respondus，可帮助教师把文本文档格式的测试题转换成 Blackboard 上可以使用的试题。我们有 Turnitin（注：一种检测学生论文作弊的服务），可以保证学生能够

诚实地完成自己的作业。而在过去，学生的论文有无抄袭，教师只能靠直觉，有时候并不能保证判断的准确性。这些软件的使用对老师是个帮助，对学生也起到了督促作用。

这一切应用几乎都离不开网络。在有些高校，教师、学生自行解决网络链接的问题，结果从拨号上网到宽带，速度参差不齐，很多服务使用不了。在我们这里，设施是齐全的，网络连接无处不在，这些应用变得十分容易。随着使用的增多，一些教师发现了它的方便，觉得不如索性将零星的一些网络活动整合成网络课程。这是教师基层发起的，类似于草根运动，推动了越来越多的应用。

另外，学校高层领导对远程教育也有着很强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他们也在自上而下地推动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2007年，我们的校长迈克·奥尼尔博士就在一次教师会议上提到："开始的时候，我们自然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技术，因为我们不想简单地跟风赶时髦，另外，一些质量不高的网络课程也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不过，大家得意识到，我们已经和远程教育打了一段时间的交道。技术本身也在迅速发展，成了我们不得不去关注的力量。目前，我们处在一些教育观念面临重大转变的时候。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不学习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要不主动出击，管理变革，驾驭变革。"

学校分管教学的常务副校长艾略森·加瑞特博士还专门成立了技术和学习委员会，为学校的网络课程建设制定政策、标准和管理流程。这些高层的推动，也是网络课程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桥：对世界上很多高校来说，移动学习还是一个新鲜的事物，你们在实施移动学习计划中遇到过什么挑战？你们又是如何应对的？

霍尔默斯：课堂管理应该是最大的挑战。如果管理不善，教室内的技术就可能成为学习的障碍，而非动力。这是有些老师比较担心的地方。比如，老师在台上讲课，学生却用各自的笔记本电脑做其他事情。因为绝大部分学生都随时带着自己的电脑，包括上课的时候。他们上课的时候用电脑在干什么，你无法一个个去查。但是在不实施移动学习的学校，这样的问题也同样存在。比如，学生会使用各自的手机、笔记本电脑，或是无关的图书，去从事分神的活动。

南桥：那么您是否听说芝加哥大学在上课期间关闭了无线网络？

霍尔默斯：我听说过，我也同样认为网络可能会让学生分神。但是我不赞成一刀切，把网络切断不一定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教师应该引导学生不去从事分神的行为。对学生的指导和合理的课堂管理策略比切断网络连接更为重要。这应该是师生双方配合的事，学生需要自觉，也需要引导。一些出色的授课方法，组织积极有效的学习活动，也可以将这些分神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另外，从技术上看，如有必要，我们也可利用一些电脑桌面控制系统，帮助教师设定权限，让学生有所为有所不为。例如，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关闭适当的网络协议，使得学生无法从事某些网络活动，如网络聊天。在考试期间，我们可以使用浏览锁定软件（Lockdown Browser），锁定除了测试之外的所有应用，让学生无法相互拷贝、抄袭，或是上网搜索和考试相关的内容。

南桥：你们在实施移动学习的计划中，有哪些体会和心得可以与同行分享？

霍尔默斯：过去的七年里，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必须提供一个非常强大的支持系统。我说的支持不仅仅是技术支持，也包括在教学中技术整合这方面的支持。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做得不错，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

我们得到的一个教训是，必须循序渐进地引导教师整合技术。例如，一开始，可以鼓励他们将以前的幻灯片数字化，帮他们制作PPT，帮他们把PPT放在网络课程里；然后可以教他们如何在PPT中添加声像材料和自己的配音，接着可以让他们以PPT为基础，制作视频课件；最后，可以在虚拟环境下，利用PPT开展实时的演示活动。总之，学校应该创造条件，让教师能够一步步适应技术应用，也应该预期这一切都需要时间。

另外，也应该考虑到，技术的推广是在多个因素的影响下进行的。一定有先行者，也一定有按兵不动的人。我们的做法是鼓励先行者，通过教师“传、帮、带项目”（Faculty Fellows Program），让他们交流经验。但是我们也给不愿意使用某些技术的人足够的空间，绝不整齐划一地强迫他们应用。我们远程教育的远景规划里就有这么一条：“我校教育技术的应用须精心选择，谨慎行动，一切要服务于学校的整体使命，而非起到反作用。远程学习未必适合所有课程、所有教学内容。所以我们不会要求所有老师都去参与。”

至于移动学习方面，有些终端产品，如智能手机，我们也刚刚开始使用，所以得等一段时间才能知道效果如何，该避免哪些方面的问题。在笔记本电脑应用方面，我觉得学校应该有合理的期望值，知道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我们学校，技术是用

来服务教学目标的。我们觉得一个明智的做法是把技术当作工具来看，目的是满足学生需求，因为学生在上高中的时候、在家里都用这些电脑，他们希望上大学后继续使用。不要轻言这些数码产品能提高或是降低学习效果，因为我们现在还找不到充足的相关数据来论证。

有趣的是，我们发现总是学生走在技术应用的前列。这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他们的数字生活也常变常新，就如同活动靶子。作为学校的管理和支持者，我们有责任满足这些“数字原住民”的需求。

南桥：前面您两次用“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这个形象的词语来形容现在的年轻人，请问您是如何界定这个概念的？

霍尔默斯：多年前，我听过这么一个说法：如果你写过电子邮件后，想当然地认为对方收到了，那么你大概就是“数字原住民”。如果你写了封电子邮件，还不放心，接着又打个电话追问，那么你大概是“数字移民”。

如今的学生对技术的应用很熟悉。他们使用很多应用程序，其中有些恐怕你我都不知道。现在他们的时尚是使用 Facebook。以我们学校为例，在这个社交网站刚开始的三个星期，校内注册用户大概是400 个，现在全校使用 Facebook 的人至少占了总人数的 98%，我们每周从 Facebook 收到的邮件就有 15000 多。

南桥：刚才您提到各种各样的技术，你们又是如何将技术整合进教学的？

霍尔默斯：我们本来是希望通过技术改进课堂教学体验，但是后来发现最大的收获反而是在沟通方面，即全校的各个部门、团体沟通渠道更畅通了。技术也增加了课后学习的机会。学生不仅仅在课堂上学习，课后也在利用技术进行学习。

我们的技术整合模式，是分散的、混合型的，让师生交流和学生学习都摆脱了时空的限制。此外，教授还可以利用课程管理系统在课堂上做随机调查，以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更为关键的一点，如我们校长奥尼尔博士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技术应用目的是“希望有利于教育目标的实现，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有利于激发教师思考”。在应用技术的时候，我们对时髦没有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如何利用现有技术资源，优化我们现有的注重操作、注重人文、注重质量的教育体验。我们并不希望通过技术去替代现有的教学模式，而是希望优化它。

南桥：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在设计和呈现教学内容等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你们如何整合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上的内容呢？

霍尔默斯：未来的趋势是应用程序会越来越独立于具体平台。技术供应商，如苹果电脑，正在改进自己的应用程序，让用户可以跨平台使用。与此同时，软件供应商，如课程管理软件供应商，也应该改进自己的产品，使之在不同的终端数码产品上都可以使用。最后，随着系统的成熟，我们自己也应该做出改进，比如，我们的网页设计，应该体现这种跨系统、跨平台的能力。